

行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策  
畫

# 楊逵及其作品研究

黃惠禎◎著



以〈送報俠〉成爲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個中翹楚，楊逵，不僅成功的接續抗議文學的傳統，也開啓台灣現代鄉土文學之端緒。勇於向所有腐敗、不公不義的現象宣戰，作品具濃厚的社會意識，強烈的批判色彩下，隱藏的是反抗的意識，楊逵除了知識份子的角色外，還深具草莽英雄氣息，廣大工農群眾的生活才是他最關心的主題，永遠爲追求低階層民衆的解放而努力。事實上，這樣一位在台灣文史上以「壓不扁的玫瑰花」形象屹立的文藝工作者，由於身爲殖民地的兒女，一舉一動都蘊含了「日本國民」與「台灣漢族人」的雙重性格，欲解釋他所有作爲的真正意圖，分析他的思想型態，唯有將他還原到他曾經活躍的歷史舞台……。

ISBN 957-708-173-8 (848.6)



9 789577 081735  
L 9002 售價 180 元

黃惠禎

台灣省台中縣人，民國五十三年生，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靜修女中國文教師，  
現任聯合工商專校專任講師。

文學叢書 1 張愛玲小說的時代感……盧正珩

文學叢書 2 楊逵及其作品研究……黃惠禎

文學叢書 3 台灣新文學觀念的萌芽與實踐……莊淑芝

文學叢書 4 生命情結的反思……林幸謙



文學叢書 2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策畫

【楊逵及其作品研究】

黃惠禎 著

文學叢書 2

## 楊逵及其作品研究

---

作 者 黃惠禎

發行人 蘇拾平

出 版 麥田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82號6樓之5

電話：396-5698 傳真：341-0054

郵撥帳號 1600884-9 麥田出版有限公司

策 畫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印 刷 宏貴印刷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369號

初版一刷 1994 (民83) 年 7 月 1 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708-173-8

---

售價：180 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目次

## 緒論

## 第一章 楊達的家世及其生平

### 第一節 時代背景

### 第二節 日據時期的楊達

### 第三節 臺灣光復後的楊達

### 第四節 楊達的交遊情況

## 第二章 楊達的社會運動

### 第一節 楊達的社會意識

第二節 日據時期的社會運動與楊逵

第三節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楊逵

第四節 楊逵晚年的政治思想

### 第三章 楊逵的文學生涯

第一節 楊逵早期的作品風格

第二節 楊逵晚期的作品風格

第三節 楊逵與《臺灣新文學》雜誌

第四節 遺稿的發現

### 第四章 楊逵的散文與詩歌

第一節 文學評論

第二節 隨筆雜文



第三節 綠島家書

第四節 詩歌作品

## 第五章 楊逵的小說創作

第一節 作品的改寫

第二節 反壓迫的主題意識

第三節 濃厚的寫實主義色彩

第四節 敘事風格與技巧分析

## 第六章 楊逵的戲劇作品

第一節 作品介紹

第二節 寫實與理想主義並見

第三節 民歌民舞的運用

第四節 文學特色

## 結論

## 附錄

附錄一：楊達生平寫作年表

附錄二：河原功編：楊達氏「著作目錄」

附錄三：續補河原功編：楊達氏「著作目錄」

## 重要參考資料

【楊逵及其作品研究】



## 緒論

談起現代文學，我們總是說發軔於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或者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以來知名的作家。然而今日蓬勃發展的臺灣文藝，並不是直接由海峽對岸移植過來，更不是憑空崛起的。西元一九二〇年開始，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思潮，以及大陸上現代文學進展的影響，臺灣新文化運動油然興起。爲了教育民衆的需要，文學的改良也包含在其中，成爲重要的一環。臺灣的前輩作家們，在文學創作的領域內苦心經營，企圖摸索出一條屬於本島新文藝的坦途。漸漸地，新式白話文取代了漢詩，在文壇上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文藝工作者使用的語言，雖然有北平話的白話文、臺灣話文和日文三種，但是作品中暴露出殖民統治的殘酷，洋溢著關懷鄉土現實的熱情，卻是如出一轍。隨著日語教育的推展，臺灣作家在日本文壇也開始嶄露頭角，並且佔有一席之地。而楊逵不僅是搶灘成功的第一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臺灣回歸祖國的懷抱之後，客觀環境的轉變，以及動盪不安的局勢，迫使大多數的文藝工作者就此沈寂了下來。五〇年代反共八股文學當道，有心重建臺灣文學的作家，也免不了被淹沒在時代的浪潮之下。但是楊逵卻以無比堅韌的意志力，突破語言的障礙，放棄一向使用自如的工具，嘗試以中文寫作。即使囚禁於綠島監獄十年間，仍然以源源不絕的創作力，寫出膾炙人口的篇

章。終於因〈壓不扁的玫瑰花〉被編入國中課本，廣泛受到青年學子的愛戴，並且成爲日據時期臺灣籍作家，在光復後最受注目的一位。不但作品被視爲「抗日文學」的典範，本人也素有「抗日作家」的雅號。

民國七十五年，〈「首陽」解除記〉（「首陽」解消の記）（註二）經由張恆豪之手重新出土（註二），證明楊達「首陽農園」的招牌並未如其本人所說，堅持到日軍戰敗投降的最後一刻，因而在文壇和學術界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兩個月後，王曉波緊接著發表了〈把抵抗深藏在底層——論楊達的「『首陽』解除記」和「皇民文學」〉（註三），爲楊達不得已的寫作背景而辯護。同時，張恆豪也以楊達到底有沒有接受國民黨的特務工作爲主旨（註四），提筆爲自己的見解做再一次的驗證。到底楊達是個「不屈的文學魂」（註五），或是「不願被對方『踏死』」，「更不會先『踏死』自己」（註六）的作家，成爲大眾矚目的焦點。「楊達」兩個字在政治上的意義，頓時超越了一切。

事實上，楊達在臺灣史上的地位，既是社會運動家，也是文藝工作者。做爲殖民地的兒女，在異族的政治體制下生活，他的一舉一動都蘊含了「日本國民」與「臺灣漢族人」的雙重性格。因此唯有將他還原到曾經活躍的歷史舞台，才能解釋他所有作爲的真正意圖，而最好的方法，莫過於經由他的創作，分析他的思想型態。然而今日坊間出版的楊達作品集，不過是其創作中極小的一部分。尤其日據時期發表的小說，光復後，在由日文譯成中文的過程中，又都毫無例外地在標舉「民族主義」的大旗下，做了某種程度的改寫——或是關鍵字眼的更動，或是情節內容的增

刪。因此借重這些篇章，不僅不能一窺作品的原貌，稍有不慎，也極可能在引用時發生解釋上的偏差。放眼現今研究楊逵與其作品的相關論文，幾乎不能避免墜入這樣的陷阱之中。因此本文儘可能蒐集楊逵生平全部的作品進行研究，同時參照創作的原始底稿，目標在於達到求真、求實的境界。若是翻譯的版本能忠於原作的精神，為求方便起見，在敘述時則予以採用，不再重譯。最後希望以歷史和文學的角度，為楊逵及其作品做一番公正的評價。

本研究進行時，承蒙楊逵孫女楊翠小姐及其夫婿魏貽君先生的熱心協助，順利取得楊逵生前未能發表的大批遺稿，及部分已發表作品的原稿，得以挖掘楊逵生前不為人知的另一面，特此誌謝！

註釋：

- 一 楊逵作，發表於《臺灣文藝》第一卷第二號，昭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 二 見張恆豪著〈超越民族情結、重回文學本位，楊逵何時卸下「首陽農園」？〉，收於《文星》期九九（復刊號），民國七五年九月一日，頁一二一—一二四。
- 三 《文星》期一〇一（復刊三號），民國七五年十一月，頁一二四—一三一。
- 四 原文題為〈楊逵有沒有接受特務工作？〉，見《南方》期二，民國七五年十一月，頁一二二—一二五。
- 五 「不屈的文學魂」係引用張良澤的說法，《中央日報》，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二十二—二十五日。

六 引自王麗華〈關於楊遠回憶錄筆記〉中對楊遠的評語：「不願被對方『踏死』，同時也無意『踏死』」

對方，更不會先『踏死』自己」，見《楊遠的文學生涯》一書，臺北、前衛出版社，民國七八年二月十五日臺灣版第二刷，頁二九〇。



# 第一章 楊達的家世及其生平

楊達享壽八十，如果以臺灣光復為分界點，恰好在日據時期和民國時代各佔四十年。這段歲月也正是臺灣史上最為紛亂的一頁。其間歷史的脈動和楊達一生的事蹟息息相關，當代的文學風尚與其作品間也交互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日據時期的社會情況對其生平行誼，更是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在探討楊達及其作品之前，有必要先將當時的歷史背景做一番扼要的敘述。

在楊達的傳記方面，坊間已經出版過由林梵執筆的《楊達畫像》（註一）。成書之前，作者曾經住在東海花園一年，與楊達朝夕相處，因此可以算是研究楊達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只可惜由於涉及敏感性的政治問題，關於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十年幾近空白（註二）。而且此書完成於民國六十六年，無可避免地，關於楊達去世前約八年的時光也有待續補。因此本章在《楊達畫像》描述較為疏略的部分，希望予以增強。使用的資料則以楊達晚年發表的回憶錄為主，參照《楊達畫像》而成。

## 第一節 時代背景

西元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戰爭失利後締結的馬關條約中，將臺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對日本來說，臺灣不只有豐富的資源可供榨取，更是其國勢向亞洲大陸以及南洋擴張的前哨站，具有高度的經濟和軍事價值。但是接收臺灣的過程並不順利，當割讓的消息傳來時，臺灣人民憤慨異常，島內立即成立「臺灣民主國」，全力抵禦日本的入侵。雖然在日軍精良的武器下，不到五個月就全盤瓦解（註三）！但是各地義軍蜂起，武裝抗暴事件頻傳，從五月二十九日近衛師團登陸澳底開始，一直到十一月十八日樺山總督才向大本營報告平定臺灣（註四）。同時，卻還因為鎮壓各地的義軍而疲於奔命。

在這樣紛擾不平的局勢下，治安就成為日本對臺統治政策的中心課題。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日，「六三法」（註五）頒佈，臺灣總督府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的專制政權於焉確立，並得以脫離日本帝國議會的牽制，隨時制定法律，是日據時期臺灣所有惡法的根源（註六）。爲了消滅民間武裝反抗的力量，臺灣總督府採取鎮壓和招降並用的策略。全島嚴密的警備網，加上採行連坐法的保甲制度。一八九八年，又公佈了「匪徒刑罰令」，對反抗日本軍隊及臺灣總督府者採取嚴厲的報復，將未遂犯處以重刑之外，還規定在本令實施以前犯罪的，也依照本令處置（註七），抗日勢力因而逐漸地衰微下來。但是到了一九一五年，仍然爆發了轟動世界的「噍吧哖事

件」，這是漢系臺灣人武裝抗日規模最大、最後的一次，也是最爲慘烈的一次（註八）。事敗之後，民衆才領悟到本身力量之單薄，根本無法動搖統治者的地位，因此在士紳與知識份子的帶領下，積極地投入非武裝的抗日路線，改用較溫和的方式爭取同胞的權益。例如六三法撤廢運動和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就是企圖以法律途徑消弭政治上的差別待遇。雖然這兩項運動並沒有獲致真正的成功，卻喚起了更多臺灣民衆的注意，各種民族運動、階級運動繼之而起，蓬勃發展。臺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臺灣民衆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都是其中極爲顯著的例子。比較特別的是臺灣共產黨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於上海成立，其政治方針更是赤裸裸地昭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臺灣共和國」的立場（註九）。由於臺共勢力滲入的影響，對日本殖民政府的抗爭轉趨激烈。一九三一年，逮捕臺灣共產黨的行動在全島展開，左翼團體的運動遭到日本當局的大力彈壓而趨於消滅。（註十）

在經濟方面，臺灣是典型的殖民地型經濟。米和砂糖因爲日本內地的需要，而成爲產業的兩大支柱。原先日本臺灣米的輸入量很少，富山縣「搶米事件」（註一一）發生之後，才促使臺灣米質的改良與增產，並且在一九二二年以後大量輸出，供應日本本國龐大的需求量（註一二）。至於臺灣的糖業，在荷蘭佔領時代就已經遠近馳名，日據初期，卻因在國際市場上敵不過甜菜糖的傾銷而趨於衰頹。一八九六年，日本政府開始著手進行甘蔗品種的改良，一九〇〇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在臺南成立，一九〇二年六月「糖業獎勵規則」發布，加以日本財閥的投資，臺灣的製糖工業終於走向振興之途。這其間土地的清丈、度量衡的統一，對於糖業的興盛尤其具有推波助瀾的

功效（註一三）。而臺灣銀行的幣制改革，已經在一九一一年四月開始，成功地和日本本土的制度相統一（註一四）。此外，公路的開闢，一九〇八年以後縱貫線鐵路的接通（註一五），為全島帶來益加便捷的交通網路，臺灣也因而邁向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的建設只是基於日本本國自私自利的需要，並不以臺灣民衆的生活福祉為依歸，因之間接影響到臺灣民衆階級意識的醒覺，促成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之發展。

教育方面，臺灣原有的私塾和西式學堂，在日本政府的壓制下逐年減少。尤其私塾是傳播漢文唯一的溫床，也是培養民族精神的根據地，因而遭到日本當局的大力摧殘（註一六）。至於日本在臺實施的教育政策，完全是以日本語的傳授為中心，目的僅在於同化臺灣的民衆。制度上，也表現出強烈的歧視色彩（註一七）。概括地說來，初等教育方面，臺灣人和日本人分別就讀公學校與小學校。第一所臺灣人就讀的中學，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在臺灣同胞出錢出力的情況下成立（註一八）。而臺灣人就讀的各級學校，程度都較日本人的同級學校為低。雖然於一九二二年開始實施日臺共學制，但為了確保日本人在臺的支配地位，臺灣人的中、高等教育，一直遭到統治者有意的漠視，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幾乎被日本人全數壟斷（註一九）。有心深造的臺灣青年，只好遠渡重洋到外地求學。由於臺灣本島內書刊的發行有特別的檢查制度（註二〇），當時，也只有留學生才有機會接觸到世界文化的新思潮。辛亥革命成功以後，民族自決思潮的流行，日本民主主義的勃興，以及朝鮮的獨立運動，都促使臺灣留學生的民族意識抬頭，並且將之傳回島內。因此，綜觀臺灣的民族運動，留學生的貢獻良多。而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的開展，留學生更是居於啓

蒙的地位，功不可沒。（註二一）

## 第二節 日據時期的楊達

楊達，本名楊貴，西元一九〇五年（民國前六年，日本佔領臺灣的第十年）十月十八日（農曆九月初一），出生於臺南附近的大目降街（今新化）。祖父本姓吳，因生活困難而入贅楊家。父親楊鼻，是個錫匠，以製作錫製的燭台、食器、煤油燈等家庭用品為生。母親蘇足，是個具有中國傳統美德的婦道人家，由於在美術方面有些專長，常替鄰人繪畫刺繡花的圖案，賺點零星的費用。夫婦兩人都是文盲，但因關心世事，與鄰近的知識份子時有來往。楊鼻夫婦前後共生了七個孩子，楊達的一姐二妹一弟因病夭亡，只養大了三個男孩，楊達在家中排行老么。（註二二）

幼年時的楊達喜歡聽賣藝人說書，《三國志》、《水滸傳》都是他耳熟能詳的故事。因為體弱多病，一直拖到九歲時才進入公學校就讀，被同伴們戲稱「鴉片仙」（「體弱多病」之意）（註二三）。同年，噍吧哖事件發生，由於新化正位於臺南往玉井的途中，當軍隊的砲車浩浩蕩蕩地由家門前通過時，楊達握緊雙拳，從門縫中目睹全部的過程。後來又聽說日本軍隊鎮壓時種種殘暴的手段，從此在心中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讀中學時，楊達到過事變發生的幾個村莊，果然看到當地殘存的老弱婦孺，成年男子則一掃而空，印證傳說中的大屠殺確有其事。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又買到日本人寫的《臺灣匪誌》（註二四），書中將當時起義的烈士貶為匪徒，他才理

解到統治者撰寫的歷史是多麼地不可靠。(註二五)

十二歲時，父親朋友的女兒梁盒成爲家裡的童養媳，預備長大了要和楊達送做堆。由於在外常受朋友取笑，楊達心裡排斥得十分厲害。(註二六)

公學校畢業後，因爲升學考試失敗，在大哥服務的糖業會社任職工友。一年後考入新設立的臺南州立第二中學校(今臺南一中)，成爲該校的第一屆新生(註二七)。由於公學校五、六年級的級任老師沼川定雄非常疼愛楊達，不但教給他代數、英文等基礎性的功課，並且任其閱讀家中的藏書，使得他考進中學後，因爲沒有要學的功課而能夠徹夜讀書(註二八)。雖然因而時常在課堂上打起盹來，成績依然能夠名列前茅(註二九)。這時楊達閱讀的課外讀物，以思想性的書籍和俄、法兩國含有抗爭性的文學爲主。思想性的作品也包括社會主義一類，但以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的印象較深。大杉榮全家被日本軍人坑殺一事，曾經在他的心靈產生了不小的震撼。(註三〇)

二年級時，一堂自由作文課由學生自擬題目，楊達才剛看完新渡戶稻博士的《修養論》，覺得書中論點不過是古代的教條，和現代生活格格不入，因此提筆批評。剛從日本來的老師在同學面前朗誦這篇文章，對其批評精神大爲嘉許，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註三一)

當時，臺灣的民族運動正方興未艾，東京臺灣學生會組織文化講演團，利用暑假返臺，巡迴全島各地，展開文化的啓蒙運動(註三二)。楊達也結交了幾位這樣的朋友，在思想上受到啓發。臺灣所能閱讀的課外讀物，已經無法滿足他日益強烈的求知慾，加上不滿意於父母爲他安排的婚

姻，一九二四年，年方十九歲的楊達毅然啓程前往日本，吸取更多的新知。在寄回家的第一封信中，他堅決地表明童養媳的問題不解決，就不回臺灣的立場（註三三）。後來梁盒嫁給楊達公學校時代的一個同學，聽說婚姻幸福美滿。（註三四）

初到人地生疏的日本，正是世界經濟大恐慌日漸嚴重的時代，楊達到處打零工，有一頓沒一頓地過著艱苦的生活。第二年進入日本大學藝術科就讀，白天勞動，晚上讀書。在日本國會大廈當水泥工時，還差點一命歸陰（註三五）。此時正值東京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蓬勃發展之際，楊達也參加了「打倒田中反動內閣」的示威遊行（註三六），揭開他一生社會運動的序幕。後來聲援朝鮮人反對日本侵略政策的演講會，嘗到了生平第一次坐牢的滋味，拘留三天（註三七）。這時臺灣的社會運動已達高潮，農民、工人、文化等各種團體紛紛成立。來自臺灣各界的信函頻頻催促楊達返臺，雖然學業尚未完成，島內急迫的情勢卻促使楊達整裝，於一九二七年回到臺灣。（註三八）

回臺後的兩年間，楊達活躍於臺灣農民組合，輾轉中、南部各地實際領導農民運動（註三九），並因而結識志同道合的女中豪傑——葉陶（註四〇），兩人在往後的日子裡並肩作戰，成為親密的伴侶。日據時期楊達總共坐牢十次，刑期合計四十五天，最長的一次是十七天。那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楊達和葉陶參加臺南總工會大會演講完，次日清晨正打算回新化舉行婚禮時雙雙被捕，手銬腳鐐地扣在一起，楊達戲稱這一次是官費的蜜月旅行（註四一）。全島同時被捕的還有很多位農民組合的重要幹部，使得農組的活動幾乎停擺，史上稱為「二·一二」事件（註

四二)。四月時，楊達與葉陶在新化補行結婚典禮。婚後並暫居新化楊家，葉陶則縫製囚仔衫零賣。(註四三)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霧社事件爆發，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臺灣民衆黨被解散，年底時臺灣共產黨因遭受檢舉而崩壞。日本政府對於抗日運動彈壓地更爲厲害，社會運動遭受毀滅性的重挫。楊達在這段時間內遷居高雄，租了一棟據說經常鬧鬼的房子居住。葉陶發明了小孩穿的開襠褲，申請專利，請人幫忙縫製，生意不錯。不料被中盤商倒債，生活頓時陷入困境，米缸中經常是空的，楊達只好上山砍柴，維持生計(註四四)。一九三二年長男出生時，楊達身上只有四個銅板，連到高雄請助產士的車資都付不起，這個男孩子在就近找個婆子接生的情況下出世，被命名爲「資崩」。(註四五)

雖然爲了生活奔波不停，社會運動被迫停止之後，反而讓他有較多的心思投注於文學創作。首次以「楊達」爲筆名發表的小說〈送報伕〉(日文原名〈新聞配達夫〉)，經賴和之手刊載於《臺灣新民報》，但後半部被查禁，只登了一半。一九三四年(三十歲時)，加入《臺灣文藝》編輯委員會的行列，負責日文版編輯。十月時，〈送報伕〉全文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是臺灣人首度進攻日本文壇(註四六)，對本島文藝作者的激勵自然不在話下。雖然這一期的《文學評論》被禁止在臺灣販售，報紙上卻相繼出現評論的文字(註四七)，使得楊達聲名大噪，從此奠定了在臺灣文壇的地位。次年，因與張星建選稿意見不合，退出《臺灣文藝》，與葉陶創立「臺灣新文學社」，刊行《臺灣新文學》雜誌(註四八)。一九三七年，雜誌在無奈中



停刊（註四九）。六月時，楊逵第二度前往日本，企圖與日本文化界合作，將《臺灣新文學》寄生在《日本學藝新聞》、《星座》、《文藝首都》等雜誌中（註五〇）。並曾經匿身於東京鄉郊的鶴見溫泉旅社中，將〈田園小景〉一文改寫成〈模範村〉，交給改造社發表。九月回臺（註五一）。十月二十日，報載日本開明份子被捕百餘人，〈模範村〉因此遭到退稿的命運，到東京談妥的計劃也成了泡影。（註五二）

這時的楊逵因過度操勞罹患肺結核，葉陶也病倒。一生中最高為艱苦的就是這段歲月，爲了欠米店的二十圓，還被告到法院（註五三）。就在這個負債而四處碰壁的日子裡，日本警察入田春彥慷慨解囊，濟助一百圓。楊逵還清債務之後，用餘款在現今臺中市五權路附近，舊時火葬場邊，租了大約一千坪的一塊土地種花，借伯夷、叔齊的典故，命其名爲「首陽農園」（註五四）。並在報上發表〈首陽園雜記〉（註五五），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當「皇民化」運動籠罩住整個臺灣島的文化運動時，楊逵則專心照料著首陽農園，鮮少與外界來往。葉陶也充當賣花婆，一家人過著蝥居的生活。

一九四一年四月九日「皇民奉公會」成立，各地也普遍組織「藝能奉公會」，全力動員文學界爲日本政府工作。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開打，臺灣總督府官方雜誌《臺灣時報》向楊逵邀稿，〈泥娃娃〉（泥人形）與〈鵝媽媽出嫁〉（鵝鳥の嫁入）相繼發表後，引起日本總督府內開明人士和迷信武力的軍警間之摩擦。等到這兩篇文章和其他作品合併要出單行本時，終於遭到查禁的命運！（註五六）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在日本政府的壓迫下，楊達於《臺灣文藝》發表〈首陽解除記〉，公開宣布卸下首陽農園的招牌。十二月，楊達為「臺中藝能奉公會」改編自俄國人的劇本《怒吼吧！中國》出版。劇中假借鴉片戰爭時期英國侵華的史實，影射日本人欺負中國人的真相。在臺北、臺中、彰化三地以日語演出時，曾經博得滿堂喝彩。獲取日本政府的允許，該劇擬用臺語再次演出。楊達於自己的花園內組織「焦土會」，以祖國焦土抗日的心情，召集了三十多位朋友，一邊翻譯，一邊進行排練。戲未上演，八月十五日（西元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明治天皇在廣播中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註五七）。在日本凌虐五十個年頭後，臺灣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這一年，楊達四十歲。

### 第三節 臺灣光復後的楊達

日本投降的喜訊傳來，楊達立即在自家的花園門前掛上「一陽農園」的招牌，熱烈慶祝新時代的來臨（註五八）。政府接收以前，臺灣全島處於政治真空期中，日本政府與警察都不再出面維持秩序，但是臺灣青年卻自動自發在各街庄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肩負起各地治安的工作（註五九）。臺中方面，因為沒有警察的管理，人行道被攤販佔據，馬路上垃圾堆積如山，臭氣四溢。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楊達在家中和一群青年朋友們決定在八月三十一日成立「新生活促進隊」，負責處理街上的垃圾。所以選在第三天，是因為要大家在次日分頭聯絡更多人來共襄盛舉。楊達

也在第二天時，拜訪臺中市「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黃朝清博士，說明活動的宗旨，並得到他樂於協助的承諾（註六〇）。因為當時的蔣委員長曾經號召過新生活運動，甫回到祖國懷抱不久的臺灣同胞視其為救星，心中仰慕萬分，便將這次的活動組織命名為「新生活促進隊」。（註六一）

活動之前，楊達擬好義務勞動，不收取分文報酬；以及喚醒民衆的醒覺，使臺灣同胞能自覺自理的兩項原則，具有深遠的意義（註六二）。參加的成員都自備竹帚和畚箕清掃街道。葉陶站在街頭演說，激起群衆的熱情。參加的人越來越多，居民們也自動供應茶水、香煙和點心，響應這次的義行（註六三）。美中不足的是：少數成員向居民索取報酬，以致活動變質，造成內部的摩擦，在這些不肖之徒還錢之後，才終於平息了衆怒。（註六四）

「新生活促進隊」結束後，一些黑道份子主動找上楊達，表示願意組織臺中市內所有的「兄弟人」，維持社會秩序。楊達和朋友們將這群人組成「民生會」，接管錦町派出所（註六五）做為本部，負責臺中市的治安工作。約定該會以地主、商人的捐獻解決生活問題，任何人不得私自接受捐助、索取酬勞，或者有任何粗暴的行為出現。可惜組成份子過於混雜，某些會員公報私仇，或藉「民生會」做掩護，暗中行使不法情事。活動也因而走樣，失去了原有的意義。（註六六）

在這段期間內，楊達也積極投身文藝活動，教育民衆。九月間創刊《一陽週報》（註六七），介紹國父思想和三民主義，並轉載大陸地區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作品（註六八）。一九四六年，加入臺灣評論社，擔任臺中《和平日報》（註六九）「新文學」版的編輯。三月時，日文小說集《鵝媽媽出嫁》在臺北三省堂上梓（註七〇），楊達終於擁有生平第一本出版的作品選集。次年任《

文化交流》(註七一)雜誌編輯，但這本雜誌僅出版一期即告夭折(註七二)。二二八事件發生，楊達和葉陶在四月間雙雙被捕下獄，八月被釋放後，即致力於翻譯大陸作家的作品，並以中日文對照的方式介紹給臺灣同胞。(註七三)

一九四八年，主編《力行報》之「新文藝」欄，八月十日創刊《臺灣文學》(註七四)，共出版三輯後停刊。同年底，租借臺灣電力公司在臺中市北區的一塊土地，開墾做為該公司的福利農場(註七五)。一九四九年，起草《和平宣言》，一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公報》報導《和平宣言》的消息，楊達因而觸怒即將走馬上任的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於四月六日被捕，經宣判處十二年徒刑。一九五一年(四十六歲)移監綠島。一九五八年，一度因政府欲派其至日本做特務工作而送回臺灣。因中日大勢改變，又被押返綠島。(註七六)

楊達在綠島時期，仍然勤於練習用中文寫作，創作不少的散文、小說，並寫作戲劇底稿，作為晚會及街頭表演之用。短篇小說《壓不扁的玫瑰花》(舊題《春光關不住》)(註七七)和劇本《牛犁分家》，就是這個時期的產品。

另一方面，楊達入獄期間，葉陶獨自撑起整個家庭，年長的三個孩子也都輟學在家，接替父親墾植的工作(註七八)。一九五七年時，電力公司限期交還土地，作為增建員工宿舍之用。葉陶攜么女遷至臺中中港路一段淡溝里淡溝巷住下，仍然經營花園(註七九)，在忙碌的生活外，還經常替人排難解紛。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楊達終於刑期屆滿，回到睽違已久的家園和親人團聚。五月時，古道熱腸的葉陶當選模範母親。面對已能自立的兒女，五十六歲的楊達決心靠自己的力

量，再用鋤頭開墾出一個新樂園，實現繫獄時間朝夕期盼的夢想。並且迫不及待地在高雄買下一片果園，做為實現夢想的第一步。但是隨之而來的土地糾紛卻讓他傷透了腦筋（註八〇）。恰好楊肇嘉正計畫找人代寫回憶錄，楊達就接受他的請託，隻身前往清水楊家住下。次年，由於兩人對於史實解釋的角度不同，楊肇嘉又堅持己見，楊達乃辭職他去。（註八一）

離開楊肇嘉後的楊達，借貸在東海大學對面買下一塊三千坪的山坡地。其實楊達早就看中臺中近郊的大度山，夢想在這個地方設計農園，種些花木水果，過著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但是要開墾眼前的這塊不毛之地談何容易？親人朋友都持反對的意見，唯有葉陶依舊支持他。在鄰近農民「大傻瓜」的嘲笑聲中，荒野地終於化為繽紛燦爛的花園，楊達用自己的雙手證明了鐵錫也能在大地上寫出美麗的詩篇（註八二）。這就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東海花園」。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在多年的操勞後，葉陶終於因心臟病、腎臟病併發尿毒症而去世，享年六十五。臨走前仍殷切叮嚀楊達善自珍重（註八三）。對楊達來說，失去的不僅僅是情深愛篤的賢內助，更是一生志同道合的親密戰友。

東海花園漸上軌道之後，楊達在臺灣文壇的評價也逐步升高。一九七六年，〈壓不扁的玫瑰花〉被收入國中國文教科書第六冊，是日據時期臺灣人的作品被收錄在教科書中的第一次。青年學子紛紛慕名前來，在繁重的園藝工作之外，楊達因為接待各方來的朋友而更形忙碌（註八四）。同年九月，楊達在政大中文系任教的尉天驄，及臺大的吳宏一推薦下，參加第二屆國家文藝獎的選拔。十二月二十五日結果揭曉，得主是《梅村心曲》的年輕女作家謝霜天，楊達落選。（註八

五)

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凌晨，楊逵因感冒藥物引起的痰阻塞症送醫急救。住院四天後，在子女的簇擁下遷居外埔次子楊建家。次年元旦假期移居大溪長子家（註八六）。八月二十八日，由長媳蕭素梅陪同，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赴美，受到僑界熱烈的歡迎（註八七）。十月三十日，「臺灣文學研究會」在洛杉磯正式成立，楊逵成爲該會的榮譽會員，並親自出席成立大會致詞勉勵（註八八）。回程重遊東京，日本的文化界爲他舉辦座談會，稱其爲臺灣文學的瑰寶，推崇倍至。（註八九）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離開大溪，因當地環境不適合整理回憶錄，移居鶯歌，由孫女楊翠照料生活起居（註九〇）。十月間還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在增額立委選戰中爲楊祖珺助選（註九一）。十一月時，以對臺灣文學的貢獻和社會文化運動的積極參與，榮獲第六屆吳三連文學獎，和第一屆臺美基金會的傑出人才獎（註九二）。一九八五年二月重返臺中，由么女楊碧照顧。三月十二日在楊碧家中與世長辭，享年八十。走時，手中還緊緊握著放大鏡，桌上攤著前一天晚上的報紙。三月二十九日，葬於東海花園葉陶墓旁。（註九三）

#### 第四節 楊逵的交遊情況

楊逵一生活躍於社會運動和文學界，臺灣文壇的作家和民族運動、階級運動中的知名人物，

大多是其舊識，不過淵源深淺有所不同罷了！其中以賴和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可以算是最為知己的兩個朋友。

## 一、賴和與楊達

楊達是因參加社會運動而認識賴和，並且經常有接觸的機會（註九四）。一九二八年楊達經由他的幫助，在彰化賴和醫院附近租了一間茅草的小房間和葉陶同居，從此經常和其他文友出入賴和家中翻閱報章雜誌。萬一有誰身體不適，賴和則義務為這些朋友們診療。（註九五）

楊達在高雄以砍柴為生時，曾經寄給賴和幾篇小說創作，賴和並且親自為他潤飾文章。尤其〈送報俠〉一文更是經賴和之手刊載於《臺灣新民報》上，這也是他首度以「楊達」為筆名發表的作品，可惜只登了一半就被查禁（註九六）。關於這個筆名的由來，楊達初投稿時也不會積極尋思過筆名，只是偶爾署名「楊達」，便將文章寄給賴和。一次，被賴和用紅筆圈去「達」字，改成「達」字。更改的理由從不曾被說明，楊達卻因為新改的「達」字聯想到李達而欣然接受（註九七）。由於十六歲在糖業會社當臨時工時，曾經被日本同事戲稱為「楊貴妃」而厭惡本名，從此「楊達」就取代了「楊貴」，成為臺灣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名字（註九八）。

一九三四年「臺灣文藝聯盟」成立，這時原本已和文藝界朋友失去聯絡的楊達，經由賴和的促成，參加《臺灣文藝》的編務工作（註九九）。並在他的安排下，舉家遷往彰化。長子資崩因長

期營養不良罹患夜盲症，而接受賴和的細心治療。（註一〇〇）

〈送報伏〉在《臺灣新日報》遭到腰斬的命運，替它催生的賴和當然不無遺憾。楊逵再搬到彰化後，這篇小說終於在《文學評論》上全文登出。後來賴和知道中文版的〈送報伏〉，分別被選錄於《山靈——朝鮮臺灣小說集》以及《弱小民族小說選》時，高興地流下了眼淚。並且稱讚這一篇作品勝過其「過去所有作品的總和」（註一〇一），給予楊逵極大的鼓勵。

賴和雖然只比楊逵早生十年，但是兩人的關係既像父子，又像兄弟，無所不談（註一〇二）。當楊逵潦倒時，賴和總會伸出援手。在因「臺灣文藝聯盟」的派系之爭，而退出《臺灣文藝》編輯的行列，發行《臺灣新文學》雜誌時，賴和為他負責中文部分的編輯。賴和在人格與文學創作方面給予他極為深遠的影響，楊逵就曾經表示，自己在逆境中未曾餓死或投降的氣力與耐力，大半是由林幼春與賴和兩人來的（註一〇三）。賴和不僅不厭其煩地為楊逵修改文章，在創作方面開啓他的心智；兩人的作品也都因為反映社會低階層貧苦百姓的生活，有著極為相似的主題。一九七六年八月，楊逵在接受《夏潮》雜誌訪問時，就曾經表示過，自己在臺灣作家中和賴和最親近，文風也最相似（註一〇四）。不同的是：楊逵作品中展現出的社會意識，是賴和文學所沒有的（註一〇五）。但思想型態的差異，並不妨害他們成為文壇的知己。

## 二、楊逵與入田春彦



入田春彥是日本籍的警察，平時喜好文學，自己也能創作。筆名有鄉親良、郷はる子、高英、大伴英彥、洪春卿等。（註一〇六）

一九三七年，入田春彥因為讀過楊達的〈送報伏〉而深受感動，乃央求臺灣新聞社副刊主編田中保男帶領他，前去拜訪楊達。這時楊達正由於無法清償欠米店的債款被法院傳訊，弄得山窮水盡之時。當天三人飲酒聊天，十分盡興。入田春彥走時，送給楊達一百圓。楊達在還清所有債務後，又以剩餘的款項租借兩百坪的土地，創辦首陽農園。（註一〇七）

不久，入田辭去六年的警察生涯，經常造訪楊達。雖然兩人結為好友，這位二十多歲、安靜、神祕的年輕人，卻從不曾說明自己的來歷。楊達由其每月訂購的美國《新民眾》雜誌，和英文版的《莫斯科新聞》，推測他大概是從事左翼運動的知識份子。（註一〇八）

因為慷慨解囊幫助楊達，又經常出入首陽農園，入田春彥在派出所扣留數日後，被限令返回日本。釋放不久，在住處服安眠藥自殺。當楊達趕到時已經呈現彌留狀態，口中依然不停地喚著楊達長子資爾的名字。遺書兩封，一封給楊達，只表示楊達了解他對中國人的感情；另一封給葉陶，請她料理後事，並願將自己的骨灰充當花卉的肥料，灑在農園（註一〇九）。楊達火化他的遺體，把骨灰收藏起來。一九四九年被捕後，骨灰寄存於臺中寶覺寺，直到今天。其間，楊達曾經設法聯絡他在日本的親人，終究未能如願。（註一一〇）

入田春彥的遺物中有一套改造社刊行的《魯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刊行，全部七卷）（註一一一），這是楊達接觸到魯迅作品的開端。光復後，楊達曾經以中日文對照的方式刊行

了《阿Q正傳》，這套《魯迅全集》發揮了極大的功用。（註一一二）

因爲入田春彥的資助才能開闢首陽農園，安然度過戰爭期，直到臺灣光復，這一點，楊達對於入田春彥始終心存感激（註一一三）。和入田春彥交往的經驗，對於楊達的思想也有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一份超越種族的友誼，證實了楊達一向信仰的社會主義的世界觀，是經得起考驗的一種哲學。因此楊達不致被狹隘的民族主義所限制，而能懷抱著一份恢宏的世界觀，至於終老。（註一一四）

註釋：

一 臺北、筆架山出版社，民國六九年九月臺初版。

二 林梵曾經計畫要將《楊達畫像》一書重新改寫，補述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十年空白。不過至今尚未見到相關的文章發表。參閱楊建著《整理遺稿，重返東海花園》，《自立晚報》，民國七八年四月十九日。

三 「臺灣民主國」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到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十月十九日逃離臺灣爲止，共歷時四個月又二十四天。見楊碧川編《臺灣歷史年表》，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七七年六月初版，頁九五、九八。

四 《臺灣歷史年表》，頁九四、九八。

五 依據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所云：「一八九六年三月一日，臺灣從軍政回復民政，同月

三十日公佈法律第六三號「關於應在臺灣施行的法令之依據」。當時，帝國議會所制定公佈的法律，以每一個年度做單位，依次編號，這個法律是第六三號。臺灣人政治運動者常常引用這個法律，並簡稱為「六三法」。六三法在考察總督權力上，是很重要的資料，在此列出全文。

明治二十九年法律第六三號。

第一條 臺灣總督得於其轄區內，頒佈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第二條 前條命令應由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議決，經拓殖務大臣呈請勅裁。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之組織以勅令定之。

第三條 情況緊急時，臺灣總督得不經前條第一項手續，立即頒佈第一條所規定的命令。

第四條 依前條頒佈之命令，於頒佈後立即呈請勅裁，且向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報告之。

不能獲得勅裁許可之時，總督府立即公佈該命令此後無效。

第五條 現行法律及將來頒佈之法律，其全部或部分要施行於臺灣者，以勅令定之。

第六條 此法律自施行日起滿三年即失效。」

雖然法律中明確規定有效期限只有三年，但之後一再延長。「三一法」及「法三號」頒佈以後，總督的律令制定權雖然漸次縮小，本質上並沒有多大的改變。見《臺灣總督府》，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民國七八年五月初版，頁二一七—二二三。

六 《臺灣民族運動史》即稱六三法是「臺灣一切惡法之所由來」。蔡培火、吳三連等著，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七六年元月四版，頁五三。

七 《臺灣總督府》，頁九四。

八 噍吧哖事件是由曾經擔任巡查補的余清芳所領導的獨立運動，以西來庵為籌謀革命的基地，因此又稱「西來庵事件」。事發之後，日軍曾屠殺噍吧哖（今臺南玉井）的百姓。事件經過詳見王詩琅著《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臺北、衆文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初版，頁一〇二—一四二。

九 盧修一著《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臺北、前衛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五月第一刷，頁五八—六一。

十 張炎憲著《日治時代臺灣社會運動——分期和路線的探討》，見《臺灣風物》卷四十期二，民國七九年六月，頁八—九。

二 據林明德《日本史》記載，事件的始末如下：日本「自一九一六年起，因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實質工資反降，其後米價繼續攀高，勞工與低層公務員的生活愈為困苦。一九一八年夏，勞資糾紛在各地頻起，富山縣一漁村的主婦們阻止運往外縣市稻米船隻所引起的『搶米事件』，波及全國各主要都市和農村地區。群眾要求米店售米，政府出動軍警彈壓，數萬人被捕，此一事件迫使寺內內閣總辭。」臺北、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初版，頁三三六。

二 山邊健太郎著、鄭欽仁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見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臺北、帕米爾書店，民國七四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一三一—一三二。

三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臺北、帕米爾書店，民國七六年五月再版，頁一九九—二〇九。

四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三〇。

- 一五 根據楊碧川《臺灣歷史年表》的記載，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始於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日。見該書，頁一〇。
- 一六 《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頁一八六—一八七。
- 一七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一四九—一五三。
- 一八 一九三二年，以林烈堂、林獻堂兄弟為中心，賴各方之踴躍捐輸，臺中中學校成立，此即現今省立臺中一中的前身。創立經過見《臺灣民族運動史》，頁三五—五二。
- 一九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一四六—一四七。
- 二〇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一五三。
- 二一 《臺灣民族運動史》，頁七五。
- 二二 楊遠口述，王世勛筆記〈楊遠回憶錄〉，見陳芳明編《楊遠的文學生涯》，臺北、前衛出版社，民國七八年二月十五日臺灣版第二刷，頁一四三—一四五。
- 二三 戴國輝、內村剛介訪問，陳中原譯〈楊遠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遠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見《文季》卷一期四，民國七二年十一月，頁一〇—一一。
- 二四 日本人秋澤烏川著，一九二三年四月五日，由臺北杉田書局出版。
- 二五 楊遠著〈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聯合報》，民國七年八月十日。
- 二六 依〈楊遠回憶錄〉的說法，梁盒是在楊遠九歲時住進他家。《楊遠畫像》則說是楊遠十二歲時。依楊遠著〈再婚者的手記〉一文所記載，應是十二歲時方為正確。九歲之說，顯係楊遠晚年記憶有誤。見《楊遠的文學生涯》，頁一五五，《楊遠畫像》，頁五九，《民俗臺灣》卷四期二，昭和十九年二月

，頁三〇。

二七 見註二二所引資料，頁一五〇—一五一。

二八 見註二三所引資料，頁一二—一三。

二九 《楊遠畫像》，頁五八。

三〇 見註二二所引資料，頁一五二。

三一 廖偉竣訪問、楊遠口述。見廖偉竣著〈不朽的老兵〉，楊素娟編《楊遠的人與作品》，臺北、民衆日報出版社，民國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初版，頁一八八。

三二 《臺灣民族運動史》，頁九二。

三三 見註二二所引資料，頁一五四—一五五。

三四 《楊遠畫像》，頁六四。

三五 見註二二所引資料，頁一五五—一五六。

三六 根據楊遠的回憶，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我到東京一兩年後，日本內閣改組，軍閥抬頭，由田中義一大將當了總理大臣。他向日本天皇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摺，認爲東北是日本的生命線，主張以武力奪取並侵略中國。當時，日本一些反對侵略戰爭的知識份子與工會聯合，在日本皇宮「二重橋」前舉行了一次『打倒田中反動內閣』的示威遊行。這是我參加和平運動的第一次。」同註二五。

三七 同註二五。

三八 楊遠著〈沈思·振作·微笑〉，《自立晚報》，民國七四年三月十三日。

三九 河原功著、楊鏡汀譯《楊遠生平寫作年表》，楊遠作、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

時代⑦楊遠集》，臺北、前衛出版社，民國八十年二月一日初版第一刷，頁三六五。

四 葉陶，一九〇四年舊曆三月七日生於高雄旗後。父葉賜、母黃美。任教第三公學校（現高雄三民國校）時，受同事簡吉影響，放棄教職而獻身農民運動。

四 同註三八。

四三 《日本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昭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發行，頁一一〇三。

四二 王麗華著〈關於楊遠回憶錄筆記〉，收於陳芳明編《楊遠的文學生涯》，頁二八四。

四一 同註四三，頁二八五—二八六。

四〇 同註二五。

三九 同註二五。

四〇 如徐瓊二著〈評楊遠氏作〈送報俠〉〉，〈臺灣新民報〉，昭和九年十月十一日。賴健兒著〈送報俠，關於楊遠君的作品〉，〈臺灣新聞〉，昭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王氏琴著〈送報俠——女性如是觀〉，〈臺灣新聞〉，昭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四〇 同註二五。

四〇 關於《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詳見第三章第三節。

五〇 楊遠著〈光復前後〉，〈聯合報〉，民國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五〇 同註三一，頁一九五—一九六。

五〇 同註五〇。

五 同註三八。

五 楊資崩著〈我的父親——楊遠〉，《聯合報》，民國七五年八月七日。

五 該文發表於《臺灣新聞》，昭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

五 同註五〇。該書即昭和十九年印刷中被查禁的《萌芽》一書。共收錄楊遠的〈萌芽〉、〈不笑的小孩〉、〈無醫村〉、〈鵝媽媽出嫁〉及〈犬猴鄰居〉五篇小說。

五 同註二五。

五 同註二五。

五 吳濁流著《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民國七七年八月臺灣版初版，頁一六〇。

六 鍾逸人著《辛酸六十年》，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民國七七年六月初版，頁二八三—二八四。

六 鍾天啓（即鍾逸人）著〈瓦寮寮裡的楊遠〉，《自立晚報》，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六 同註六一。

六 同註六一。

六 同註六一。

六 《辛酸六十年》云，錦町派出所是在「現在的中正路和平等街口面西，舊消防隊隔鄰的臺中市最早最中心的二樓建築物。」

六 《辛酸六十年》，頁二八八—二九一。

七 根據葉芸芸的研究：一陽週報「一九四五年九月間在臺中市創刊。每週六出版。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第九期後停刊。楊遠主編。」見其著〈試論戰後初期的臺灣智識份子及其文學活動（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九年），《文季》卷二期五，民國七四年六月，頁六。

六 以《一陽週報》第九號「紀念、孫總理誕辰特輯」而言，該期目次如下：

紀念 總理誕辰	楊遠	二
紀念 總理誕辰	蕭佛成	三
如何紀念 總理誕辰	鄧澤如	四
紀念 總理誕辰的感想	陸幼剛	五
紀念 總理誕辰的兩個意義	胡漢民	七
孫文先生略傳（下）	.....	一〇
中國工人解放途徑（二）	孫文	一一
農民大聯合（二）	孫文	一三
中國革命史綱要（三）	孫文	一五
三民主義大要（三）	達夫	一八
犬猿鄰組（下）	楊遠	二〇
創造（二）	矛盾	二三

頁九並有廣告，《一陽週報》版書內容如下：

### 三民主義解說

孫文先生著：民權初步、附五權憲法地方自治實行法

第一次、第二次合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孫文先生著：倫敦蒙難記

包爾林百克著：孫中山傳

蔣介石先生著：新生活運動綱要

可見楊遠此時是多麼熱衷於介紹三民主義給臺灣的民衆。見《一陽週報》第九號，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發行。

六 《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在臺中市創刊。發行人韋佩弦、賈鑑心。社長李上根中將，主編樓憲，翻譯科長楊克煌。」同註六七，頁八。

七 共收錄〈鵝媽媽出嫁〉、〈種地瓜〉、〈歸農的日子〉、〈無醫村〉四篇小說。

八 《文化交流》：「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創刊，僅出版一期。發行者臺中市文化交流服務社。主辦人藍更興（藍運登），編輯張禹、楊遠。」同註六七，頁八。

九 根據鍾逸人的敘述，雜誌只辦了一期的原因是因為藍運登「看不慣葉陶推銷『貧窮』，又漸與楊遠疏離，因而創刊不久的《文化交流》便告夭折。」見《辛酸六十年》，頁二九三。

十 中日文對照方式出版的《中國文藝叢書》，由臺北、東華書局發行，臺中、平民出版社總經售。共有六輯：

一、《阿Q正傳》，魯迅作，楊遠譯。

二、《大鼻子的故事》，茅盾作，楊遠譯。

三、《微雪的早晨》，郁達夫作，楊遠譯。

四、《龍朱·夫婦》，沈從文作，黃燕譯。

五、《黃公俊的最後》，鄭振鐸作、楊遠譯。

六、《送報伏》，楊遠作、胡風譯。

七、《臺灣文學》：「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創刊，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第三輯後停刊。發行人張歐坤，編輯臺灣文學編輯部楊遠負責。」同註六七，頁九。

八、楊建著〈一個支離破碎的家〉，《綠島家書》，臺中、晨星出版社，民國七六年三月二十日初版，頁二。

九、同註四三，頁二七七—二七八中楊遠之回憶。唯其記憶有誤，依楊建所言，楊遠被借提至臺北，是一九五八年的事情。《綠島家書》，頁三。該年楊遠之綠島家信缺一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一日，約半年的時光，大概因為其中大部分的時間人在臺北的緣故。

十、春光因與性衝動文意相通，為避免中學生引起不好的聯想而改題。戴國輝、若林正文訪問〈臺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遠關於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見《文季》卷二期五，民國七四年六月，頁四二。

十一、楊素絹著〈心襟上的白花——父親與我，兼記母親葉陶女士〉，見《聯合文學》卷一期八，民國七四年六月，頁二九。及註七五所引資料，頁三。

十二、見註七五引書，頁三。

十三、《楊遠畫像》，頁一五八。

十四、後來楊肇嘉回憶錄由三民書局出版。因為貶損養父，招致楊天賦以「先人無端受辱」登報聲明，引起不小的爭端。事情經過參閱林曙光著〈楊遠與高雄〉，收於《楊遠的文學生涯》，頁二五四—二五五。

六二 開墾東海花園的經過見楊遠著〈墾園記〉，收於《壓不扁的玫瑰》，臺北、前衛出版社，民國七五年四月一日三版，頁一九—二二。

六三 見註七八所引資料，頁二七。

六四 楊遠遺物中有一本筆記本，題為「臭皮匠烏白畫烏白寫」，是一九七七年東海花園訪客的「塗鴉本」，在其中簽名的人來自海內外各界。知名的文學界人士有鍾肇政、王世勛、洪醒夫、蔣勳、王拓、孟祥森……等。

六五 《楊遠畫像》，頁一九三—二二二。

六六 楊建著〈泥土的回歸——懷念先父楊遠先生〉，見《聯合文學》卷一期八，民國七四年六月，頁二二—二四。

六七 許達然著〈從東海花園到台北街路——紀念楊遠先生〉，見《文季》卷二期五，民國七四年六月，頁六九。

六八 許達然著〈臺灣文學研究會成立及章程〉，見臺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臺北、前衛出版社，民國七八年八月，臺灣版第一刷，頁三一—五。

六九 蕭素梅著〈安息吧！敬愛的父親〉，見《聯合文學》卷一期八，民國七四年六月，頁三四。

七〇 見註八六所引資料，頁二四—二五。

七一 當時楊祖珺競選的口號即為「壓不扁的玫瑰花」。

七二 陳永興著〈楊遠先生！您是來道別了嗎？〉，《中國時報》，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三 楊翠著〈永遠相陪伴〉，《中國時報》，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四 楊遠著〈臺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談我的一些經驗和看法〉，見《文季》卷一期一，民國七二年四月，頁三三。

五 楊遠著、明潭譯〈憶賴和先生〉，《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1 賴和先生全集》，臺北、明潭出版社，民國六八年三月十五月初版，頁四一二—四一四。

六 見註九五引書，頁四一五—四一六。

七 見註九五引書，頁四一七。

八 見註二二所引資料，頁一五〇。

九 楊遠〈希望有更多的平反〉，見王曉波編《被顛倒的臺灣歷史》，臺北、帕米爾書店，民國七五年十一月，頁二二九。

一〇 同註五四。

一一 見註九九引書，頁二三〇。文中楊遠將《弱小民族小說選》誤為《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集》。

一二 見註九九引書，頁二二八。

一三 楊遠著〈臺灣新文學的二位開拓者〉，見其著《羊頭集》，臺北、輝煌出版社，民國六五年十月，頁二四〇。

一四 〈楊遠訪問記——我要再出發〉，見《夏潮》卷一期七，民國六五年十月，頁五二。

一五 黃武忠云：「談到日據的五十年內臺灣新文學的構成，它們抗議的層次是有分別的。最先是賴和為代表，他們強烈的抗日意識，幾乎是抱著一種犧牲的精神。其次是楊遠等人，他們也繼承了這種抗日

意識，但已有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段話是參加聯副「永不熄滅的燭火——光復前臺灣文學中的民族意識與抗日精神」座談會上的發言，見《聯合報》，民國六九年七月七日。

二〇六 見《臺灣新聞》，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之「學藝消息」。

二〇七 見註二三所引資料，頁二三。

二〇八 見註二三所引資料，頁二四—二五。

二〇九 同註五〇。

二一〇 見註二三所引資料，頁二五。

二一一 見註二三所引資料，頁二四。

二一二 葉石濤著〈日據時期的楊逵——他的日本經驗與影響〉，見《聯合文學》卷一期八，民國七四年六月，頁二一。

二一三 見註二三所引資料，頁二七。

二一四 同註一一二。

# 第二章 楊逵的社會運動

本章所謂的「社會運動」是借用日本人的說法，對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有目的意識的反抗、改革以及革命運動的總稱。（註一）

西元一九二七年是臺灣社會運動發展的轉捩點，原來以民族自決主義為基礎的統一陣線，由這一年開始形成階級運動與民族自決主義各團體的分裂（註二）。但是由於臺灣具有殖民地的特殊性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民族成分的不同，在經濟上享有絕對優勢的資本家，又以殖民政府的強權為後盾，壓迫臺灣貧苦的工農大眾，因此階級鬥爭之中就帶有民族運動的色彩；相對地，民族運動也帶有階級運動的性格（註三）。這是馬克斯主義能主導當時的社會運動，並且造成文化協會分裂與工農運動左傾的重要原因。也就在一九二七年，楊逵由日本返臺，加入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活動，從此成為臺灣史上著名的社會運動家。

## 第一節 楊逵的社會意識

一九一五年的噍吧哖事件，對於楊逵一生活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雖然當時只是個九歲的孩子

童，有關事情的原委並不十分了解，但是暴力血腥的屠殺事件，在他心裡留下了極為恐怖的印象。十四歲時親眼目睹時常受到父親照顧的小販，遭日本警察活活打死（註四）。加上後來又親身體驗日本人對待臺灣人種種不合理的待遇，使他心裡激盪出了民族意識。然而直到信奉了社會主義，才完成他從事社會運動的理論架構。〈送報伏〉中勞動階級超越民族界線的合作，迫使資本家讓步，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就是楊達社會思想的具體展現。

根據楊達自述，他在中學時代就已經接觸過思想性的書籍，其中包括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註五）。後來大杉榮被日本軍人殘殺一事（註六），在他心裡造成極大的衝擊，才對思想方面覺醒並注重起來。（註七）

一九二四年，楊達東渡日本，正值經濟蕭條的時代，勞資糾紛和地主、佃農間對立的事件激增，勞農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註八）。日本共產黨也已經在一九二三年的七月非法成立（註九）。一九二〇年，幾個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學校組成「日本社會主義同盟」。一九二三年，基於研究馬列主義思想的需要，日本學生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並於次年改稱「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該聯合會擁有遍布全國的五十八個支會組織，會員約有一千五百位（註十）。社會主義已然在日本大肆流行。

初到日本的楊達，在經濟不景氣、失業人口眾多的情形下，只得四處打零工來賺取生活所需，以至於時時陷入挨餓的狀態。也因此結識了許多處境相同的日本朋友，彼此對於資本家和老闆階級剝削勞工，騙取保證金的種種不合理、不人道的手段極為厭惡。這時他才「深深體悟到世界



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壓迫階級，一種是被壓迫階級。」（註一一）楊達的生活體驗，使其與另外留日的臺灣學生產生不同的思想。當時臺灣留日學生在經濟上較為富有，絕大多數出身於地主階級或資本家，像楊達這樣需要半工半讀供養自己的人極少，因此臺灣留日學生的民族意識高於社會意識，也就是高於階級意識（註一二），而楊達卻是階級意識高於一切。這是因為他在和日本人交往的過程中，享受到美好的日本經驗所致（註一三）。例如他從小受到恩師沼川先生的溫情關懷，在日本期間承蒙許多日本朋友的照顧，與日本勞工又有相同的際遇，彼此產生連帶感，自然而然接受了社會主義，認為被壓迫階級必須團結一致，才能抵抗壓迫者的欺凌，也才有解放的一天。儘管物質生活極為匱乏，他開始熱心地參加一些反抗性的示威遊行和聚會，並且在這段期間內閱讀了馬克斯的經典鉅著：《資本論》。（註一四）

當日本學生研究社會主義思潮蓬勃發展之際，臺灣學生間也受此影響，逐漸興起馬克斯主義研究的熱潮，因而影響到「東京臺灣青年會」（註一五）的分裂，形成民族自決與傾向共產主義學生之間的對立，楊達即是會中傾向共產主義學生中的重要份子（註一六）。並且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左右參與組織「臺灣新文化學會」，繼續馬克斯主義的研究（註一七）。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新文化學會的會員們說服青年會全體幹部，決議於青年會內籌組「社會科學研究部」，並於四月二十四日在高砂寮秘密集會，正式成立（註一八）。楊達也是當時領導幹部之一（註一九）。這個組織與日本、臺灣的左派團體都有聯絡，尤其是和文化協會左派及農民組合幹部之間，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註二〇）

雖然楊逵承認自己曾經熱衷於研究馬克斯主義，也從不否認自己是山川均（註二一）主義的信徒。但對於他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的問題，卻從來不肯正面答覆。被逼急了，也只是回答：「看《警察沿革誌》不就得了？」（註二二）以葉石濤與楊逵幾達四十年的交情，他斷定楊逵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臺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成立時加入臺共，後來並遵奉臺共東京特別支部的決議返臺領導農民運動（註二三）。然而根據楊逵自述以及《楊逵畫像》的記載，他是在文化協會連濶卿的力邀下，於一九二七年九月返臺（註二四）。那麼在東京特別支部成立時參加臺共的可能性等於零。事實上，目前已經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楊逵是個臺共。即使臺共中重要的幹部，例如蔡孝乾、謝雪紅、許乃昌、蘇新……等都是他的舊識。（註二五）

從另一方面來看，楊逵與日本共黨之間發生關係的時間，反而要比和臺灣共產黨之間來得早，可能也密切得多。比方他在日本期間經常出入勞動組合評議會，並曾經住在勞動農民黨的牛込支部，隨著該黨黨員前去聲援朝鮮人的抗議集會（註二六）。而勞動組合評議會與勞動農民黨在一九二八年，日本政府鎮壓左翼運動，大舉搜捕共黨領袖時，被列為具有共黨嫌疑的組織，並被內務省宣布解散（註二七）。其中勞動農民黨與臺灣農民組合間有極為深厚的淵源，一般認為它是日本共產黨化身的合法組織。

此外，楊逵未曾發表的遺稿中，有一篇以臺灣話文寫成的〈勞働者階級的陣營〉（註二八），重點在說明工會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對於工會與共產黨的戰術運用，也有極為深入的探討。文中提到最晚發生的世界共黨活動，是在一九二三年的德國，全篇內容著重於工會問題，有關農民

運動則甚少提及。推測寫作時間約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東京留學時期。當時楊達以半工半讀的方式求學，並且曾經深入考察工人的生活情況（註二九），尙未涉足農民運動，因而對於工會問題情有獨衷。在第十二項「階級鬥爭與組織」中，楊達這樣寫著：

……這個議論是忘卻了黨（筆者按；依前文內容，「黨」指的是「共產黨」）的組織型態要適應鬥爭方法去改變，而且不識黨還有個法子可以對待國家機關攻擊我們的合法組織。

由文意看來，楊達的確是以共產黨員自居。那麼他最初參加的很可能就是日本共產黨。由於共產黨在日本屬於非法組織，楊達若果真加入日共，其身分也是不能公開的。至於他是如何加入，何時加入？隨著其人的過世，大概成了永遠不可解的謎題！

無論如何，楊達當年返臺參加社會運動的動力來自於馬克斯主義，是毫無疑問的！就算是長子出生時，窮困到全身上下只剩四文錢，他仍然堅持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信念，為這個孩子取名為「資崩」（註三〇）。事實上，楊達前三個孩子的命名都別具深意。長女「秀俄」、長男「資崩」、次子「建」，已經露骨地表示他心目中理想社會建立的基礎（註三一）。在日本與勞工朋友共同承受被剝削的苦境時，他體會出被壓迫者必須團結一致，才有可能改造自己的命運，開創美好的未來，為反抗殖民政府與帝國主義找到一把強而有力的武器。

## 第二節 日據時期的社會運動與楊逵

楊逵在日據時期最重要的經歷，是參與臺灣農民組合的活動。

臺灣的農民運動事實上是日本殖民政策下的產物，尤其是和土地調查以及糖業的勃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臺灣總督府一方面透過土地及林野調查的方式，掠奪臺灣人的土地，將侵佔所得撥給退休的日本官吏和資本家。一方面又運用國家強權為後盾，幫助製糖工業為主的資本家兼併土地，因而導致農民的不滿（註三二）。此外，製糖會社在日本政府保護下，壓低甘蔗的收購價格，提高肥料的售價，剝削蔗農（註三三），原本已經窮困的農村生活更加疲弊不堪。一九二三、二四年間，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攻擊總督府的糖業政策、資本家與退休官吏的強佔土地，終於使得農民的意識覺醒，奠定農民運動的基礎。（註三四）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林蔗農組合」形成，為臺灣農民運動之濫觴。十一月，以簡吉為首的「鳳山農民組合」成立，開啓臺灣農民運動組織化的契機。次年六月，趙港組織「大甲農民組合」，農民運動蓬勃發展。各地的同志因為感覺到有聯合統一的必要，乃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成立「臺灣農民組合」，形成全島農民的大團結。（註三五）

日本的農民運動較臺灣發展得早，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在文化協會幹部的邀請下，日本勞動農民黨左翼運動健將麻生久與布施辰治來臺，擔任二林事件（註三六）的辯護律師。並在簡吉與

趙港等人的陪同下，於農村各地舉辦農民問題演講會，介紹日本的農民運動，推動建立農民組合。一九二七年，簡吉與趙港親赴東京帝國議會為農民問題請願，滯留日本期間，不但親身目睹了日本的農民運動，更與日本農民組合和勞農黨接觸，對於臺灣農民運動的發展有重大影響（註三七）。後來勞農黨並派律師古屋貞雄駐在臺中，擔任臺灣農民組合的顧問，藉著古屋貞雄的協助，臺灣的農民組合和日本、朝鮮的左翼運動保持聯繫，不但傾向社會主義，也朝向階級鬥爭發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臺中召開第一次大會後，臺灣農民組合確立採行馬克斯主義路線，強化了與左傾後的文協之間的合作，並且籌取共同的鬥爭行動。（註三八）

臺灣的農民運動在兩、三年間急速發展，由於領導人才的不足，在日本擁有豐富社會運動經驗的楊達受邀返臺（註三九）。一九二七年九月，楊達在臺北與連溫卿會面，旋即加入文化協會的巡迴演講會。不久，又分別在臺中和鳳山會見了趙港與簡吉，從此全力投入農民組合的行列。（註四〇）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全島大會召開時，楊達當選十八位中央委員之一，並在中央委員互選時，當選為常務委員。次年二月三日，又與簡吉、趙港、葉陶……等共同入選「特別活動隊」（註四一），該隊設置的目的在於進行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註四二）。楊達還身兼政治、組織、教育三項部長的職位（註四三）。然而大部分時間是在三義（三叉）至嘉義小梅（梅山）一帶的地方支部，實地領導農民運動（註四四）。直到一九二八年六月，被解除在農民組合中的一切職務為止。（註四五）

關於楊達被逐出農民組合的原因，依照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與簡吉意見不合，其中又包括了私人感情的對立，與路線鬥爭兩種因素在內。由於和葉陶的感情日益親密，種下了楊達遭受簡吉排斥的根源。後來在竹崎的農民運動中，兩人又因為意見相左而起爭執。之後，簡吉不但誣指楊達與葉陶因熱衷戀愛而將工作置於腦後，並散播謠言，宣傳楊達與連溫卿組織「反幹部派」（註四六）。被組織除名後，楊達滯留斗六農民組合處，工作仍有進展，但因不能得到本部的支持，加上日本警方檢束越緊，工作就慢慢停頓了下來。（註四七）

除了農民組合外，楊達在日據時期的另一個重要經歷是加入臺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七年十月楊達甫回國不久，就成爲分裂後新文協的會員（註四八）。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新文協的機關報《大眾時報》創刊號在東京發行（註四九）。楊達發表〈當前的國際情勢〉一文，並擔任該報的記者（註五〇）。同年七月九日，《大眾時報》在刊行第十號之後停刊。被逐出農民組合不久，楊達當選新文協的中央委員，並在彰化、鹿港一帶組織讀書會（註五一）。當楊達出任彰化特別支部駐在員時，曾經以理論鬥爭克服當地的無政府主義者，謀該支部之強化。在使彰化青年讀書會復活之際，也曾經計畫實行社會科學的研究，卻因此加深雙方的嫌隙。後來無政府主義者脫離文化協會與此不無關係。（註五二）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臺灣文化協會召開第三次全臺代表大會。農民組合排除楊達派，認爲連溫卿與楊達有聯絡的事實，乃於會中發出「關於抨擊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一派告各位代表檄」，主張抨擊連溫卿一派，農組成員得到王敏川的支持，連溫卿因而被文化協會除名。（

關於楊達被指為與連溫卿同派，兩人又各自遭到所屬組織除名一事，並非偶然，而是與整個臺灣社會運動路線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一九二〇年代，海內外的臺灣人遭到社會主義思潮的衝擊。一九二七年，文協左右派分裂，王敏川、連溫卿一派獲得勝利，階級運動成為臺灣人與日本殖民政府鬥爭的主線。一九二八年臺灣共產黨成立，臺共份子向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滲透。楊達大約知道農組中哪些人是臺共，但彼此間未曾有密切的接觸（註五四）。這時社會主義本身也發生分歧的狀況。在日本山川主義的沒落（註五五），連帶影響到它在臺灣的地位。農民組合中的簡吉、趙港，文協中的王敏川都傾向日本共產黨的「一九二七年綱領」（註五六），而楊達與連溫卿同屬山川均的信徒，主張在合法範圍內進行鬥爭，由於鬥爭路線的不同終於遭到批判（註五七）。溫和傾向的社會主義者被排除之後，臺灣的社會主義就漸漸走向激烈的階級鬥爭的路上（註五八）。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終於在一九三一年年底，日本當局對於左翼運動的大彈壓中，遭遇和臺灣共產黨一樣的命運，瀕臨瓦解。

### 第三節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楊達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後，臺灣立刻成為三民主義的天下（註五九）。教唱國歌、補習國語文，以及三民主義講授的活動在街頭巷尾熱烈地展開（註六〇）。對於臺灣的前途，大家都滿懷信

心地期待著。當時楊逵曾經組織「新生活促進隊」與「民生會」，在政府接收前的政治真空期中，負責維持臺中市區的社會秩序。只可惜由於組成份子的複雜，流弊叢生。

十月時國軍來臺，受到民衆盛大的歡迎。然而政治、經濟各方面局勢的惡化，令回歸祖國時欣喜若狂的臺灣同胞大失所望。隨著不滿情緒的日益升高，臺灣已經瀕臨暴動的邊緣。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公賣局緝私人員與憲警在臺北大稻埕查緝私煙，以槍柄打傷煙販林江邁，並因流彈擊斃無辜青年陳文溪，終於激起震驚海內外的「二二八事件」。這次事件由最初在臺北取締私煙的處理不當，終至釀成全省的大動亂，行政院研究小組在今年（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公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說明事變擴大的原因極為複雜：

首先，由於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同胞對祖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均缺乏了解，甚至在價值觀方面，亦與大陸同胞頗有差異，因而於光復之初，由期望過高而產生失望。其次在政治方面，行政長官制度有諸多缺失，而官箴、軍紀欠佳，政治參與和待遇也不盡公平。在經濟方面，由於不當之統制政策，百業蕭條，物價飛漲，失業嚴重，生計困難。在社會方面，復員返鄉的前臺籍日軍軍人，就職無路，一文莫名，因而逐漸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暗潮。此外，行政長官陳儀個性剛愎，以致下情不能上達，官民關係惡劣。由於以上種種因素，有識之士早已預感危機之瀕臨，然而，長官公署猶渾然不覺。（註六一）



事件發生後的三月一日，在臺中的楊逵與鍾逸人決定印發傳單，召開市民大會，共商對策。次日早晨，市民大會在臺中戲院召開，由謝雪紅擔任主席，大會尙未開完，楊逵即先行離去（註六二）。會後舉行遊行示威，數千民衆湧至警察局，解除警員的武裝，查封局內的槍枝彈藥。專賣局臺中分局也在稍後由謝雪紅接管（註六三）。當晚，楊逵撰寫〈大捷之後〉，呼籲民衆不可得意忘形，必須理智團結（註六四）。後來的幾天，楊逵與葉陶下鄉宣傳，將農村青年予以編組，三五一組向「二七部隊」（註六五）報到。其間楊逵又撰寫〈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一文，交給在《自由日報》任職的朋友。由於記者缺乏經驗，便於三月九日以楊逵之名發表出來。（註六六）

隨後，政府援軍在臺北大肆逮捕民衆的消息傳來，臺中市也因為謠言四起而呈現混亂的狀態。楊逵夫婦見大勢已去，輾轉逃亡中、南部山區，過去農民組合活躍的地方藏匿。三月下旬，兩人尋求偷渡海外的機會，但因海岸線早已封鎖，只得相偕返家。共被懸賞十萬圓的楊逵與葉陶疲憊地踏入家門時，立刻遭到逮捕（註六七）。幸而罪證〈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被神祕註銷，夫婦倆在坐牢一百零五天之後獲得釋放。（註六八）

關於二七部隊是不是共產黨軍隊的問題，當時的部隊長鍾逸人曾經予以否認。並解釋事後之所以把責任推到共產黨的身上，是因為謝雪紅和古瑞雲在失敗後已經逃亡海外。這樣的說法，一來可以表示暴亂的發生與陳儀失政無關，符合長官公署的利益；二來可以使案情單純一些，早日結案（註六九）。然而依照古瑞雲的說法，由組成的份子來看，「二七部隊是一支道道地地的『紅軍』，也可謂謝雪紅的『御林軍』，祇是鍾逸人自己蒙在鼓裡而已。」（註七〇）無論如何，共黨

份子乘機介入二七部隊是不爭的事實。

在這一動的亂中，楊逵並未親身參與二七部隊的戰鬥行列，固然和謝雪紅等臺共份子也在部隊中負責指揮有關，更重要的是，他體認到下鄉工作的重要性。〈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一文就說：

因臺中市民起義，掃蕩貪官污吏奸獍惡霸而鬥爭，義民四起，勇躍馳援，員林隊、彰化隊、豐原隊、埔里隊、大甲隊等，均已趕到參加戰列。這樣實情可以看出普遍人民已經不能再忍下去了。

另有消息可以相信其他各地也在陸續編隊以待，我們雖須要集中勢力，但過度集中於一據點者，在工作上有點不利，自今天起，我們須要組織下鄉工作隊，到鄉鎮去從事宣傳，組織與訓練工作，這樣去做我們才能保持無盡的預備軍，才可以展開高度普遍工作，發揮我們的力量。（註七一）

又說：

我們有點弊病，就是你一黨我一派，各人的思想雖不得輕易改變，但，在此爭取民主與自由，在此爭取以自由無限制普選而產生自治政權這階段，除貪官污吏奸獍惡霸之反對派以

外，是可以擴大統一戰線的。在此階段，我們須要包容各界（學、工、農、商、婦女、文化各界），而且也要包容無黨派，擴大民主統一戰線。（註七二）

這可以證明爲什麼楊達與謝雪紅一千人的意見不合（註七三），二七部隊成立之後，楊達夫婦二人卻還能捐棄成見，下鄉爲其開闢兵源。原來是因爲時勢所趨，黨派不同的各路人馬，爲了追求民主與自由，必須團結一致，絕不容許派系之爭的存在。

出獄之後，楊達重新活躍於文壇，經常參加文學座談會，與《力行報》、《和平日報》副刊的編輯也時有來往。文化界人士有鑑於二二八事件造成了本省與外省籍人士之間的對立，於是組織文化界聯誼會，希望藉由文化人的精誠合作，消除彼此的歧見。因此由楊達起草〈和平宣言〉，呼籲政府釋放二二八事件的政治犯，與民間共同建設民主均富的樂園。後來《大公報》刊登〈和平宣言〉的消息，正準備出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途經上海獲知此事，一到臺灣，立即表示臺中有一支共產黨的第五縱隊。此時，楊達已明白自己隨時有被捕下獄的可能。（註七四）

一般都認爲〈和平宣言〉是楊達獲罪的唯一理由，但是楊達本人在民國七十三年接受楊祖珺訪問時，則表示：「三十八年四月六日，師範大學的學生以腳踏車包圍派出所，再加上〈和平宣言〉的理由，我再次入獄。」（註七五）民國七十一年接受何昀訪問，並在去世之後才發表的〈二二八事件前後〉中，楊達也有同樣的說法（註七六）。以歷史事實證之，應是極有可能。也就是說，楊達於二二八之後再度被捕下獄，並不單單是筆禍所能解釋的。

一九四九年，大陸上的內戰已經十分熾烈，臺灣的學生又屢次掀起學潮，成為政府棘手的問題。四月五日，警備總部漏夜拘提臺大及師院共二十八名學生到案。警備總部、臺灣省政府俱發布整頓學風的聲明。省府並且通令師範學院：「即日暫行停課，聽候整頓。」（註七七）六日，各校學生聚集派出所前示威，當日下午楊達隨即遭到逮捕。交付軍法審判後，刑期十二年。

楊達由於〈和平宣言〉之故，早被當局所忌憚，加以平日常到師院座談演講，與師範學生有些許淵源（註七八）。當局在整頓學風之際，加強對於言論的控制，希望藉此消弭紛紛擾擾的局面，也不無可能。而被捕學生中，臺大的孫達人與楊達關係更為親密，或許也可以做為另一項佐證。一九四八年，新生報副刊「橋」因為建設新臺灣文學之路引起的筆戰中，楊達發表的〈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即為他所翻譯（註七九）。稍後，孫達人還曾經發表〈論前進與後退——「建設新臺灣文學之路」讀後〉（註八〇），駁斥胡紹鍾〈回復五四時代〉的謬論，並表明擁護楊達見解的立場。在新生報副刊「橋」所舉辦的文學活動中，兩人也時有接觸（註八一）。因此學生示威事件應該就是楊達被捕的導火線，而〈和平宣言〉呼籲局部地區的和平卻是唯一的罪證。

在楊達服刑期間還有一段插曲，必須附帶說明。一九五八年一月底，楊達由綠島被借提到臺北，原因是當局有意將他派至日本做特務工作。五月初又被押回綠島（註八二）。根據楊達自述，他並沒有拒絕特務工作，但是提出條件，希望兒子能夠同行。後來因中日大勢已經改變，並未會動身前往日本（註八三）。吳坤煌與楊達次子楊建，都證實了楊達的確曾經答應接受這項工作，關於不克成行的緣故，兩人的說法則傾向於「條件不符」。吳坤煌說，楊達提出的條件是需要葉陶

陪同前往，因為日據時代一直是兩人並肩作戰，單獨一人成不了大事（註八四）。楊建則表示其父要求全家大小同行，俾能「免除後顧之憂以及當局之要脅」（註八五）。究竟真相如何？現有的資料難以斷定。然由楊達自述：「我心想：能到日本也不錯。到日本後，要怎麼做，到時再看吧——」（註八六）可以推測得知，他心中必然另有打算，目的是先到日本，再伺機權變（註八七）。因此附帶條件，以求「免除後顧之憂」的考量，就符合了事件的發展。不過事情在延宕多時之後，終於因為中日情勢的轉變而作罷！

當年三月，臺灣與日本間原本友好的邦誼，在日本與中共關係進展下橫生變數。我外交部於三月十三日、二十日，分別發表聲明，抗議日本與中共訂定貿易協定，以及中共在日本懸掛「國旗」。四月時，恢復在三月裡與日本斷絕的貿易往來。五月，情勢漸趨明朗，中共與日本的關係因長崎國旗事件而中斷（註八八）。楊達的日本之行，就在這詭譎多變的局勢中未能實現。

對因〈和平宣言〉而換來十二年牢獄之災一事，楊達晚年也曾經做過一番檢討，所得的結論是：「只怪我自己對當時的情勢判斷錯誤。」（註八九）這個事件是楊達一生中最沈痛的打擊。出獄後，他蟄居東海花園，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直到一九八三年，以七十八歲高齡，在立法委員選戰中為楊祖珺助選，社會運動家的楊達才又終於走出藩籬，面對廣大的群眾。

#### 第四節 楊逵晚年的政治思想

從農民組合到〈和平宣言〉，楊逵把他的少壯人生奉獻給臺灣，不但樹立了社會改革運動家的典範，更難能可貴的是贏得來自敵對陣營的尊敬。因此當他出入監獄之際，不止一次地得到獄卒的特別禮遇（註九〇）。一九八二年訪問美國時，在各地都受到盛情的招待，不論左派、右派、獨派、統派，於僑界激起熱烈的回響。

從事社會運動時，楊逵曾經因為理念的不同，一再地遭受排擠。但不管是被逐出農民組合時，與葉陶、謝進來共同發表的聲明（註九一），或是二二八事件中的〈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都展現了他提倡統一陣線，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由於個性上堅持理想，絕不妥協的特質，使得他在臺灣的社會運動中像匹孤狼（註九二），難覓知音。只有妻子葉陶自始至終隨侍在旁，給予他支持的力量。

晚年時，楊逵也曾經反省自己的思想，認為階級鬥爭並不適合現實的中國，覺得民族主義遠較階級鬥爭來得重要（註九三）。因為文學創作重新受到世人注目之後，他終於有機會陳述自己在政治理念上的轉變。

## 一、臺獨問題方面

楊逵視臺獨爲感性的問題，認爲產生根源在二二八事件。若要化解歷史的仇恨，則有賴於政治的開明。例如他曾經表示：

二二八事件，有些人的父母親友或失蹤、或坐牢，他們會走上臺獨的路，是一個感性的問題，而不是理性的。要解決這種情結是不能用任何理論講得通的；唯一的方法是執政黨從現在開始做起，一些二二八以來的政治犯趕緊釋放、和政治有關人們的出入境不要緊扣不放，不要再讓海外的臺灣人有陳文成式的恐懼，對於批評、建議，國民黨應該接受，不能接受的要討論，不要搶書、禁書，留給不同意見的人有談的餘地，如果這些都開始確實去做，歷史的仇恨會慢慢地消除。（註九四）

又說：

臺灣發生了「二二八」，大陸以後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變得一團糟。因此，他們對大陸也失望了。只看出有獨立一條路。（註九五）

關於臺灣的「臺灣民族論」（註九六），楊逵也不表贊同。當他在美國時，有人說如果不「認同」「臺灣民族」就不是臺灣人。他則以「照你們的說法，我就不是臺灣人了。」（註九七）這種幽默的口吻反詰，令對方啞口無言。由此也可以發現，楊逵晚年的立場確實是傾向於「中華民族主義」（註九八）。其中原因，應該是他保持一貫的世界觀不曾改變所致。

四十五年來，二二八事件由往日的政治禁忌，直到今天研究報告的公佈，執政的國民黨能夠勇於承認錯誤，無疑是明智的抉擇。部分受難家屬在沈冤數十載之後，終於得見正義公理的伸張，因而消弭了昔日的宿怨與不平，對於社會的和諧必然有所助益。楊逵有關臺灣的見解確實有其獨到之處。

## 二、海峽兩岸統一的前提

楊逵以為：海峽兩岸到底由哪一方來統一全中國，是自由與民主的競賽。「哪邊創作自由，哪邊使人民沒有壓迫感，哪邊便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註九九）。為此，他還特別提出「一統」的觀念，和「統一」相比較。

所謂的「一統」是小集團及個人把基於自己獨斷的主張和主觀意志強加給一般民眾，用



武力或別的什麼形式強加給一般民衆。這完全是獨裁，所以我反對。而通過說服和了解，大多數人自發地參加到一起的那種形式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才是通過民主的統一。（註一〇〇）

而

社會要發展，個人免於拘束與恐懼，思想就須開放，須自由民主化；帝王貴族爲了自己而壓迫別人是不能永久的，有些人爲了生活向他們「表態」，終會改變，這種「一統」是沒有前途的。

至於「統一」，乃透過討論大家同意後，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每個人都能夠自由開放地說出心聲，不撒謊，這樣才有出路。（註一〇一）

因此，統一的前提在於凝聚共識，中國的命運取決於全體中國人民。任何黨派以其意志強加於民而形成的「統一」只是表象，絕對不可能長久。如果硬要將兩岸以「一統」的方式予以合併，楊達堅決地表示反對！

### 三、對於國家前途的展望

創造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一直是楊逵心中最熱切的期盼。他在晚年時崇信三民主義，也是基於社會主義的理念，認為國父的民生主義直接繼承孔子的思想，可以用來建設均富的社會。因此他說：

今日臺灣要建設「民有民治民享而均富」的三民主義模範省，就要切實記住孔子在《大同篇》所表現的福利社會的構想與「不患貧患不均」的觀念，也要切實記住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教示。（註一〇二）

爲了迎接民主時代的來臨，他呼籲法律必須要能徹底保障人民言論、集會與結社的自由，學習英國海德公園的方式，讓民衆暢所欲言（註一〇三）。並懇請政府把光復以來的一切檔案公開出來，

讓專家學者從各方面去分析、研討，另方面也讓民衆把心裡的話公開講出來以供作參考，當做革新政治的堅定基礎，而不致成爲砂上的樓閣。（註一〇四）

施行時，主事者務須毫無私見，一心爲民，「在心理建設方面，在文化體制方面消除利己損人心理與官僚心態」。(註一〇五)

即使曾經在國民黨執政的初期，有超過十二年的歲月身繫囹圄，楊達依然相信國民黨中有部分開明派，可以結爲朋友(註一〇六)。對於未來，他也樂觀地相信，只要能切實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民衆要有勇氣批評，政府要有雅量接受」，以及執政黨的「永遠和人民結合在一起」，並將之貫徹到各個階層，「一定能帶動和促進大陸人民民主自由運動，發展下去」。(註一〇七)

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楊達一直提倡團結合作的重要性，也一直和低下階層的百姓站在一起，絲毫沒有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因此，他對於《前進》雜誌一百期中標榜的「不是左派、不是右派，而是前進派；不是統派、不是獨派，而是百姓派」最爲推崇(註一〇八)。雖然終其一生，他的理想世界並不會真正實現，追求理想的熱忱卻從未稍減。從馬克斯主義蛻變到孫文的民生主義，楊達的思想與時俱進，而他「人道的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始終如故。

註釋：

- 一 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序說之註一云：「具有近代意義及目的意識的，包括政治、經濟、思想、社會、文化的反抗、革命及改革的運動，日人統稱之爲社會運動。」臺北、稻鄉出版

社，民國七七年五月初版，頁二。

二 《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八—九。

三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云：「……所以臺灣的階級運動，一方面是以其殖民地的事情為基礎，同時則又帶有民族運動的性格。而在另一方面，也是臺灣的民族運動帶有階級運動的性格。」又云：「……就大體而論，民族運動即階級運動，階級運動即民族運動，兩者的互相結合比較多於兩者的互相排斥。這是殖民地社會的特徵使然的。」見頁一八三—一八四。

四 楊遠說：「這個人叫楊傳，是個單身漢。警察正在取締站在路上做買賣的小販，而楊傳是個流動小販，正好有客人喊他，他便站著賣東西，惹火的這個警察，動手就把他打死。現在想來，那個警察當時未必真要致他於死地，可是那時我是個小孩子，我是非常悲痛難過的。」見《楊遠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遠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文季》卷一期四，頁一二。

五 《楊遠回憶錄》，《楊遠的文學生涯》，頁一五二。

六 大杉榮是日本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一家人都被日本軍人甘粕正彥殺害。

七 《臺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遠關於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見《文季》卷二期五，頁二八。

八 林明德著《日本史》，頁三三五、二五〇。

九 《臺灣歷史年表》，頁一二五。

十 盧修一著《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頁三二。

二 楊遠著《臺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談我的一些經驗和看法》，見《文季》卷一期一，頁三二。

二三 同註五，頁一五八。

二三 葉石濤著〈日據時期的楊逵——他的日本經驗與影響〉，見《聯合文學》卷一期八，頁一九—二〇。

二四 同註五，頁一五四、一五八。

二五 「東京臺灣青年會」是「新民會」中的學生組織而成，揭櫫：「涵養愛鄉的心情，發揮自覺精神，促進臺灣文化的開發」為綱領，推新民會於指導地位。《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四九—五〇。

二六 《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六六—六七。

二七 《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記載：「這些學生（按：指臺灣青年會中傾向共產主義的學生，楊逵也列名在內。）於大正十五年一月左右，在臺灣新文化學會的名稱下團結，繼續研究……」見本書頁六七。楊逵回憶中談及曾與朋友組織「新文化研究會」研究馬克斯主義，即是指「臺灣新文化學會」。見《楊逵的文學生涯》，頁一六〇。

二八 《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六九—七〇。

二九 同註五，頁一六〇。

三〇 《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七〇。

三一 山川均生於一八八〇年，卒於一九五八年。日本社會主義者，曾經參與組織「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及「日本共產黨」，並成爲日本共黨的理論指導者。

三二 葉石濤著〈楊逵與臺共的關係〉，《走向臺灣文學》，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民國七九年三月第一版第一刷，頁九二—九三。

三 同註二二，頁九四—九五。

四 見註七所引資料，頁三一。及《楊遠畫像》，頁八三。

五 見註二二所引書，頁九四—九五。

六 楊遠主講，戴國輝、內村剛介訪問，葉石濤翻譯〈一個臺灣作家的七十七年〉，《楊遠的文學生涯》一書，頁一八六—一八七。

七 當時被宣布解散的共有三個組織，除上述兩者之外，還有「日本無產青年同盟」。見《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頁三四。

八 原文寫在標有「(アス力印) D型」字樣的兩百字稿紙上，共三十張。並未註明寫作時間。內容則分為：政黨與政派、工會、工會的戰術、工會運動的改良主義、黃色國際工會、赤色國際工會、協同組合組織、蘇俄的協同組合、怎樣工人階級沒有階級的政黨不可、共產黨是什麼、共產黨的戰術、階級鬥爭與組織、是大眾黨或是宗派、共產黨對別個無產政黨及大眾的□□（按：原文字跡難以辨認），共十四個部分。其中在第九項「怎樣工人階級沒有階級的政黨不可？」的前一行標明「共產黨的任務」，並由此項開始重新註明頁次。可見第九至第十四項的內容可以獨立出來，亦可與前面八項合併為一個整體。

九 同註五，頁一五七。

十 楊資崩著〈我的父親——楊遠〉云：「爸在全部財產只有四分錢的時候，讓媽生下了我，取名資崩，意為資本主義崩潰。」《聯合報》，民國七五年八月七日。

十一 鍾天啓著〈瓦窯寮裡的楊遠〉，《自立晚報》，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三 韓嘉玲著〈臺灣農民組合一九二五—一九二七〉，見《臺灣史研究會論文集》第一集，臺北、臺灣史研究會主編、出版，民國七七年六月，頁二三八。

三三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二四二—二四四。

三四 楊碧川著《日據時代臺灣人反抗史》，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七七年十一月初版，頁一三六。

三五 見註三二所引書，頁二四一—二五六。

三六 依據韓嘉玲〈臺灣農民組合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研究：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在「二林蔗農組合」舉行的農民大會上，對林本源製糖會社提出了會社與蔗農協定收購價格等五項要求。製糖會社在蔗農組合提出的要求未有結果前，逕行收割該區的甘蔗，引起蔗農組合成員的阻止，演成蔗農與會社派出的人員及警官的衝突。結果造成九十三人的被捕，及四十三人移送法辦。此即「二林事件」，同註三二所引資料，頁二四二。

三七 見註三二所引資料，頁二五六—二六〇。

三六 《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頁四五。

三九 楊遠曾經在接受訪問時說：「在我回臺灣前兩年，農民組合運動才急速地發展起來，形成領導人才不夠的現象，他們再三邀我回去的原因就是這個吧！」見〈楊遠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遠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見《文季》卷一期四，頁一八一—一九。

四〇 《楊遠畫像》，頁八九。

四一 《日本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二》，頁一〇五六—一〇五七。當時入選「特別活動隊」的共有簡吉、楊遠、趙港、陳德興、葉陶、蘇清江、尤明哲、呂德華、謝進來、陳崑崙、柯生金、陳結、謝塗等

十三人。

四 《日據時代臺灣人反抗史》，頁一五二—一五三。

四 《日本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二》，頁一〇五七。

四 《楊遠畫像》，頁九一。

四 見註四一所引書，頁一〇八〇—一〇八四。

四 詳情見〈臺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遠關於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文季》卷二期五，頁三二—三四。及王麗華著〈關於楊遠回憶錄筆記〉，收於《楊遠的文學生涯》，頁二八二—二八三。關於這件事，楊遠的好友鍾逸人也有相同的說法，並表示後人的見解多以為感情問題是主因。見《辛酸六十年》，頁五三四—五三五。

四 王麗華著〈關於楊遠回憶錄筆記〉，《楊遠的文學生涯》，頁二八四。

四 河原功編、楊鏡汀譯〈楊遠生平寫作年表〉，《楊遠集》，頁三六五。

四 文化協會的機關報原是《臺灣民報》，文協分裂後，已經改由文協舊幹部另組的「臺灣民眾黨」經營，因此新文協另外發行《大眾時報》為本身之機關報。由於未能獲准在臺發行，便將總部設在東京，在該地發行後運入臺灣。事見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三八五—三八六。

五 同註四八，頁三六六。

五 《楊遠畫像》，頁九七。由於缺乏其他資料，因此難以斷定楊遠在哪一段時間內組織讀書會。中央委員一職可能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於臺中召開的第二次全臺代表大會中當選。

五 《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四三七—四三八。



五 《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四三八—四三九。

五 楊遠自云：「我大約知道農民組合中何人是臺共份子，但未與他們密切接觸。因我對文學仍懷抱一種使命感，我不能轉入『地下』。另一方面，臺共份子也無意向我表白什麼，因為像我這種在運動中奔走的人，時常有被捕入獄的可能，有被逼供出組織祕密的危險。」同註四七，頁二八三—二八四。由此亦可證明楊遠絕非臺共。

五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福本主義由原來山川均與福本和夫兩家爭鳴的局面中獲得勝利，重建日本共產黨。並在第三國際採用「一九二七年綱領」後，確立居於主流的地位。

五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關於日本的綱領」，其中有十三項規定，是日本共產黨奮鬥的目標，此即「一九二七年綱領」。見《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頁七五—七六。

五 《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頁一七三—一七九。

五 張炎憲《日治時代臺灣社會運動——分期和路線的探討》，見《臺灣風物》卷四十期二，頁八。

五 若林正文在訪問楊遠時曾說：「提起臺灣和三民主義，我想起一件事。在我的學生時代，有一次在回鄉探親乘坐的列車裡，坐在對面的一位大年紀的日本人對我講起他戰爭中的經歷。他好像是在日本陸軍特務系統，曾在緬甸和海南島從事訓練工作。在海南島時，他部下有許多臺灣青年。戰爭一結束，這些年輕人立即滿口的三民主義，並十分了解三民主義的內容，實在令人吃驚。一讀剛才所說的池田先生的《戰敗日記》，我們一般立刻就會接受這樣的印象——在戰後的臺灣，立刻是三民主義的天下，而且其後也是得靠三民主義。」同註七，頁三六。

六〇 葉石濤著〈光復初期的街頭風景〉，見其撰《女朋友》一書，臺中、晨星出版社，民國七五年九月初版，頁一七五—一七六。

六一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撰〈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自立早報》，民國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六二 見王麗華著〈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楊逵的文學生涯》，頁二八七—二八八。及鍾逸人《辛酸六十年》，頁四三二—四三五、四四八—四五三。至於楊逵是否曾在人民大會上發表演說？楊逵自己說：「我雖在會場門外人群中，見大會召開後才離去。」鍾逸人則表示楊逵確曾在臺上演講，並且是在謝雪紅被推出來主持會議之前，但是「他講了半天，到底講些什麼？大部分的人都聽不懂，因為場裡人多嘈雜，他的嗓音又很低，尤其當時是還未有裝設擴音機的時代。」兩種說法迥異。

六三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自立早報》，民國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六四 原稿已佚。依鍾逸人的說法，這是一篇一千多字的短文，其內容如文中所述。鍾逸人在徵求《和平日報》編輯刊登不允後，私下叫該報工務課人員排版，於次日刊出。而楊逵對王麗華的敘述卻是「被編輯拒絕，後來改以油印發送」。見《辛酸六十年》，頁四五九—四六〇，及《楊逵的文學生涯》，頁二八七。

六五 緝煙血案發生的正確時間是在二月二十七日，爲了紀念這一天，武裝部隊命名爲「二七部隊」，由鍾逸人擔任部隊長。見《辛酸六十年》，頁四八〇。根據〈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研究，二七部隊在三月六日成立，七日正式編成武裝隊伍，見《自立早報》，民國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六六 楊逵口述、何昉發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僅提及發表之事，未說明時間。見《楊逵的文學生涯》

，頁一六五—一六六。《臺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事件專輯》除將全文予以刊載外，並且標明時間是在三月九日。陳芳明編，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發行，民國八十年三月第一版第一刷，頁二八九。

六 同註四七，頁二八八。

六 〈二二八事件前後〉，見《楊遠的文學生涯》一書，頁一六六—一六七。

六 《辛酸六十年》，頁六二五。

七 古瑞雲著《臺中的風雷》，臺北，人間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初版，頁五六—五七。

七 《臺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事件專輯》，頁八七。

七 同前引書，頁一八八。

七 王麗華〈關於楊遠回憶錄筆記〉中，楊遠自述光復後不在大華酒家（人民協會）走動的原因為：「1.

我和雪紅仔那批人的路線，本來就不合。2.有回在公開場合，謝雪紅向我批評葉陶『草地查某一個』，無啥氣質——我聽後覺得雪紅仔別有用心。」見《楊遠的文學生涯》，頁二八六。又古瑞雲《臺中的風雷》云：「楊遠夫婦——聽說人民協會籌備期間，楊遠也是籌備委員之一，後因意見分歧而退出。分歧何在，至今也不清楚。」見頁二二。可以證明楊遠的說法並非捏造，來撇清自己與謝雪紅的關係。此外，《辛酸六十年》中，鍾逸人對楊遠與人民協會的不合，也有多處予以記述。見頁四五三、五一二及五五五。

七 同註六八，頁一六八—一六九。

七 楊祖珺著《楊遠談二二八——心願未了，老兵不死！》，見《前進時代》期七，民國七三年三月，頁

二一。

六 同註六八，頁一六九。

七 《中央日報》，民國三八年四月七日報導。

七 同註七六。

七 這篇文章發表時，在「譯者後記」中，有孫達人寫給新生報副刊編輯歌雷的一封信，說明他翻譯這篇文章的過程以及目的。《新生報》，民國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八 《新生報》，民國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八 例如：楊遠和孫達人曾經與陳大禹、吳瀛濤、馮諱、羅美、吳坤煌共同擔任「橋」第三次茶會——討論「臺灣文學之路」的籌備人。見《新生報》，民國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副刊的報導。又，在歌雷邀約下，楊遠積極參與《新生報》舉辦的演講會、座談會時，由於不諳國語，就由一位日本回到臺大的外省學生負責翻譯。〈二二八事件前後〉楊遠口述，見《楊遠的文學生涯》，頁一六九。根據各種跡象研判，這名學生應為孫達人。

八 同註四七，頁二七七—二七八。及楊建著〈一個支離破碎的家〉，《綠島家書》序一之頁三。

八 同註四七，頁二七七—二七八。

八 張恆豪著〈楊遠有沒有接受特務工作〉，見《南方》期二，頁一二三。

八 《綠島家書》，頁七一。

八 同註四七，頁二〇七。

八 張恆豪也抱持「伺機權變」的說法。同註八四，頁一二五。

八 《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一九四五—一九六五），薛化元主編，臺北、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國家政策資料中心發行，民國七九年十一月初版，頁二八四—二八九。長崎國旗事件，即中共在長崎懸掛的五星旗被日本人扯下一事。

六九 同註四七，頁二八〇。另外〈楊遠的七十七年歲月〉中，楊遠在接受訪問時也說：「我自己的看法誤了自己……自己的判斷，誤了自己，那就只有自己認了。」見《文季》卷一期四，頁二九。

七〇 楊遠在日據時代，曾有一次因為替農民大會寫抗議文，罵日本政府而被捕入獄。這次的坐牢經驗中，無論在嘉義警察局或臺南監獄，都受到看守們的特別照顧。其中一位甚至高舉拇指，向一般刑事犯贊揚他的作為。見楊遠著〈臺灣文學對抗日運動的影響——十一年前一項文藝座談會上的書面意見〉，見《文季》卷二期五，頁二一。劉靜娟著〈拿鋤頭在地上寫作——訪永遠不老的楊遠先生〉，見《中央月刊》卷十四期七，民國七一年五月，頁六六。另外，〈二二八事件前後〉中，楊遠也提及因二二八事件入獄時，獄卒特別尊稱他為「楊先生」，又設法讓他和不同牢房的妻子葉陶見面。見《楊遠的文學生涯》，頁一七二。

七一 該〈聲明書〉強調其反對閉鎖主義，主張確立批判自由與民主主義的立場。全文見《日本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二》，頁一〇八三—一〇八四。

七二 葉石濤就說：「楊遠終生很有一匹狼的氣概，始終堅持一己的世界觀，難免時而會和朋友發生誤會。

「見其著〈殖民地時代的楊遠〉，《臺灣文學的悲情》一書，頁一三〇。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民國七九年一月第一版第一刷。

七三 柳映隄著〈彷徨·覺醒·希望〉，見《幼獅文藝》卷四十期四，民國六三年十月，頁一一一。

七四 同註七五。

空 見註七所引資料，頁四〇。

六 日據時代的臺灣共產黨也提倡「臺獨」與「臺灣民族論」。根據王曉波的研究，當時「臺灣民族」一辭是用以區別臺灣人和日本人的。見其著《被顛倒的臺灣歷史》，頁三二四—三二六。

六 同註九五。

六 戴國輝在其著《最後的見證》中，認為楊遠是主張「中華民族主義」。《中國時報》，民國七四年三月十三日。

六 接受陳春美訪問時的回答。見陳春美著《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訪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遠》，《前進廣場》期十五，民國七二年十一月，頁五。

一〇〇 同註九五。

一〇一 引自《老園丁楊遠》，見《益世雜誌》卷三期七，民國七二年四月，頁七九。

一〇二 引自楊遠著《臺灣文學對抗日運動的影響——十一年前一項文藝座談會上的書面意見》，見《文季》卷二期五，頁二一。

一〇三 見註九九所引資料，頁六。

一〇四 見註一〇二所引資料，頁二三。

一〇五 同註一〇二。

一〇六 王世勛著《最後的·永遠的期願》，《自立晚報》，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一〇七 楊遠《我的卅年》，收於《歷不扁的玫瑰》，臺北、前衛出版社，民國七五年四月三版，頁二一三。

一〇八 同註一〇六。

## 第三章 楊達的文學生涯

楊達的文學種子早在少年時代，受教於沼川定雄時就已萌芽。中學時，他透過日文譯本，接觸到西洋的文學思潮，並且在三年級時由臺南州立二中輟學，負笈日本專攻文學。而當初之所以立志走上這條路，「噍吧哖事件」具有根源性的影響。楊達說：

我九歲時（民國四年），臺南發生噍吧哖事件，我親眼從我家的門縫裡，窺見日軍的砲車轟隆而過，其後又聽聞日軍的鎮壓與殘殺；稍大後，我在書店買到一本日本人寫的《臺灣匪誌》，也看到所謂「匪徒刑罰令」，我才明白了日本人如何歪曲歷史及法律。

我決心走上文學這條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歪曲的「歷史」。因此我十八歲到日本求學時，雖然父兄希望我學醫，但我仍堅持唸文學，寧願做工也沒關係。（註一）

然而文學的楊達蘊釀許久，卻是直到〈送報伏〉榮獲《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之後，才真正成爲專門的作家。一方面是因爲比賽獲獎的鼓勵，另一方面卻是因爲社會運動受到日本當局的大力彈壓，已不可能有任何進展。（註二）

就楊達一生創作的類別來說，舉凡詩歌、文學評論、隨筆、翻譯（註三）、小說，以及戲劇，大概各種文學的形式他都嘗試過，也都有不錯的成績。然而一直未能刊行全集，卻是楊達心中極大的遺憾。其中緣故，可能是由於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日文寫成，若要出版，翻譯的人選與品質都是一大問題。至於他的中文創作，則遲至綠島時期才有較為流暢、成熟的作品出現。就數量上來說，也遠不及日文作品。如果以〈和平宣言〉事件為分界，前後兩期的風格也大不相同。

## 第一節 楊達早期的作品風格

楊達在臺灣文學史上，素有「普羅文學（註四）健將」的封號。這是因為他在日據時期的作品風格，大多以反帝反壓迫為主題，能夠反映無產階級的心聲。而這樣的文學風貌，與整個日本文壇和臺灣文學界的走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西元一九二四至二七年，楊達留學日本期間，正是日本普羅文學勃興的時代。隨著社會主義思想的擴散與增強，以社會主義階級意識為中心的文藝作品，成為日本文壇的主流（註五）。由於參加佐佐木孝丸（註六）家的演劇研究會，楊達結識了秋田雨雀、島木健作、窪川稻子、葉山嘉樹、前田河廣一郎、德永直、貴司山治……等著名的普羅文學作家（註七）。並且在《號外》發表處女作〈自由勞動者的生活〉（自由勞動者の生活），敘述自己當臨時工的生活體驗，已經大致完成文學風格的塑形。在〈送報伏〉寫成之前，雖然發表的篇章極少（註八），但是拼命閱讀《文藝



《戰線》（註九）與《戰旗》（註十）雜誌（註一一），對於他在無產階級文藝理論架構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助益。後來《送報伙》成爲臺灣作家在日本文壇揚眉吐氣的代表作，正是這種文學風尚的展現。

一九三一年以後，臺灣的社會運動遭受重挫，原來在運動中活躍的知識份子已無用武之地，多數轉向投入新文學運動。文藝創作接替社會運動的任務，成爲抵抗殖民政府的利器（註一二）。臺灣新文學也在此時邁入成熟的階段，寫實主義成爲主流（註一三）。與普羅文學相似的一點是，作品內容都著重在反映農工階級的生活。但其思想背景並不全由社會主義而來，也有根源於民族意識的，賴和的文學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例子。這類作品被統稱爲「左翼文學」（註一四）。楊達也從此時開始專心寫作。而當年參加社會運動時，深入窮鄉僻壤，體驗各地農民在異族鐵蹄下爲土地奮鬥不懈的精神，對於寫作生涯自然造成極爲深遠的影響（註一五）。因此描寫臺灣人的辛酸血淚，與抗議殖民政府的殘酷統治，就成爲他最關心的主題（註一六）。基於這樣的觀點，楊達前期的作品風格，可以說是社會思想與寫實主義交互運用的結果。細分之，又有幾個不同的階段。

從首篇作品《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到西元一九三七年爲止，是楊達創作力最豐沛的一段時間，而且絕大部分是在《送報伙》獲獎後的四年內完成。其間，楊達還曾經創辦《臺灣新文學》雜誌。內容中、日文各半，是左翼作家發表的重要園地。此時楊達本人的創作，以小說和文學評論最爲重要。自《送報伙》以降，《難產》、《死》、《蕃仔雞》、《頑童伐鬼記》（鬼征伐）等小說創作，都是以階級壓迫爲主題，是其社會運動的另一種手段。而楊達一生中的文學評論，

幾乎都是完成於這個時期。另外，就發表的刊物來看，共有十九篇刊載於東京的文學雜誌上（註一七），包括《文學評論》、《文學案內》、《新潮》、《文藝首都》……等。顯見楊逵此時與日本文壇，尤其是普羅文學界，有相當密切的聯繫。

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四月，臺灣總督府下令廢止報紙的漢文欄，並且禁止中文雜誌的刊行。原已面臨財務困難的《臺灣新文學》，猶如雪上加霜，終於宣布停刊。「七七事變」爆發之後，日本軍國主義加緊對於大陸和東南亞的侵略行動；在臺灣方面，也雷厲風行地展開對於思想言論的箝制，皇民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島各地推行中。這一年，楊逵創辦首陽農園，隱居耕讀。一九三八年開始，創作量銳減，只有在入田春彥去世時，於《臺灣新聞》發表〈入田君二三事〉紀念這位知己。一九四一年至四四年，臺北盛興出版部分四卷印行由楊逵編譯的《三國誌物語》（註一八），以稗官野史的方式介紹中華文化，不但具有重大的意義，對於廣大臺灣群眾造成的影響也不容忽視。（註一九）

隱居四年後，楊逵於一九四二年復出文壇，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為止，共發表三十七種作品，數量上比以前少了很多。在戲劇方面，創作〈父與子〉（父と子）、〈撲滅天狗熱〉（デング退治）。前者反映社會現實之殘酷無情，後者具有反皇民化的積極意義。並改編《怒吼吧！中國》，藉鴉片戰爭痛斥日本的侵略主義。而小說創作已不只是工農階級的代言人，除了迂迴曲折地批評日本的治臺政策外，更進一步揭發日本窮兵黷武的罪行。〈無醫村〉控訴臺灣民間醫療資源的不足；〈泥娃娃〉指責日本政府在兒童純潔的心靈中灌輸好戰的思想；〈鵝媽媽出嫁

∨則駁斥日本「共存共榮」的謊言。又在《民俗臺灣》投稿四篇（註二〇），介紹臺灣原有的習俗及信仰。其中〈再婚者的手記〉（再婚者の手記），記述自己與梁盒間的糾葛，表達反對董養媳的立場，發揮反封建的進步精神。除了逐漸增強的民族意識外，依然維持他一貫勇於批評的文學特色。

由於日本政府的控制益加嚴厲，臺灣作家連最基本的創作自由都被剝奪殆盡，日本當局還強迫文藝工作者為他們的血腥侵略做宣傳。尤其知名的作家因為「樹大招風」，更是難脫魔掌，文學作品也或多或少蒙上了政治的陰影。繼一九四四年六月發表〈首陽解除記〉，聲明卸下「首陽農園」的招牌之後，八月，楊逵又發表〈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增產の蔭に——吞氣な爺さんの話），描述在總督府邀約下，參觀石底炭坑的實地見聞。當時還有多篇以戰爭為內容發表的散文與小說，都是日本軍警高壓下的產物，事實上，只是虛應故事罷了！就以所謂的「決戰日記」——〈自戒、自戒〉為例，內容不過是描寫家居瑣事。在本質上，絕對沒有為日本所謂的「聖戰」宣傳的意味！尤其一九四五年四月發表的〈民心〉（たみのみ心），苦口婆心地提醒在上位領導的人，必須注意東亞十億人心的歸向，是對日本軍閥的婉言勸諫。文中說：

大東亞有十億的人民，以及百分之幾十的物產……這十億民心如果聚集在一起激昂的話，會給世界帶來多大的恐慌呢？

但是要容納十億民心，如果只用升或杯子的話，就顯得太小了！必須是像大海一樣的容

器才行。他必須是能夠包容暖流、寒流，像太平洋般的一個指導者。能夠與人民同甘共苦、生死相與。換句話說，這位與人民一起的指導者，不會自認偉大、非凡，而去壓迫人民。他應該是個能夠把人民的心當做自己的心，與人民共同歡笑、哭泣、有血有淚的指導者。也只有這種極爲平凡的指導者，才能夠把民心組織在一起。（註二一）

文章最後，還以「不要和皇天接近，而要 and 百姓接近」（註二二）做爲結束。我們有理由相信，戰爭後期，楊逵並沒有「價值懸空」或是「信仰崩潰」（註二三）。而他原先打算結集〈萌芽〉、〈不笑的小孩〉（笑はない小僧）、〈無醫村〉、〈犬猴鄰居〉（犬猿鄰居）、〈鵝媽媽出嫁〉五篇小說創作出書的構想，因被查扣而無法如願（註二四）。急在戰爭最爲熾烈之際出版生平的第一本文集，可知這些作品與他當時的創作理念較爲契合。楊逵的創作史正是臺灣作家在異族壓迫下的血淚史。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臺灣脫離日本的勢力範圍，文壇百家爭鳴，又呈現出一番活潑的景象。楊逵在此時陸續發表〈文學再建的前提〉、〈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尋找臺灣文學之路〉，急切地要爲戰時消沈的臺灣文學界找尋重建之路。並且以中、日文對譯的方式出版〈送報伙〉，和魯迅、郁達夫、茅盾等人的作品，爲隔絕五十年的大陸與臺灣文壇建立彼此交流認識的管道。但是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使得對於臺灣的前景滿懷憧憬的他氣憤、失望，因而提筆寫下〈阿Q畫圓圈〉，諷刺長官公署的失信（註二五）。又以漫畫題文的方式，表現臺灣百姓生活的窮困，

傾洩心中不滿的情緒。作品風格和日據時期相差不大，所異者，只是抗議的對象換人罷了！

## 第二節 楊逵晚期的作品風格

光復後的第二年，政府下令取消報紙的日文版，慣於使用日文的臺灣作家們喪失了表達的工具，立刻陷入困頓的絕境。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政府退守臺灣。在政治上實施「肅清」與「反共」；文藝方面，則全面揚棄三〇年代大陸最盛行的左翼文學。因此在臺的作家，不論省籍，都同樣面臨了文學傳統中斷的尷尬場面。由於官方政策的鼓勵，反共抗俄文學形成一股強大的浪潮（註二六）。結果是外省作家主宰整個五〇年代的臺灣文壇，但是寫出來的作品，既不屬於臺灣這塊土地，也和作家自己生活的時代脫節。而反日、抗日的日據經驗，因為和反共小說在民族主義的情緒上有相容之處，遂成為臺灣作家作品中最基本的要素。（註二七）

光復初期，楊逵在讀小學的女兒教導下，從夕文口開始學習國語（註二八）。不料課程因為〈和平宣言〉事件而中斷。移監火燒島後，隨身攜帶國語字典（註二九），學習的進度才有明顯的突破。蟄伏將近五年，一九五三年起，楊逵開始在綠島監獄內的《新生活壁報》和《新生月刊》上發表新作。小說有〈春光關不住〉、〈才八十五歲的女人〉，以及刊載於《東方少年》的〈大牛和鐵犁〉三篇。散文方面，質與量都有增高。內容或者勵志，或者談自己的生活體驗，幾乎不涉政治，具有激發受刑人奮鬥向上，開拓未來的積極意義，風格與入獄前截然不同。這些作品大

多曾經陸續在臺灣本島的報章雜誌上重刊，一九七六年十月，輝煌出版社發行的《羊頭集》就是這些篇章為骨幹集結而成。獄中，楊達也曾創作多篇戲劇底稿，供受刑人在晚會或街頭表演之用。

一九六一年出獄後，楊達開闢「東海花園」，園丁的工作煩重，在體力負荷過多的情況下，創作時間銳減。加上政治人物的敏感身分，楊達與外界絕少聯絡。昔日的文壇勇士，轉眼間變成毫不起眼的老農夫。

一九七一年八月，日據時代的舊識——日本女作家坂口禱子來臺訪問。回國後，在《亞細亞》月刊十月號發表〈楊達與葉陶〉，首度將楊達的近況披露給戰後的日本文學界，喚醒二次大戰前日本作家的記憶。在臺灣，七〇年代鄉土文學尋根的熱潮，促使日據時期臺灣作家及其作品，從冰封的世界裡挖掘出土，有關的評論文字也相繼出籠。一九七三年八月，顏元叔在夏威夷舉行的「東西中心社會意識文學研討會」上發表〈臺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提及楊達的成名作〈送報俠〉。十二月，林載爵在《中外文學》第二卷第七期中發表〈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達與鍾理和之比較〉，立即引起回響。隔月，《中外文學》以中文刊登〈鵝媽媽出嫁〉，篇末並附有簡單的後記，楊達才漸漸成爲大眾矚目的作家。（註三〇）

一九七五年五月，張良澤主編的《鵝媽媽出嫁》在臺北大行出版社上梓，包括楊達在日據時代重要的小說創作。但是這些作品在翻譯之時，都或多或少經過改寫，已非原來的面貌。

此後，楊達發表的作品極少，除掉舊作的重刊之外，就是演講會、座談會的記錄，或是回憶

錄的發表。都是口述之後，再由親友筆記下來。內容不外乎日據時期的生活經歷，以及對於臺灣文學的諸多期許。至於光復後在政治上較為敏感的部分，則採取盡量迴避的立場。

其實楊逵的文學創作，從綠島時期開始，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不再和統治者對立，而以個人的生活體驗為範圍，缺少對時代和社會脈動敏銳的反應。〈和平宣言〉之導致身繫囹圄十二載，應該是極重要的關鍵（註三一）。例如他訪美歸來，在接受《前進廣場》的專訪時，就會經吐露他心中抑壓的情緒。他說：

近來身體比較差一點，常常頭暈，比剛從美國回來時瘦了四公斤。頭痛頭暈的一部分原因是我每天腦子裡都想著太多要寫的東西，可是沒有辦法拿捏尺寸，心裡的話不能講，歌功頌德的謊言我不願說，因此常常不知如何下筆，我現在覺得筆比鋤頭還重，快拿不動了。

在美國訪問那兩個月，雖然每天要坐幾個小時的飛機或汽車參加演講或座談，可是我一點都不覺得累，反而精神愉快，因為在那裡我可以說我想說的話，寫我想寫的東西，心裡不會有顧忌。回來後老問題又重現，精神與身體的壓力都很重。（註三二）

日據時代，楊逵只坐過一次文字獄，是在社會運動中為農民大會寫抗議文，罵日本政府而被捕，刑期僅有七天（註三三）。光復後卻因為呼籲和平，被自己熱愛的祖國囚禁十二年。不論對楊逵，對他的家屬，都是最殘酷的打擊。縱使是歷史造成的錯誤，但要平復創痛談何容易？想寫不

敢寫，這也就是爲什麼楊達晚年一直有心揭露二二八以來的所見所聞（註三四），卻始終沒有完成的原因，而臺灣史上關於左翼運動的重要見證，也隨著他的去世深埋在九泉之下，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缺憾。

另外，楊達第二期作品風格轉變的原因，和他對於左翼文學觀點的修正，也有相當程度的關聯。例如他曾經說過：

真正好的作家，不僅要反映時代的真貌，甚至還要帶動時代，左翼文學對於時代的看法是偏頗的、扭曲的。（註三五）

因此像〈送報伙〉那樣的左翼文學，也就沒有出現在晚期的作品中。

總括說來，楊達早期的作品以小說和文學評論成績最好，風格也較富於多樣性。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反帝反壓迫的色彩鮮明。至於寫作的工具，幾乎都是日文，中文只有寥寥幾篇。唯一較通順的〈死〉，發表時已經由他人潤飾過，楊達親筆的原稿是以臺灣話文寫成，假借字太多，並不流暢。晚期作品悉數爲中文的創作，無一例外。以散文、戲劇的成就較高，小說大多是改寫自前期的作品而成。而〈壓不扁的玫瑰花〉因爲入選國中課本，使其再創文藝生涯的巔峰，值得特別注意。一般說來，這時期散文與小說創作的篇幅都不長，尤其散文趨向於幽默清新，表現平實質樸的風格，耐人品味。



### 第三節 楊逵與《臺灣新文學》雜誌

楊逵一生創辦過許多種刊物，其中以《臺灣新文學》雜誌歷時最久，影響力也最爲深遠。

《臺灣新文學》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正式創刊，內容中、日文各半，實際業務由楊逵和葉陶夫婦主持（註三六），總部設在臺中。漢文以及日文詩部分的編輯任務，分別委託給賴和與鹽分地帶的詩人，其餘的部分才由楊逵負責（註三七）。其中一九三六年九、十月合併號，至一九三七年四、五月號（即第一卷第八號至第二卷第四號），共七期，由於楊逵夫婦雙雙病倒（註三八），編輯工作改由王錦江（王詩琅）負責，這幾期的「編輯後記」也交由他來執筆。楊逵接手後，只再發行一期，就宣布停刊。一般相信：和日本當局下令廢止「漢文欄」有密切的關係。但是楊逵在接獲這項通知後，出版了最後一期的《臺灣新文學》，並且在「編輯後記」中說道：

漢文欄不得已在這一期開始停辦，不僅是只會用漢文書寫和只會讀漢文人們的悲哀，我們也覺得無限的感慨。但是我想漢文作家不必因爲這樣而退卻，如果還能像以前一樣繼續投稿，我們會尋找適當的譯者，在翻譯之後發表，使漢文創作更加精進。（註三九）

依然充滿雄心壯志。因此王詩琅所說：「經濟上已弄到焦頭爛額，無法繼續經營」（註四〇），才是真正的致命傷。總計《臺灣新文學》，包括其間出版的《新文學月報》兩期（註四一），前後共十四期。

楊逵在創立「臺灣新文學社」，發行《臺灣新文學》雜誌之前，本來是《臺灣文藝》編輯中的一員（註四二），後來由於跟張星建選稿意見的不合而退出（註四三）。為此，支持兩方的人馬還在報上展開一場筆戰（註四四）。楊逵並曾因而走訪張深切，希望能夠化解彼此的歧見，讓已經走入情緒化的爭端立即停止。針對「臺灣文藝聯盟」及《臺灣文藝》雜誌的組織問題，他贊成張深切所說雜誌必須在經濟上訂定獨立計畫的意見之外，另有自己的兩點主張：

一、「不管現有團體的有無，讓各地方關心文藝的人們加入文聯。（各個地方團體任其存在。）」

二、「文聯指導部根據嚴格的民主主義舉行公開選舉。」（註四五）

文藝聯盟成立不久，楊逵就有擴大組織的建議，但是這樣的主張被視為偏見，未被採用（註四六）。筆戰時期，楊逵又以林泗文的筆名，呼籲進步作家團結一致（註四七）。但是理想的未能實現，加以文聯本部重要幹部的排擠，楊逵在東京《文學評論》上公開指責文聯的組織鬆散，究竟是作家的組織或是讀者的組織並不明確，並且表明即將創辦新雜誌的立場，他說：

目前我們最大的任務在於如何不使（臺灣文學運動）分裂，以及讓文聯成員及文聯以外的臺灣作家和讀者的文藝熱恢復。各地的朋友建議我要再出版一本雜誌，我也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註四八）

文章發表後，楊逵就創辦了「臺灣新文學社」，發行《臺灣新文學》雜誌。但是他的另起爐灶，反被視為分裂的象徵（註四九）。原有的紛爭並未因此而消弭，《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之間互別苗頭的意味濃厚。例如張星建在《臺灣文藝》中宣稱楊逵公然散布「謠言」，指「《臺灣文藝》沒收了好的原稿，有些沒有刊載的文章比登出來的文章還好」（註五〇）。楊逵立刻於《臺灣新文學》中登出遭張星建拒絕採用的《邁向紳士之道》（紳士への道）（註五一），要求讀者評鑑作品的優劣，隨即獲得回響。次號的《臺灣新文學》中，吳濁流和茉莉都給予這篇文章正面的肯定（註五二）。茉莉並且盛讚這篇文章，是「臺灣有始以來最棒的諷刺文學作品」（註五三）。事實上，是否刊登藍紅綠的這篇〈邁向紳士之道〉，可以說具體展現了兩本雜誌在意識型態上的差異（註五四）——

對於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楊逵「相信臺灣文壇的未來有賴於衆多無名的作家，而不是兩個、三個已經成名的作家」（註五五）。因此拔擢本地的無名作家，充實整個臺灣的文學環境，就成為《臺灣新文學》雜誌的重要任務。吳濁流即是由此崛起，他的處女作〈水月〉（日文篇名原為

《海月》），就是發表於《新文學月報》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三月）；《泥沼裡的金鯉魚》（とぶの絆鯉）也入選臺灣新文學賞的佳作（註五六）。除此之外，兩本雜誌的作家大概是共通的。

至於《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的編輯方針，原本都是中、日文合刊，後來也同樣面臨了中文作品短少的命運。但是《臺灣新文學》在提昇中文作品的素質方面，可以說比《臺灣文藝》更為積極。例如第一卷第十號原擬出版「漢文創作特輯」，刊登八篇中文小說創作（註五七），執筆作家都是一時之選。後來因為當局以「內容不妥當，全體空氣不好」的理由查禁，而未能發行。（註五八）

儘管兩本雜誌在內容上近似，但顯然地，《臺灣新文學》更能積極地把握臺灣的現實環境，具有較濃厚的寫實主義色彩（註五九）。因為楊達個人的關係，《臺灣新文學》雜誌和日本左翼作家之間，也有極為緊密的連繫。創刊號在《對臺灣新文學的期望》（臺灣新文學に所望すること）中，就登出德永直、葉山嘉樹、前田河廣一郎、貴司山治、細田民樹、張赫宙……等十六位日本及朝鮮籍普羅作家的感言（註六〇）。《臺灣新文學》並且被認為扮演了日本《文學評論》及《文學案內》臺灣支部的角色。《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八期的「高爾基特輯」（ゴリキイ特輯），很顯然地，是受到了《文學評論》第三卷第八號的《高爾基哀悼》（ゴリキイ哀悼）的影響。（註六一）

一九三六年八月，《臺灣文藝》在日本政府的壓力下停刊之後，《臺灣新文學》又苦撐了一段時間，直到次年的三月為止，因此而成爲日據時代最後一本中、日文並刊的文學雜誌（註六二）

，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 第四節 遺稿的發現

楊達在世時，據傳他有一箱作品從未正式發表。但是聞風而去，願意爲他整理舊作的熱心青年，莫不空手而返，使得這箱舊稿始終瀰漫著像霧一樣的謎團（註六三）。一九八五年，楊達去世之後，這批遺作從深鎖的鐵櫃裡，以及數位不知名的人士手中被挖掘出來（註六四）。內容包括劇本、相聲腳本、自創的童話或諺語、詞曲的創作，以及散文、小說，呈現出多樣的風貌。使用的文字包括日文、臺灣話文與國語三種。在時間方面，則以首陽農園和綠島時期的創作量最爲豐富。

這些遺稿由楊達的孫女楊翠，及其夫婿魏貽君負責整理。其中，楊達在綠島時期的劇本底稿和家書已經結集出版（註六五），部分作品也已單篇發表。這些都是中文的創作。日文方面，因爲翻譯的問題，一直未能刊行，但相信發表的時間指日可待。由於日文作品年代久遠，日據時期報章雜誌亡佚甚多，因此難以查考是否曾經刊行，只得暫行比對河原功編楊達氏「著作目錄」，以此論斷。茲將楊達迄今尚未發表的遺稿列表如下，無題殘稿則不予收錄。

一、日文部分 寫作時間加（）者，係筆者之推測。

篇名	中文譯名	日文原名	類別	原稿用紙	寫作時間 年、月、日	備註
病兒	病兒	病兒	詩	一五×二〇		
公學校——台灣風景(一)	公學校——台灣風景(一)	公學校——台灣風景(一)	小說	二〇×二〇	一九二七	因文中提及霧社事件，寫作時間疑為作者筆誤。
收穫	收穫	收穫	小說	二〇×二〇	一九三一	
不景氣的醫學士	不景氣な醫學士	不景氣な醫學士	小說	二〇×二〇	一九三二	
毒	毒	毒	小說	二〇×二〇	一九三二、 五、二五	
文學雜感	文學雜感	文學雜感	文學評論	二〇×二〇		
小說、非小說	小說、非小說	小說、非小說	文學評論	東京原稿用 紙一〇×二	一九三四、 六、一八	
初當新聞記者	新聞記者一年生	新聞記者一年生	小說	東京原稿用 紙一〇×二		署名為「孤兒」
作家、生活、社會	作家、生活、社會	作家、生活、社會	文學評論	一〇×二〇	一九三四、 六、二一	
素樸的提倡——實感與 感動性	素樸な提倡——實感と 感動性	素樸な提倡——實感と 感動性	文學評論	臺灣文藝聯 盟稿紙二七 ×一〇		署名為「水守龜之 助」

送別軍隊	樂觀主義的警鐘	賣狗肉的人們	什麼是紳士	在女人面前	臺灣文學界的回顧	建設的文學——十七年	一個山地青年之死	不要悲傷——寫給女兒	聲明書	捍衛文學——關於小說 「榮生」中的訴訟案件 聲明書	個人想法的更正及二、 三個希望
師を送る	樂觀主義への警鐘	狗肉を賣る人々	紳士とは何ふや	女の前にて	臺灣文學界の回顧	建設の文學——十七年	ポーモの死	悲しむな——娘に與へる	關する聲明書——	文學を守れ——小説「 榮生」をめぐる告訴沙汰 關する聲明書——	私案の訂正と二三の希 望
詩	時局感言	時局感言	?	?	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	小説	詩		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
					「首陽農園 稿紙（以 下皆同）」		一〇×二〇	一〇×二〇	）	二〇×一〇 （直式稿紙 ）、六、七	一五×一〇
		、九 （一九四三）	（一七四二）	（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			二、一四	一九三七、 二、一四	（一九三六 ）、六、七	一九三五、 七、三一
			稿 與（在女人面前） 內容相似，四張殘	未完稿僅一張			「ポーモ」是小說 中一個山地部落青 年的名字				

在建设的悲劇角色	建設に於ける悲劇の役割について	文學評論	？、四、二	
落葉集	落葉集	隨筆	一、九、二	
關於性格分裂	性格分裂について	文學評論		
爲了戲曲的進步	戲曲向上のために	文藝評論		
有這條「道」路！——	この「道」あり！——	文學評論		
文藝時評	文芸時評——			
長腳蚊	やぶか	小説	五、六、二	殘稿
破舊的鞋子	老朽の靴	小説		兩份，字句稍有不同。
木蘭從軍	木蘭從軍	小説		
挿秧競賽	田植競争	小説		
滿州豬	滿洲豚	小説		
「黃昏」和「某日的午後」——觀賞台中州美術展——	「薄暮」と「或日の午後」——台中州美術展見る——	文藝評論		
賴和醫生的木屐	賴和先生の下駄	隨筆	八、五、二	
都是一樣的喲！	御同様なんてすよ	戲劇		
螞蟻的建築	蟻の普請	小説		



條播密植及其他

正條密植その他

文學評論

八 ?、六、一

二、中文部分：

篇名	類別	原稿用紙	印	寫作時間	備註
勞働者階級的陣營	政治思想	二〇×一〇 (D型)	印	(一九二四—一九二七)	
別柴困仔	小說	二〇×二〇		日據時期	
春天歌頌	散文	「臺灣文學社製」 一〇×二〇	一	綠島時期	
自傳	散文	「新生筆記簿」	一九五二—一九五五		
作者與讀者	書信	「新生筆記簿」	一九五六	一九五六、六	
我要克難一把琴	詩歌	「新生筆記簿」	一九五六	一九五六、?	
三個臭皮匠	書信	「新生筆記簿」	一九五六	一九五六、七	
文藝與生活	書信	「新生筆記簿」	一九五六	一九五六、九	
寶貴的種子	童話	筆記簿(以下皆同)	一八	(一九五八)、四、	楊遠於封面上標明(童話、隨筆、詩)

麻雀戰勝了老鷹	童話		(一九五八)、四、 二六	
花瓶的故事	童話		(一九五八)、五、 一四	
颱風小姐	詩		一九五八、(八)、 二三	
勝利之歌	詩		(一九五八)、九、 三	
月光光	童謠		(一九五八)、九、 二〇	
祝你們的新年好	詩		(一九五八)、一二 、二〇	
青春讚美	散文		(一九五九)、三、 二〇	
不做就不會錯嗎？	散文		(一九五九)、四、 一	
黎明曲·公雞叫	詩		(一九五九)	
十年	詩		(一九五九)	
大潮	詩		(一九五九)	
雙十讚歌	詩		(一九五九)	
恨霸如仇的母親	追悼文			殘稿
(春蘭女士：妳好……)	書信	東海農園二〇×二〇	一九七九、八、五	

除了以上單篇的作品之外，楊逵遺物中還發現有兩本謠諺集，及一本詞曲集。兩本謠諺集都是長約三吋、寬約兩吋的小本子，收錄有本省의 童謠、諺語、歇後語及民歌，其中也有少量是楊逵自行創作的，例如「我要克難一把琴」及「百合」。而收集自民間的作品，多用假借字或羅馬拼音記錄而成。詞曲集長約四吋、寬約三吋。包括本省各地及高山族的民謠曲，有些已加填楊逵自己創作的歌詞。也有部分歌曲的旋律由楊逵自行譜成，披露他在文學之外鮮爲人知的才華。

在未發表的遺稿中，有三篇童話式的寓言故事——〈寶貴的種子〉、〈麻雀戰勝了老鷹〉和〈花瓶的故事〉。連同已發表的〈大牛和鐵犁〉、〈瞎子打架〉、〈瞎子打架〉（註六六），目前已知，楊逵的童話作品共有五種。其中〈大牛和鐵犁〉、〈瞎子打架〉和〈麻雀戰勝了老鷹〉，都在闡明團結合作的重要，簡單的故事卻饒富深意。〈寶貴的種子〉以對比的手法，嘲諷學有專長的歸國學人因短視近利而自毀前程，突顯鄉下人勤勞純樸、善良無私的可愛。〈花瓶的故事〉批判日本人在臺灣強搶豪奪的劣行，然而技巧稚拙，並不是篇高明的創作。巧的是，這五篇童話除了〈瞎子打架〉作於一九五六年外，其餘四篇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到五月間寫成，其中道理值得玩味！

註釋：

- 一 楊逵著〈沈思·振作·微笑〉，《自立晚報》，民國七四年三月十三日。文中敘述往日本求學時爲十八歲有誤，應爲十九歲。

歲有誤，應爲十九歲。

二 楊遠自述當時〈送報俠〉之能獲獎，實是大出意料之外。有了這個鼓勵，加以社會運動實際行動的不可能，因此促使他走上文學之路。見其著〈臺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談我的一些經驗和看法〉，《文季》卷一期一，頁三三。

三 包括日翻中、中翻日，以及英翻中三種。

四 所謂「普羅」即是「普羅列塔利亞」的簡稱。譯自日文「プロレタリア」，而日文是由法文原字 Proletariat 音譯而成，意思是指「無產階級的人」。因之所謂「普羅文學」就是「無產階級文學」。

五 劉崇稜著《日本文學概論》，臺北、水牛出版社，民國七一年八月再版，頁九三、二三八。

六 日本著名新劇運動的領導人，也是普羅文學重要作家。

七 戴國輝、內村剛介訪問，陳中原譯〈楊遠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遠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見《文季》卷一期四，頁一六。

八 就現有的資料來看，〈送報俠〉之前，楊遠只發表過〈自由勞動者的生活〉與〈當前的國際情勢〉兩篇作品。即使河原功編排的楊遠氏「著作目錄」有所疏漏，實際數量應該也不會超過太多。

九 由日本普羅作家創辦的無產派文藝雜誌，西元一九二四年六月創刊。

十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在東京成立，《戰旗》爲其機關誌。一九二九年以後寄到臺灣的數量逐漸增加。楊遠自述在日本時拼命閱讀《文藝戰線》及《戰旗》雜誌，顯然在時間上記憶有誤。其接觸《戰旗》之始，應在臺灣。

一一 見註七所引資料，頁一五。

二三 河原功作、葉石濤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上）——日本統治下在臺灣的社會運動〉，見《文學臺灣》創刊號，民國八十年十二月，頁二三六。

二三 葉石濤著〈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將一九三〇年代稱為臺灣文學的成熟期，當時的文學風格傾向於寫實主義。見其著《臺灣鄉土作家論集》，臺北，遠景出版社，民國七十年二月再版，頁一六。

二四 宋冬陽著〈先人之血、土地之花〉，見《臺灣文藝》期八八，民國七三年五月，頁六一—七。

二五 楊遠著〈臺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談我的一些經驗和看法〉，見《文季》卷一期一，頁三二。

二六 楊遠在「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上的書面意見。見《大學雜誌》期七九，民國六三年十一月，頁三三。

二七 詳見附錄二之河原功編楊遠氏「著作目錄」。

二八 昭和十六年發行第一卷，第二卷發行時間不詳。第三卷、第四卷分別於昭和十八年十月、十九年十一月上梓。

二九 楊遠口述、劉依萍整稿〈談抗日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見《文訊月刊》期七、八，民國七三年二月，頁一六一。

三〇 《民俗臺灣》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創刊，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廢刊為止，共出版四十三期。由日本人金關丈夫、池田敏雄實際負責編務。在日本政府強迫臺灣人改姓名、廢棄舊習慣的同時，介紹臺灣民間的風俗習慣，別具意義。楊遠在《民俗臺灣》投稿的四篇為〈民衆の娛樂〉（第二卷第五號、昭和十七年五月）、〈土地公〉（第二卷第十號、昭和十七年十月）、〈納鞋底〉（第三卷第二號、昭和十八年二月）、〈再婚者の手記〉（第四卷第二號、昭和十九年二月）。

- 二 楊逵著〈民心〉，見《臺灣公論》第十卷第四號，昭和二十年四月，頁二〇。
- 三 同前註，頁二一。
- 三 「價值懸空」、「信仰崩潰」兩個詞語，引自張恆豪著〈超越民族情結，重回文學本位——楊逵何時卸下「首陽農園」？〉，見《文星》期九九（復刊號），頁一二三。
- 四 該書於昭和十九年（西元一九四四年），印刷中被查扣而禁售。
- 五 〈阿Q畫圓圈〉發表於《文化交流》第一集，民國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楊逵在遺作〈我的卅年〉中，對於該篇的寓意有極爲詳盡的說明。見《壓不扁的玫瑰》，頁二一〇。臺北、前衛出版社，民國七五年四月三版。
- 六 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民國七六年二月初版，頁八二—八八。
- 七 彭瑞金著《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八十年三月第一版第一刷，頁八六、九〇。
- 八 其學習經過在〈我的小先生〉一文中，有極爲生動的描述。見《壓不扁的玫瑰》，頁一一九—一二四。
- 九 胡子丹著〈楊逵綠島十二年〉云：「他（按：指楊逵）一定用了不止一本國語字典，每次看到他，他隨身佩戴中，破爛的一本國語字典總是少不了的。」見《傳記文學》卷四六期五，民國七四年五月，頁七三。
- 一〇 《楊逵畫像》，頁四—六。
- 一一 張恆豪著〈楊逵回憶錄的感想——編者後記〉，見《臺灣文藝》期九四，民國七四年五月，頁二一七。

三 引自陳春美著〈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訪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遠〉中楊遠的談話。見《前進廣場》期十五，民國七二年十一月，頁四—五。

三 楊遠著〈臺灣文學對抗日運動的影響——十一年前一項文藝座談會上的書面意見〉，見《文季》卷二期五，頁二一。

四 楊遠云：「想來，二二八事件以來的種種事情，漏掉沒有寫的，還有許許多多。我既然特意搞的是文學，通過文學，我來把要說的話說出來。四十到八十之間的事情，我想一定要把它的一切寫出來。」可見他一直有心揭露二二八以來的所見所聞。見註七所引資料，頁三〇。

五 引文見柳映隄著〈彷徨·覺醒·希望〉，《幼獅文藝》卷四〇期四（二五〇期），民國六三年十月，頁一一一。

六 創刊號中臚列的同仁名單如下：

編輯部：賴和、楊守愚、黃病夫、吳新榮、郭水潭、王登山、賴明弘、賴慶、李禎祥、高橋正雄、葉榮鐘、田中保男、楊遠。

營業部：莊明當、林越峰、莊松林、徐玉書、謝賴登、葉陶。

其後名單並曾有數度更動。王錦江（王詩琅）著〈「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云：「但這只是名單的臚列，實際上一切業務則殆全部由楊遠和葉陶夫婦兩人辦理。」見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5」之《文獻資料選集》，臺北，明潭出版社，民國六八年三月初版，頁四〇三。

七 楊遠自述：「中文由賴和先生，日文詩由郭水潭等『鹽分地帶』詩人們分別負責選稿，其他才由我來

編。其中有一段因我生病，拿到臺北請詩琅兄代編。」引自〈傳下這把香火——「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座談會〉，見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主編之《文學史話》，臺北、聯合報社，民國七十年，頁四二三。又，依據前述編輯同仁名單，負責編輯日文詩的應是郭水潭、吳新榮。

三 見《臺灣新文學》九、十月合併號之「編輯後記」。

三九 《臺灣新文學》六、七月號（第二卷第五號），昭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發行，頁六七。

四〇 《文獻資料選集》，頁四〇五。

四一 分別於一九三六年二、三月出版。

四二 楊遠由第二卷第七號（一九三五年七月發行）起加入編輯的行列。並與賴明弘、莊明東、張深切共同執筆當期的「編輯後記」。《臺灣文藝》第二卷第六號（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版）「編輯後記」中曾經預告：「編輯事務，從下期開始接受楊遠、賴明弘，和陳瑞榮的協助。」

四三 同註三七所引資料，《文學史話》，頁四二三。

四四 例如張星建在《臺灣新聞》發表〈文聯の「公賊」〉，指責楊遠跟賴明弘中傷「文聯」（臺灣文藝聯盟）。楊遠也在《臺灣新聞》上發表過〈提燈無益——文聯團體的組織問題〉與〈楊遠撒謊還是張深切撒謊〉為自己辯解。

四五 楊遠走訪張深切的經過及其建議，見楊遠著〈個人想法的更正及兩、三個希望〉（私案の訂正と二三の希望）底稿，作於昭和十年七月三十一日。依據河原功所編楊遠的寫作年表並無此文，疑為未發表的遺稿。

四六 賴明弘著〈臺灣文藝聯盟創立斷片回憶〉云：「文藝聯盟成立後不久，雖有楊遠先生等少數人以提議



擴大組織為藉口，高唱異調幾趨分裂，但全島的文學同路者，深感團結力量與鞏固組織之必要，均摒棄偏見不予重視才不致分裂，仍能一直支持下去。」附於復刻本《新文學雜誌叢刊》③《臺灣文藝》之前。

四七 林泗文著〈迎接文聯總會，提倡進步作家的大團結〉，《臺灣新聞》，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四八 楊遠著〈臺灣文壇的近況〉（臺灣文壇の近情），見《文學評論》卷二號十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東京，頁一三六—一三七。

四九 巫永福就表示，自己未曾在《臺灣新文學》上發表文章，是因為他認為「臺灣人不可分裂，要集中力量；對抗日本人才行」。並且懷疑筆戰拖了相當長的時間，是由於《臺灣新聞》的編輯田中保男從中挑撥。見巫永福著〈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運動和楊遠〉，王曉波編《被顛倒的臺灣歷史》一書，頁三四六—三四七。

五〇 昭和十一年四月發行之第三卷第四、五號「編輯後記」。

五一 藍紅綠著，發表於《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五號（六月號）。

五二 見吳濁流著〈邁向紳士之道〉與「田園小景」〈「紳士への道」と「田園小景」〉、茉莉著〈關於臺灣新文學六月號之作品〉（臺灣新文學六月號の作品について），俱發表於《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六號，一九三六年七月。

五三 同前註，頁六一—六二。

五四 葉石濤在〈「臺灣新文學」與楊遠〉中云：「其實，這並不是要不要刊登一篇小說的問題，在那背後有更深刻的意識形態的糾紛存在；那便是關係到臺灣新文學運動理想的狀態和文藝大眾化路線的各人

- 見解不同。」見其著《走向臺灣文學》，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七九年三月第一版第一刷，頁八八。
- 五 引自《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五號之「編輯後記」，一九三六年六月。
- 五 發表於《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三六年六月。
- 五 這八篇中文的創作是：賴賢穎的〈稻熱病〉、尚未央的〈老雞母〉、馬木歷的〈西北雨〉、朱點人的〈脫穎〉、洋的〈鴛鴦〉、廢人的〈三更半暝〉、王錦江的〈十字路〉、一吼的〈旋風〉。此外，該期亦有數篇日文創作。
- 五 引自王錦江著〈「臺灣新文學」雜誌始末〉，見《文獻資料選集》一書，頁四〇四。
- 五 黃得時著〈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附於《新文學雜誌叢刊復刻本》①《南音》之前。
- 六 收於《臺灣新文學》創刊號頁二九—四〇。
- 六 尾崎秀樹著〈決戰下の臺灣文學〉，見其著《舊殖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第一刷，頁一六五。
- 六 葉石濤著〈楊遠的「臺灣新文學」〉，見其著《臺灣文學的悲情》，頁七七。
- 六 鍾肇政著〈勞動者之歌——讀楊遠戲劇集〉，見《睜眼的瞎子》，臺北、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九年三月初版，頁五—六。
- 六 楊建著〈整理遺稿，重返東海花園〉，《自立晚報》，民國七八年四月十九日。
- 六 即《綠島家書》，與《睜眼的瞎子》、《樂天派》兩本劇作集。
- 六 兩篇在《壓不扁的玫瑰》中皆有收錄。

## 第四章 楊逵的散文與詩歌

楊逵的散文作品，包括評論、時局感言、追悼文、隨筆雜文、回憶錄以及演說的記錄。就文章發表的時間來說，文學評論絕大多數集中於創辦首陽農園以前，回憶錄和演講會的記錄則多在晚年。由於楊逵當時患有腦疾，注意力渙散，不利於筆耕，因此都是口述之後再由親友記錄下來。隨筆方面，大部分是綠島時期的作品，出獄後偶而也有小品文發表。在此之前，則絕少純文藝的隨筆之作。這固然是因為當時的文學環境普遍如此，作家都將心力投注於小說、戲劇與文學評論（註一），相形之下，隨筆就成為荒疏的園地；另一方面，也是緣於楊逵著力於新文學運動的推展，文學作品被視為反殖民、反壓迫的一種手段，因此幾乎篇篇都是有特定的意識型態。例如〈街頭素描〉（町のプロフィール）（註二）的重點是在評論江博士於彰化中華會館舉行的演講會，兼及楊逵本身文學觀點的闡發。即使〈我的書齋〉（私の書齋）（註三），內容也是在於揭露農工階級生活的疾苦。所以真正純文藝的散文，直到綠島時期才有較多成熟的作品出現。這些篇章後來結集出版，收錄在《羊頭集》中，到前衛版時書名改稱《壓不扁的玫瑰》。本章除了這些隨筆雜文外，還將探討楊逵的詩歌、家書和文學評論。

## 第一節 文學評論

楊達的文學評論絕大部分發表於日據時期，一方面致力於介紹臺灣文壇發展的現況給東京的文學界；另一方面則是針對當時刊載的文藝創作，抒發自己的文學見解。雖然這些篇章在文藝理論方面並不會有特別的建樹，卻因為記錄臺灣文學演進的軌跡，而成爲珍貴的史料。現今坊間有關臺灣文學史方面的著作，疏忽其重要性，未能加以利用，不能不說是種遺憾。

由於楊達的文學評論經常是一時的感言，零星而不具備系統性，因此本文擬作通盤的探討，綜合提示楊達一般性的文學觀點。至於其前後思想轉變的歷程，只得暫時擱置一旁。

### 一、文學是大衆的

楊達說：「所謂文學是爲了把思想情感傳遞給別人，而以文字爲手段。文學的最高目的，在於最充分最正確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對他人做最完全的一種傳遞。」（註四），因此「作品好壞決定的標準，在於讀者大衆給予的回響。」（註五）若是存著「只有三個人懂就可以」，或者希求「百年後能有知己」的想法，都是錯誤的（註六）。藝術既然不能遠離人群，所以「真正鑑賞藝術的是大衆，僅能讓少數人理解的東西不是藝術。真正的藝術是能抓住大衆的心，動搖他們心靈

的作品。」（註七）偉大的藝術能超越國境，擴大它的影響力（註八）。致力於文學的普遍化，使其為各種社會背景的人所欣賞、所接受，才是作者應該努力的目標。

## 二、文藝批評與作品

文學的本質是藝術，不是小技巧的手藝，「文學的生命是內容、是思想。」（註九）若是忽略藝術生命中最重要之感動性，只掌握細微的技巧問題，「重視作品一行一行的意味，從而產生對於作品的價值判斷」（註十），等於捨本逐末，鑑賞的標準也將模糊不清。因為真正的藝術鑑賞者是大眾，文藝作品的批評如果專由批評家或者作家來執行，必將使文壇自陷於狹小的境地之中。作家依循批評家訂定的模式來創作，所有的作品都會像衣店陳列的架子一樣，呈現一致性而缺乏獨特的風格（註一一）。但這並不是說文藝批評不重要，爲了要有優秀的專業文學，「批評家或作家對於作品的批評與分析，是：研究該作品題目的社會性與靈活性，再以讀者正反兩面的批評來做歸納，最後加以參考它是爲了自己或者他人而創作，綜合以上，來提高讀者的水準。」（註一二）因此文藝批評本身對於提振文壇的活力與進步，負有重責大任，不可等閒視之。

## 三、寫作的條件

文藝作品可以陶冶人們的性情，但是職業作家畢竟少數，以其有限的經驗範圍，是不能擴展到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而任何人的日常生活裡總有些經驗，可以被發掘出來，成爲寫作的材料，貢獻給社會大眾。因此，業餘作家的地位也不容忽視。（註一三）

寫作既然不是天才的專門，文章的成敗就有賴於靈感的掌握。然而靈感不是可以憑空得到的，守株待兔的方式亦不可取，而是需要經常的努力，在平日積蓄豐富的知識。如果「庫存的知識越多，產生靈感的機會越多，發明與創造的機會也就越多」。「下筆成章固然是有的，要寫一篇有靈魂、有魄力的文章，絕對不是毫無準備、毫無用過工夫的人可以隨便做得到的。」（註一四）因此鼓起勇氣，拿起筆桿來試試看，「所有有關寫作的問題，在這嘗試之中自然就會被發現，解決也就容易了。解決了任何層層問題，都是一步步的前進，終會達到『表情表得好、達意達得妙』的境地。」（註一五）

#### 四、寫實主義的文學

在楊逵的心目中，「寫實、激進、偉大的社會變革小說」，才是世界文學的優良傳統（註一六）。在挖掘現實社會黑暗面時，如果能夠興起一絲絲奮鬥的意志，希望也會自然浮現。寫實主義就有如糞肥，糞肥是人人厭惡、避之唯恐不及的，但是「見到施了糞肥的葉菜和植物欣欣向榮、閃閃發亮的樣子，這也是何等富於羅曼蒂克的啊！」（註一七）因此寫實主義的作風值得提倡，

好文章的起碼條件，就要能反映時代的真實內容（註一八）。除此之外，更要進一步帶動時代，作家的任務就是要塑造不斷打拼，不斷追求光明的動力形象，在悽慘的現狀中找出活路（註一九）。「所以作家要生活在大眾之中，從實際生活中去發掘資料，從失望中創造出建設性的、有前途的東西來。」（註二〇）

報導文學因為具備了觀察、思考、生活三位於一體的特質，帶有濃厚的寫實精神，就成為楊達最重視的一種文學類型（註二一）。光復初期，楊達也曾經呼籲：「為使文學與人民大眾連繫在一起，喚起群眾興趣，鼓勵群眾參加文藝工作及創作」，應該提倡寫實的報告文學，藉以完成重建臺灣新文學的歷史任務（註二二）。

## 五、文學的修辭與技巧

在文藝創作方面，「用小學生都懂的淺易字句，寫出最深刻的文章」，可以說是楊達生平致力的方向。因此他反對一切虛偽的形式客套，強調實用的重要性（註二三）。在他的創作生涯中，題材與技巧或因為時間的改變而有不同，但內容絕非無病呻吟。因為「文學的遊戲和華麗辭藻的堆砌，都和文學的本質無關，談文學的意義不應只在文字的表面尋求。」（註二四）

辭彙方面，由於語言不斷地演變，其中的一種方式是「時刻在接受融合外來語與方言，而越變越美、越豐富。可見無論是外來語或是方言，只要它是含義正確、含蓄豐富的好語句，我們就

應該盡量採用它，才不致貧乏。」（註二五）但是在語言方面標新立異，使用古怪的字句，卻不是正確的表現方法，他認為「除非這一句話非用此奇句或方言，不足以造成一種特殊的效果，否則徒然增加讀者的困擾」，是沒有必要的（註二六）。質樸、平淺才是楊逵推許的文字特色。

爲了迎合讀者的口味，文章的表現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固然文章免不了要些誇張與剪裁的，但誇張不能超過一般讀者所想像得到的範圍；剪裁只能把無關緊要的剷除，把緊要的組成有系統的東西，以幫助讀者的瞭解，並不是不顧事實，另外製作一套虛玄的神話。」（註二七）因此技巧固然需要講求，太多的文學花招則非必要。言之有物，真實的作品才能獲得大眾的共鳴，不致與實際生活脫節。（註二八）

## 六、建立草根性的文學

楊逵在日據時期的文學評論，反覆述說的無非是「文學是大眾的」，和「寫實主義」的理念。到了晚年，他將兩者綜合歸納，提出了「草根文學」的主張，本質上並沒有多大的差異，要點分爲三項：

第一、使用通俗的語言，平實的技巧，讓一般識字的人看得懂，唸給文盲也聽得懂。

第二、情節要帶有趣味性，能夠吸引讀者有繼續讀下去的興趣。



第三、取材於一般人日常生活，反應時代的社會事實，健康的，能振奮人心的。（註二九）

簡而言之，草根文學「就是將我們日常生活中周圍所發生的實際狀況真實地描寫下來的文學，也就是要反映真實的人民生活與社會狀況的文學。」（註三〇）爲了使草根性往下紮根、落實，文學作者必須主動出發，「跨出自己的斗室，走入群眾中，並且動員漫畫家、民謠家、雕刻家、舞蹈家等，配合各種藝術形式，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走動、宣傳，來喚起群眾的興趣。」（註三一）楊達屢次提出「文化村」的構想，願意捐獻東海花園的土地作爲建設之用，就是爲求草根文化的徹底實踐，從文學推展到每個角落。

楊達說過「從民間來，回到民間去，與大眾在一起，用民衆的聲音唱我們自己的歌，用民衆的語言描寫大眾的生活與感觸，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上去，我們一定可以跑到和平、安定、快樂的新樂園。」（註三二）對於文藝工作者，楊達懷抱著更深一層的期許，藉文學的形式組織群眾、教育群眾，形成民族的大團結，在文學領域內，楊達也充分展現社會運動家理想主義的本色。

## 第二節 隨筆雜文

楊達四十歲時臺灣光復，對於一個習慣使用日文的作家來說，政治環境的改變，迫使他放棄

原本熟練的工具，改用陌生的文字寫作，等於要兵士丟盔棄甲，剝奪他上戰場的權利。而對衆多作家息筆的無奈，楊達絲毫沒有氣餒，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下，終於也能運用中文寫出流暢的散文。這些作品都是他真實生活中的體驗，主題圍繞著以綠島時期的所思所見，與東海花園開闢的經過爲中心。

綠島時期，楊達並不因爲自己遭受禁錮而自怨自艾。文章裡，他時而勸勉受刑人振作精神、積極向上，時而鼓勵自己的家人擺脫惡運、創造未來，充滿奮發昂揚的氣概，勵志的色彩鮮明。例如〈園丁日記〉（註三三）裡記述種樹時和大自然搏鬥的情形，表現有如蜘蛛結網那般堅韌的毅力。〈太太帶來了好消息〉（註三四）描寫楊達入獄後陷入困頓的家庭，因爲親人間對彼此的愛與諒解，在協力工作中逐漸步入坦途，平凡而樸實。對於十二年的牢獄之災，楊達是以坦蕩蕩的心情，樂觀地迎向未來。

出獄後隱居東海花園，楊達的創作量銳減，有一段時間沒有任何作品發表。面對關心人士的詢問，他自嘲自己是天天寫詩，「不過，現在用的不是筆紙，是用鐵鍬寫在大地上。」（註三五）在東海花園成爲繽紛一片的同時，楊達的小品文也陸續發表，將他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展現於讀者面前。在他和孫女楊翠相依爲命的這段時間內，東海花園墾植的經過，與楊翠天真爛漫的氣息，就成爲他筆下最常捕捉的對象。尤其祖孫兩人的天倫之樂洋溢在字裡行間，筆調有如童稚般純真可愛，充分展露老人的赤子之情。楊達的散文作品中，最擅長描寫的就是這一類家居的瑣事，這些作品的風格清新可喜，有別於楊達其他類型的創作，真摯樸實，牽動讀者的心弦。

在描寫方面，平鋪直敘是這類作品的普遍風格，卻足以將畫面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比方〈我的小先生〉中，楊達記錄自己與太太葉陶兩人，向當時尚在小學一年級就讀的次女楊素絹學習國語的情形：

有時候，碰到了她不認識的字，就翻翻字典，女……尤……尤……尤。女尤、女尤、女尤、女尤——像媽媽的叫胖！

這樣逗得大家笑一場，笑完了課還是要繼續進行。

小先生教得津津有味，老學生也未曾感到厭煩。

在唸歌謠的時候，唸得高興時，我們小先生就站起來指揮，要老學生們來一次大合唱；興致來了，小先生就從我的膝蓋上溜下去，在八疊大的起居間開始跳她的舞。這時候，老學生免不了就要鼓掌來給她捧捧場。（註三六）

從幽默、雋永的筆觸中，流露出最真實、最溫暖的親情——原來學習竟也可以是這般輕鬆愉快的情境。

除了擅長刻劃場景之外，楊達也長於說理。〈智慧之門將要開了〉說：

只要不畏難、不退縮，智慧之門將會給你打開的。要解開亂麻就不能怕麻煩，該先找出

它的結，把大結小結都解開，才能夠一條一條拉出來。快刀斬亂麻固然容易，固然痛快，卻是再糊塗也沒有的傻行爲了。麻經這一刀，都變成了碎屑，還有什麼用處呢？（註三七）

又如〈新春談命運〉中說：

路是人開的，碰到江河可以架橋，碰到大山，還可以挖地洞走過去，一次挫折，就退下來，喚「命運」而迷失頹廢下去，這是弱者的悲鳴。所有偉大事業是經多次失敗才完成的。

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你該選哪一個？（註三八）

這些字句鏗鏘有聲，在辭語的鍛鍊上也有不凡之處。

楊達去世前幾年，由於健康情形欠佳，搬離東海花園，由兒女照顧生活起居。對這一片辛勤耕耘的土地，楊達自有他難捨的情衷，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又提筆寫下〈懷念東海花園——那段把詩寫在大地上的日子〉，吐露他那依依的離情。走過荒草石礫的年代，也曾經在晚霞斑斕中欣賞似錦的繁花，當再面對滿目的淒涼時，撫今追昔，楊達不禁感慨：

而東海花園，如今已是面目全非！離開後這段日子，清明時節回去掃葉陶的墓，只見及膝荒草四處蔓延，〈送報伙〉的塑像已經不知被哪一個頑皮鬼搥倒；簡陋的舊屋也被卸去了

門窗。書籍、用物都被偷走了，大鄧伯的枝椏，穿過窗框在屋內攀爬，和層層的蜘蛛網結在一起。每次都不敢停留太久；這樣荒涼的景象，實在不是我這雙七十多歲的眼睛所能凝望的啊！……歲月不斷傳遞許多訊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訊息是我已不再能用鐵鉞寫詩了。（

註三九

這篇文章詞情並茂，唯其發自內心，所以真摯感人，筆隨意到，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讀者不禁要隨著作者的心思糾結而同感惆悵。

楊達晚年的散文作品，就像〈我手寫我口〉一般自然地流洩而出，完全沒有斧鑿之跡，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但是由其創作底稿來看，滿篇盡是塗塗改改的痕跡，就連定稿的謄本上面，也不乏刪修的記號，可見楊達在由日文轉型成中文作家時，的確遇上了相當大的困難。在遺稿〈文藝與生活〉（註四〇）中，楊達表示自己的「生活與思考方法，都受到了日人很大的影響」，對於女兒素絹批評他「文章裡有些句子帶點兒臺灣調，不夠國語的標準，就像穿筆挺西裝卻又捨不得丟掉草鞋一般的不合適」，他也承認這是事實。因此爲了寫文章，他「還時常爲了幾個語句要到處去請教人家」，來彌補自己在詞彙運用上的不足。但是克服語文的障礙之後，以有限的歲月與羸弱的體力，楊達自然不可能再有豐厚的創作量。如果不是外在環境的變遷，如果能夠繼續以日文寫作發表，相信楊達在散文創作方面必定更有可觀之處！

### 第三節 綠島家書

《綠島家書》是楊逵繫獄綠島時期，絕大部分未曾寄發的家信底稿。這批信稿原本寫在四本二十五開的筆記簿上，共計一百零七封。由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寫起，一直到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為止，前後超過三年的時間。這批信件失落多年，不但家屬從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就連楊逵本人也早已遺忘，生前未曾向任何人提起過（註四一）。楊逵辭世一年之後，因緣際會，持有人輾轉透過楊翠的朋友自動送回（註四二）。在楊建一頁頁加註後，《自立晚報》副刊曾經予以連載（註四三）。後來又由魏貽君整理一次，並且加上適切的標題，於民國七十六年三月正式出版。（註四四）

對於因為楊逵入獄而飽嘗世間冷硬的親人來說，這遲來的信件披露了楊逵在逆境中溫熱的父愛，曾經有的矛盾與悲痛、不解與怨尤，都在瞬間獲得釋放。楊建說：

這些家書絕大部分未曾寄發，我乍一接到，當晚挑燈夜讀，前景舊事紛紛湧來，可以想見父親在當時嚴格的通信字數限制下，不能如願地將這些關愛寄達家人手中的悲憤之情，二來也可以知道，父親是想利用書信體的形式，來記下他飄離海外的所思所感。（註四五）

這批家信因為記載了楊達最真實的情感與思想，不僅可以撫慰在現實生活中四處碰壁的家屬，對於研究楊達的精神面貌來說，無疑是最佳的材料，彌足珍貴。

這些家書寫成的背景，根據楊建的回憶，因父親銀鐺入獄而陷於困境的家庭，正當母子多人連餬口都成問題的時候：

向電力公司租來的土地，因為電力公司要收回以增建員工宿舍，限我們在年底前搬出去，交還土地，這是民國四十六年中的事情，這件事對窮苦的我們而言，形同晴天霹靂，而父親在家書中所提及的諸事，也從這年開始。……

民國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間，家中情形一如往昔，人人都在窘困的環境中衝撞、掙扎，企圖走出一條路來。

但是這一連串的變動，只是家中每個份子各自投入生活，各自與環境搏鬥，容或稍有助於家庭，也是微不足道，媽媽仍然每日賣花餬口，債務和利息像滾雪球一樣，擔子越來越重。(註四六)

對於家人悲苦愁悶的心情，楊達頻頻以出獄團聚、重建新樂園，來激勵家人攜手合作，共度難關。(註四七)

在這三年間，楊達本身的健康情形欠佳(註四八)，子女就業與婚姻方面的問題，葉陶和孩子

們間的齟齬，更成爲他心頭沈重的負擔。對於子女們自幼就得承受因父親而來的災厄，楊達自責極深，在他給長子資崩的信上寫著：

近來你的信都充滿著悲觀、憂悶、頹喪的氣氛，叫我很擔心，也覺得慚愧。十年來，我未能盡到做一個爸爸應盡的責任，才讓你們兄弟姊妹，特別是你，吃得太多的苦了。……

小雛們剛出蛋殼，需要的是母雞用翅膀來防護、來溫暖，也需要母雞幫其覓食、帶頭找路的，在這個時候，你才十幾歲的時候，就讓你帶著幼小的弟妹們在冷酷的環境裡奔波，就是鋼鐵做的心也會痛的。這是我生活歷程中唯一的遺憾。（註四九）

這樣沈痛的語調，內心的煎熬，就是外人捧讀也不禁要爲之辛酸落淚。

但是逆境並不能將楊達擊垮，他不僅在獄中參加運動比賽（註五〇），磨練自己的身體，也屢次用「樂觀」的精神和家人共勉。例如他說：

樂觀在人生是最要緊的，只要能夠樂觀，物質上、工作上多吃一點苦也可以從安慰中得到了補償。（註五一）

又說：



我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安居樂業，保持樂觀的精神幹下去，如此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變賣填充也可以的。只要孩子們都能保持健全體魄、樂觀精神，我回去之後要重建輝煌事業是沒有問題的，快樂的晚年自不會發生問題。（註五二）

因為心中有這一股樂觀的信念，活力也就源源不絕而來，楊達表現出他一貫「順風何爽快，逆風亦何懼」（註五三）的氣概。爲了消除孩子自卑、憂鬱的情緒，不但沒有半點坐困愁城、自怨自艾的低調，楊達還一直鼓勵孩子們和文化界多加接觸，空閒時從事文藝工作（註五四）。從精神上獲得根本的快樂與滿足，以克服物質生活的貧乏。並且要孩子們放開自己的胸懷，學習愚公移山的精神，有始有終，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註五五）

由於獄中規定，每位受刑人一週只能寄出一封三百字的信，家中的每一份子又各有各的困擾，使得楊達常感心有餘而力不足（註五六）。因此利用獄中刊物《新生月刊》和家人談論問題，爲他們排憂解悶，就成爲一種變通的好辦法。《綠島家書》中寫於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家信——〈愚公和烏龜〉，後來成爲〈自強不息〉一文，發表於同年十二月號《新生月刊》，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文中呼籲家人保持馬拉松的精神，在生活方面，在一切的學問與工作上，都要沈住氣、耐住性子、一步步往前、自強不息（註五七）。不僅勉勵處於顛沛流離中的家屬，也鼓舞了在頹唐失意中的受刑人。

即使承受肉體和精神雙重的磨難，災厄中的楊達仍然保有他熱情幽默的特質。例如他寫信給初臨人間的長孫信中說道：

爸爸大壞蛋，實在該罵，怎麼可以用鬍子來刺痛你軟軟的蘋果頰呢！你得嚴厲警告他一下！如自己懶得修臉，就該請媽媽替他修，要不然呢，叫公公用鎌刀像刈茅草一樣給他刮鬍子，那就不太好受的了。

不過，爸爸曾來信抱怨你愛哭，你也得當心。人家都說嬰兒哭叫是一種運動，公公是愛運動的，自然支持你，可是運動是在白天做的呀，怎麼可以三更半夜運動起來，吵得爸媽不能睡眠，以致白天沒精神工作？逗人笑笑的調皮是可以的，逗人苦惱的調皮可不行，因此挨打小屁股，公公是不能袒護你的啊。（註五八）

長者的慈愛，在純真風趣的筆觸中自然流露，表現出楊達平凡可愛的一面。

《綠島家書》中因為匯聚了楊達的歡喜與愁悶，以及對於家人的關注和期盼，句句出自肺腑，沒有一絲一毫的虛偽與造作，讀者在心靈上受到的感動也就越深。現今出土的家書，不過是楊達獄中歲月的四分之一，相信還有更多的信稿將在日後被挖掘出來，當楊達沈埋的心事重見天日之後，他本人的個性與情感，以及思想演變的歷程，才能更清楚地呈現在大眾面前。

## 第四節 詩歌作品

臺灣的新詩運動早在日據時期就已經蓬勃發展，當時的新文學運動詩文不分家，一般作家通常都能兼寫詩、文與小說（註五九）。楊逵在日據時期是知名的小說家，依據河原功編排的楊逵氏「著作目錄」，雖然找不到在當時曾經發表過新詩的痕跡，但是遺稿中有三篇日文詩作：〈師を送る〉（註六〇）、〈病兒〉、〈不要悲傷——寫給女兒〉（悲しむな——娘に與へる）。〈師を送る〉原稿用紙上標明「首陽農園」的字樣，其他兩篇也應該是日據時期的作品。

〈病兒〉的內容並未直接訴諸心理的描寫，但是藉著具象事物的鋪陳，身為病兒的父親，在來回踱步時滿臉焦急的神態，以及他無法提供家人豐富物質生活的愧疚與不安，躍然紙上。〈師を送る〉則是描寫在自己悉心照料下，故人心愛的花仍免不了遭受種種難堪的境遇，說明作者內心難以言喻的悲哀。這首詩以花的命運比喻故人的身世，睹物思人，情何以堪？是抒情詩的佳作。而〈不要悲傷——寫給女兒〉中對於甫入學的女兒疼愛之意溢於言表。

光復初期，楊逵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詩歌創作，都是以臺灣話文的民謠或童謠的形式出現。日本統治的時代成爲過去，作家總算可以在從小生長的土地上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創作。〈臺灣民謠〉（註六一）傾洩臺灣同胞五十年來倍受壓抑的情緒，除了稱誦民間抗日的義行外，還把李鴻章和唐景崧做了一番批判。用字俚俗，充分表現民謠民間性的特質。

另一方面，政府接收後的臺灣百業蕭條，政治腐敗，在〈爲此一年哭〉中，楊逵以滿腔悲憤寫道：

很多的青年在叫失業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豬母乳」炒菜補，死不死生無路，貪官污吏拉不盡，奸商倚勢欺良民，是非都顛倒，惡毒在橫行，這成一個什麼世界呢？（註六二）

以文藝工作者敏銳的觀察力，楊逵把刊載在報上的諷刺漫畫配上自己創作的「歌謠」，發表於《臺灣文學叢刊》上。〈上任〉（註六三）中，針對當時謀職得依賴裙帶關係的現象，譏諷才學不稱其位者不過是「爛鹹菜」、「臭豆腐」。〈勤〉（註六四）裡的官商勾結，共謀不義之財，更是社會現實的反映。

隨著失業率的升高，經濟不景氣的影響，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由《臺灣文學叢刊》第二輯售價貳佰元，在第三輯升至壹仟元，三個月間漲了四倍可見一般（註六五）。百姓難以安居的情形由此可見。〈卻糞掃〉（註六六）寫的就是因家貧失學，找不到工作，只得拾取垃圾維生的辛酸故事。而〈營養學〉裡說：

先生教營養

學生學營養

高板寫白字

先生親像白令系

學生餓到瘦瘠瘠

壁頂的餅不得止飢(註六七)

更是以理想與現實兩相矛盾的狀況，做了一番深刻的諷刺。學有專長的知識份子尙且瘦削如白鷺鷥，那麼低下階層中，一般以勞力爲生的民衆呢？〈生活〉(註六八)裡的车伕，拉著車氣喘吁吁賣力地向前跑，車上抱狗的太太卻只是急著趕到市場，買塊肉餵狗。強烈對比的手法，讀者不禁要慨歎「人不如狗」啊！

綠島時期開始，楊達的新詩創作增多。〈八月十五日那一天〉、〈十月好風光〉、〈勝利之歌〉歌頌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的光榮歷史。〈祝你們的新年好〉、〈黎明曲·公雞叫〉、〈十年〉、〈大潮〉、〈雙十讚歌〉、〈青年〉、〈我們不是麻雀〉、〈一粒好種子〉……等，內容充分表達作者對於中國前途的殷切期盼，提醒全體國民守成不易，要繼承先烈的遺志，通力合作，開創民主、自由、均富的新樂園。〈人生〉、〈學習〉、〈工作〉說明人生難免有困境，縱使路途上荆棘滿佈，也要不畏險阻勇敢前行，才有成功的一天。這些作品充滿堅毅的氣概，具有「戰鬥文藝」的色彩。

在文字的技巧上，發表於《笠》詩雙月刊的：〈我們不是麻雀〉、〈一粒好種子〉、〈漁人

使用了象徵和對比的手法；〈八月十五日那一天〉的文字雖然淺易，但是作者等待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時，滿懷期待而急躁的情緒一層層逼近，直到「投降」兩字一出，才獲得完全的解放，算是寫作技巧最好的幾篇作品。

綠島監獄內，楊逵還創作了三首童謠——〈百合〉、〈明年還要好〉、〈月光光〉，以及一首民歌〈我要克難一把琴〉。四首歌謠都是對於未來有一番美麗的夢想。〈百合〉與〈月光光〉的主題是家庭的離散。前者期盼團聚那一天的來臨，後者則是期盼和父母離散之後的「百合」，仍能維持樸實、清白的家風於不墜。至於〈我要克難一把琴〉就以一個漂泊在外父親的身分，祝福家鄉的妻小快樂幸福。這幾首詩完全是楊逵的心聲，表達了他飄離海外，有家歸不得的辛酸。從以上的分析看來，楊逵的詩歌創作集中在光復以後，至於日據時期詩歌創作少的原因，在〈即興〉一詩中，他解說道：

記得小時候

我是蠻喜歡詩的

時常到曠野裡追逐

把詩當歌唱！

與蜻蜓、蝴蝶賽跑。

但在好久好久一段時間

我卻背向了詩

既不作也不唱

因為討厭「皇民之道」

讚美「七七」的暴行

更是叫人無法忍受的慘酷！

我不愛聽悲歌

悲歌卻從地牢裡響起

就像老牛的歎息

我不愛聽悲歌

周遭的陰溝裡

卻傳來一大群老鼠

吱吱叫著在搶食。(註六九)

對於以詩歌為侵略宣傳的工具，楊逵表達了他一貫厭惡排斥的立場。字裡行間對於五、六〇年代，外省來臺詩人消極的懷鄉情緒(註七〇)，也有幾分的不滿。〈詩精神〉中說：

我不會寫詩，卻討厭偽詩。

就是嫁妝滿列車送到我家裡，

也真討厭死！

偽詩裡頭，滿是偽善與欺騙。

它只講應酬——吹噓、捧場。

它愛權、愛勢、又貪小利。

借了詩的骸殼、裝得花花綠綠，

講究的卻是同污合流。

爲飽私嘗，

隨時可以叩一百個響頭！（註七一）

這樣的文學觀和吳濁流「拍馬屁不是文學」的理念，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因此無論外界詩壇如何演變，楊逵依然保持他一貫的風格，注重詩歌本身的現實意義和時代使命，有助於愛國意識與民族精神的發揚。

在用字方面，楊逵也堅持他一貫「文學普遍化」的理想，認爲首要條件必須讓每一個人都能讀懂。楊逵在接受基聰訪問時說：「創新表現手法，新潮文學可以說已脫離了古文言的窠臼，但



是在普及方面，如新詩往往就有「開倒車」的弊病。」並且認為「既決定出版，讓每一個人都懂得這豈不是很好嗎？」（註七二）因此他的詩歌作品中，完全擺脫現代詩艱深晦澀的毛病，而以最淺白平易的手法，表達自己的思想。優點是樸實，但是較缺乏藝術性，字句不夠凝鍊。趨於散文化的詩句像一則則短小的感言，不但缺乏詩歌應有的韻律感，在意境的經營上也未臻於理想。

即令如此，楊達的詩歌創作在內容上，由於紮根於現實，因此並非虛無、貧血，而是熱血澎湃、涵蘊著無窮的活力。

註釋：

- 一 以當時的文學雜誌來說，一期內通常只有一至兩篇的隨筆之作，餘則為小說、文學評論或戲曲。
- 二 發表於《文學評論》第一卷第十號，東京，昭和九年十二月，頁八五—八六。
- 三 原文發表於《臺灣新文學》創刊號，昭和十年十二月，頁五二。中譯者為廖清秀，發表於《臺灣文藝》期九四，民國七四年五月，頁一〇四—一〇五。
- 四 引自〈江博士講演評——關於白話文與文言文〉，《臺灣新民報》昭和九年曾經予以刊載。因該報散佚，此處係引用楊達手稿。
- 五 引自楊達〈文藝批評の基準〉，見《臺灣文藝》第二卷第四號。昭和十年四月，頁二三。
- 六 見楊達著〈寫在大東亞文學者會議〉（大東亞文學者會議に際して），《臺灣時報》第二七五號，昭和十七年十一月，頁一一八。

七 楊遠著〈藝術是大衆的〉（藝術は大衆のものである），見《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二號，昭和十年二月，頁一二。

八 楊遠著〈「第三代」與其他〉（「第三代」その他），東京，《文藝首都》第五卷第九號，昭和十二年九月，頁一一九。

九 楊遠著〈報告文學問答〉，見《臺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五號，昭和十二年六月，頁二〇。

十 楊遠著〈文藝批評の基準〉，見《臺灣文藝》第二卷第四號，昭和十年四月，頁二〇。

二 見註一〇所引資料，頁二一。

三 同註一〇，頁二三。

三 楊遠著〈寫作研究①／談寫作〉，《中國時報》，民國七十八年四月七日。

四 同前註。

五 同註一三。

六 廖偉竣著〈不朽的老兵〉中對楊遠的訪談記錄。收於《楊遠的人與作品》，頁一九九。

七 伊東亮（楊遠）著〈餓現實主義的擁護〉（糞リアリズムの擁護），見《臺灣文學》第三卷三號，昭和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頁一八。

八 見楊遠遺稿〈什麼是好文章？〉

九 見《夏潮》雜誌，〈楊遠訪問記——我要再出發〉。第一卷第七期，民國六十五年十月，頁五一。

二〇 同前註所引資料，頁五四。

二一 同註九所引資料，頁二〇—二四。

- 二三 見楊遠著〈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發表於《新生報》，民國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 二三 基聰著〈碩果僅存的抗日作家——楊遠〉，收於《楊遠的人與作品》，頁一八〇。
- 二四 楊遠著〈文學可以把敵人化爲朋友〉。發表於《聯合報》，民國六九年一月一日。
- 二五 楊遠遺稿〈文藝與生活〉，作於民國四五年九月。
- 二六 引自柳映隄〈徬徨·覺醒·希望〉中對楊遠的訪問記錄，見《幼獅文藝》卷四十期四，頁一二。
- 二七 楊遠遺稿〈作者與讀者〉，民國四五年六月作。
- 二八 楊遠著〈臺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談我的一些經驗和看法〉，見《文季》卷一期一，頁三五。
- 二九 引自楊遠著〈「草根文化」的再出發——從文學到政治〉，《壓不扁的玫瑰》，頁二〇一。
- 三〇 同註二八。
- 三一 同註二九所引資料，《壓不扁的玫瑰》，頁二〇一—二〇三。
- 三二 楊遠著〈一路跑上去！〉，《聯合報》，民國六八年五月四日。
- 三三 收於《壓不扁的玫瑰》，前衛版，頁九九—一一〇。
- 三四 《壓不扁的玫瑰》，頁八九—九八。
- 三五 引自楊遠著〈墾園記〉，《壓不扁的玫瑰》，頁二二。
- 三六 《壓不扁的玫瑰》，頁一二二。
- 三七 《壓不扁的玫瑰》，頁六〇。
- 三八 《壓不扁的玫瑰》，頁七〇。
- 三九 《壓不扁的玫瑰》，頁四六—四七。

四〇 原稿寫於「新生筆記簿」上，作於民國四五年六月。

四一 楊建著〈一個支離破碎的家〉，《綠島家書》序一，頁一。

四二 與楊翠訪談記錄。

四三 民國七五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於《自立晚報》副刊上連載。

四四 即臺中晨星出版社，民國七六年三月二十日初版之《綠島家書》。

四五 同註四一。

四六 同註四一所引資料，《綠島家書》，頁二—四。

四七 如寫給長子資崩信中云：「等到我回家，一切不理想的事情都可以徹底改善，我們便可以過著溫暖和氣與充滿歡樂的生活。」給長女秀俄時寫著：「好多年來一家人都吃盡了離散的苦，可是我回家之期快到了，不久我們就可以重聚，也可以給你們帶來歡樂的。」見《綠島家書》，頁七四、七九。

四八 由家信內容可以發現，偶而患點小感冒外，還有沙眼、失眠、肝機能衰弱……等毛病。信中提到最多次的事物就是藥與生病，初步統計約有三十次之多。尤其在民國四七年八月十二日以後，除了「培養理性、克制行動」與「明年四月，我就回去」之外，篇篇都是。

四九 《綠島家書》，頁五八—五九。

五〇 例如游泳和五千公尺賽跑。

五一 《綠島家書》，頁一〇二—一〇三。

五二 《綠島家書》，頁一九一。

五三 引自《綠島家書》，頁一四四。

五 例如要楊資崩「與文化界多一點接觸，多交些文化工作的朋友。」（《綠島家書》，頁三八），支持楊素娟在文藝方面繼續努力（頁一八五）。另外頁四〇、四五、五二、五五、八八……也有類似的詞句，後來楊資崩與楊建果真參加寫作訓練班，磨練自己的文筆。

五 《綠島家書》，頁三〇—三一。

五 《綠島家書》頁一五六中云：「我又每週只能寄出一封三百字的信，心有餘而力不足，恐怕很難發生有效的幫助。」就透露出他在獄中焦急而無奈的心情。

五 分別見於《綠島家書》，頁二九—三一。《壓不扁的玫瑰》，頁六三—六五。

五 《綠島家書》，頁二四八—二四九。

五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頁八三。

六 〈師を送る〉一篇，從內容上看不出是寄給「軍隊」或老師，因此暫時不予翻譯。

六 發表於《力行報》，民國三八年八月二日。當日報紙亡佚，難以查考。筆者手上擁有的是一份楊遠手稿。

六 原刊於《新知識》I，民國三五年八月。而民國七八年四月十九日之《自立晚報》曾予以重刊。

六 《臺灣文學叢刊》第三輯，民國三七年九月，頁二〇。

六 發表於《臺灣文學叢刊》第三輯，民國三七年十二月。

六 《臺灣文學叢刊》第二輯，民國三七年九月十五月初版，封面內頁標明「本輯定價貳佰元」，第三輯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月初版，封底標明「本輯定價壹仟元」。

六 發表於《臺灣文學叢刊》第二輯，頁一。

宅 刊載於《臺灣文學叢刊》第三輯之封底。

六 《臺灣文學叢刊》第二輯，頁二一。

究 〈即興〉一詩，見《自立晚報》副刊，民國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七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中，第四、五章對當時的文學風潮，有相當深入的剖析。

七 未發表的遺稿，約作於民國四四年。

七 同註二三所引資料，《楊遠的人與作品》，頁一八一。

## 第五章 楊逵的小說創作

小說創作最重要的功用，就是透過生動曲折的故事，將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傳達給讀者，使其因感動而產生共鳴。所以用小說的形式啓迪群眾、教育群眾，糾正被統治者編造的歷史，繼而領導群眾爭取自己生存的權益，就成爲楊逵小說創作的主要目的。對於小說，楊逵一直是帶有強烈的使命感。可以說，文學活動是楊逵社會運動的再延伸，小說即是他在社會運動上的另一種表現方式。

楊逵的第一篇小說〈自由勞動者的生活〉發表於一九二七年，當年他二十二歲；最後一篇〈才八十五歲的女人〉，作於一九五七年六月，楊逵已是五十二歲。兩篇的時間恰好間隔三十年。雖然楊逵是以〈送報伙〉奠定在文壇的基礎，又因〈壓不扁的玫瑰花〉成爲莘莘學子心目中的抗日英雄。但是他的小說創作量並不算豐富，若再扣去戰爭時期，日本高壓控制下發表的作品，真正在自由意志下產生的創作，數量就更少了。

值得注意的是，楊逵在生前曾經有將〈死〉、〈紅鼻子〉（赤い鼻），及〈剝柴团仔〉三篇寫成大河小說的計劃（註一）。但都只寫到第一個章節爲止，以下則付之闕如。至於未能完成的原因是什麼，現在已無從得知了！

## 第一節 作品的改寫

楊達日文小說的一部分，也在光復後重新發表。但是再次刊載的作品，並不完全以原來的面目出現。尤其翻譯成中文時，都或多或少經過改寫。日本學者塚本照和就曾經比對〈送報俠〉的各種版本進行研究，指出光復後翻譯的，和日文原稿有極大的差異。在對被統治採取反抗的姿態，與罷工集會等事件上，加上更具體的渲染（註二）。張恆豪則明白地指出——這是楊達本人修改的作品，相較之下，胡風的譯文反而較能忠於原作的精神（註三）。由於楊達增添後的文字與情節具有濃厚的階級意識，因此在本質上，還頗能反映出作者在日據時期的思想與精神。必須注意的是，就像塚本照和所說，「日本帝國主義」這樣的字眼，是絕不可能出現於日據時期的（註四）。

除了〈送報俠〉之外，其他作品中也普遍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尤其經由楊達本身翻譯的版本，不僅在事件的描寫上更為細密，甚至在思想內容方面也存在著極大的出入。下面就以蒐羅楊達日據時期小說最多的《楊達集》（註五）為例，舉出其中經過改寫，卻又經常被研究者引用的部分。所用資料，則盡量以第一次發表的稿件為準。

### 一、無醫村



本篇最後以「悲哀之餘，竟成激憤，覺得這政府雖然有衛生機構，但到底是在替誰做事呢？」（註六）明白斥責日本政府國家政策之失當，這些文字並不曾出現於日文作品之中。

## 二、泥娃娃

〈泥娃娃〉一篇，增加對於日本軍人的批評，與身為殖民地兒女悲哀的感慨。例如：「孩子們以從學校裡學來的，充滿日本軍人臭味的話和笑聲在談笑。」（註七）其中「充滿日本軍人臭味」為中文版獨有。另外，當孩子告訴父親：「我一畢業，要當志願兵。我們老師每次談志願兵，就說我要是去當志願兵，一定可以甲上級及格。」時，日文版中，父親回答：「哦！那很好！」中文版改成「我默默不語。頓時間，殖民地的兒女的悲哀，洶湧地填塞了我的心膺。」又添入「我痛苦地望著他。啊，孩子，我能告訴你什麼，我能怎樣教育你呢？」這段描述。（註八）

結局部分，中文版為：

如果以奴役別的民族，掠取別國物資為目的的戰爭不消滅；如果像富崗一類厚顏無恥的鷹犬，不從人類中掃光，人類怎麼可能有光明和幸福的一天！我真巴不得自己寫出充滿光明、喜樂的日子早些到來，並且以我的真正明朗的作品愉人並以自愉。

老大已然不再去捏玩泥娃娃，而忙著設計能真正在空中飛翔的滑翔機了。而我，要到什

麼時候才能寫出謳歌人類健朗、勇敢幸福和光明形象的作品呢？

當天夜晚，一場雷雨交加的傾盆的大雨，把孩子的泥娃娃們打成一堆爛泥……（註九）

日文原文爲：

縱然我所塑的泥娃娃勇士們是多麼勇敢地奮戰，一旦像富岡這樣的人，任意妄爲地據爲已有的話，那會變成什麼樣呢？如果不能把人類的這種性情肅清，那麼明朗的事物要如何才能盼望得到呢？我衷心地希望，我寫的全部的故事，能夠儘早以一個非現實故事的身分，就像〈西遊記〉一樣，讓孩子們在歡笑聲中讀著長大。（註十）

可見作者原先雖然對於日本強凌弱的作風隱言諷刺，卻不會明白揭示帝國主義窮兵黷武的下場，手法較爲含蓄。

### 三、鵝媽媽出嫁

〈鵝媽媽出嫁〉藉林文欽的經濟理論，傳達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社會，譏刺日本高唱「共存共榮」的口號，實際上卻是以掠奪他國爲本質。然而在《臺灣時報》首次發表時（註一一），除了提

到林文欽曾經以全體人類的目的爲目標，「考察出一個共榮經濟的理想」外，並不會再提到任何有關共榮經濟的理念，也不會明白批評過有關「階級鬥爭」的馬克斯學說（註一二）。對於日本軍閥強徵志願軍的作法，更是未置一詞（註一三）。又如結尾部分，原本只寫到鵝群失去鵝媽媽的悲哀與寂寞，中文版內又添加了：

我決心要繼承林文欽君的遺著，把《共榮經濟的理念》完成。爲了彌補自己的罪過，這是不不可不做的。

缺乏經濟知識的我，這也許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除非如此，美麗的明天就無可希求。

「不求任何人的犧牲而互相幫助，大家繁榮，這才真正是……」

我用手帕拭著因淚而發花的眼睛，忽然覺得林文欽君這最後一句正像一隻巨手在搖撼著我的心。（註一四）

使得原本悽慘黯淡的場面，轉而形成積極進取的氣氛，散發出理想主義的色彩。

刪去增添的文字後，林文欽的事件與鵝媽媽出嫁的內容，分屬兩個不相干的故事，在情節安排上顯得突兀，用意反而不如中文版來得明顯。但是一九四四年印刷中被查扣的《萌芽》一書，有關林文欽共存共榮的經濟理想，與批判階級鬥爭主張的部分已經加入。可見，這些描寫不予抽離，較能切合作者本意。至於最初發表的版本，是楊達自我克制，或是被迫刪除，由於創作底稿

的亡佚而無法確定。

#### 四、萌芽

本篇是由三封信串連的故事，以一個婦人的口吻寫信給在療養所的丈夫，請其保重身體，早日歸來。日文版中，主角說自己的丈夫：「畢業不久，因為是肺病患者，得不到療養所，讓我又陷入了頹喪失望之中。」（註一五）中文作品改成：

可是畢業不久的你，爲了民族運動的事件，竟被禁入監獄，我終於失望得像一隻喪失了燈塔的破船，一會兒，又生活在漆黑裡。（註一六）

因此等待丈夫痊癒歸來的日子，變成了等待「自由日子的到來」（註一七），這也就足以解釋，爲什麼丈夫的歸期一延再延，始終無法確定。也可以爲日據時期，一個政治受難者的家屬竟能平靜度日的疑點找到答案。（註一八）

另外，中文版內對於臺灣文藝界爲日本侵略主義服務的批判（註一九），在日文作品裡則是指責藝文界，因爲戲劇廣受歡迎，而有粗製濫造的現象。或許作者原意即是在發洩對戰爭時期，部分作家編寫「皇民劇」，爲日本軍國主義宣傳的不滿。

## 五、犬猴鄰居

〈犬猴鄰居〉（犬猿鄰組）現存四種版本。以印刷中被查扣的《萌芽》一書之日文版為最早，光復後在《一陽週報》中刊出的（註二〇），也是日文。中文版除了《楊遠集》中，由陌上桑翻譯的之外，還留有光復初期，楊遠親手翻譯的底稿，時至今日，已經殘缺不全。四份內容互有出入。其中以《楊遠集》在故事終結時，描寫臺灣籍的日本志願軍出征時，「即使為解放臺灣而戰死也無愧」（註二一）的心情最不合情理。這是根據楊遠本人在《萌芽》一書上修改的文字而來。在這個版本內原有一段前言，說明作者在全島都在「實踐」滅私奉公精神的同時，創作這篇小說的目的，是要向「將毅然站起來的本島青年的母親，也就是橫田參謀所說的『日本之母』——林堅的母親，表示感謝和感激之意。」這些文字在後來的版本中悉數刪去。並將小說中參加徵兵役的青年，由自願接受徵召改為被迫。

《一陽週報》刊載本篇時，在全文後記中說：

這篇作品，是兩年前寫成的。爲了避開嚴密的檢查制度，曾經費了一番慘澹的苦心，卻終於沒能逃避得了，而被禁止發表。在自由的青天白日底下，大概有一點點好笑吧！可是請諸位用那種心情來讀讀看！（註二二）

由字裡行間透露出戰時配給制的不公平，和少數承辦人員的中飽私囊，可以發現：表面上是以符合國策的姿態，歌頌臺灣母親們支持孩子參加志願徵兵役，骨子裡卻是在譏刺時局，這就是作者的一番苦心。

## 六、模範村

本篇原文作於一九三七年，日據時期沒有機會發表，日文原稿則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楊達集》中藉由阮新民之口說道：

日本人奴役我們幾十年，但他們的野心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辣，近年來滿洲又被她佔領了，整個大陸也許都免不了同樣的命運。這不是個人的問題，是整個民族的問題。我父親這種作風確是忘祖了。他不該站在日本人那邊去，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協力把日本人趕出去，這樣才能開拓我們的命運！（註二三）

與蕭乞食所說：

幾十年來受了日本人的氣，如果真的能夠把日本人趕出去，那才是多麼慶幸的事啊！（註二四）

這些都不是日文原稿中的詞句。至於後來與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相關的各種描寫（註二五），以及青年們研讀「三民主義」、「中國革命史」的部分（註二六），也都是中文版時才予以增加的情節。

因為這些文字的加入，〈模範村〉由日文原稿中的階級意識，轉換為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識。這是改變最多的一篇，不僅影響到讀者對於楊達精神風貌的了解，其思想演變的軌跡也因而模糊不清。

以上六篇，〈泥娃娃〉、〈鵝媽媽出嫁〉，與〈萌芽〉的中譯，都是出自楊達之手。相信其他篇目譯者對於內容的增刪，也是由楊達授意而來。對於中文版作品改寫一事，楊達生前有過一番解釋：他說：

1. 在未死之前，我有權修改自己的作品，因為我的思想一直在成長。
2. 爲了發表，如果當時說得較激烈些，根本無發表的機會。
3. 爲了使現代的讀者更加了解我作品中的精神，所以有必要修改。（註二七）

從楊達遺物中可以發現，他經常在期刊上塗改自己發表過的作品，足見他確實有不斷修改自己創

作的習慣。其實，在異族淫威之下，小說創作「爲了避開嚴密的檢查制度，曾經費了一番慘澹的苦心」，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類似〈鵝媽媽出嫁〉中，林文欽事件與全文脈絡無法對照呼應的情形，也就難以避免。但是在這些小說結尾增加一段文字，明白指出故事未來的發展，不免「矯枉過正」。小說原是貴在言外之意，以角色與情節之鋪排，自然引領讀者的思緒走向作者設計的結局。假如作者不能留給讀者一點想像的空間，很可能左右讀者欣賞的角度，因而降低閱讀時的趣味。事實上，楊達的日文作品並不會由於缺少民族思想的描寫，而稍減其光輝；中文版裡一致性的寫法，反而流於口號。殖民地時代，在強權之下，有話不能明講，還得迂迴曲折才能表達創作的意圖，這是被欺侮者共同的悲哀。楊達作品的價值所在，正因爲他能以冷靜的筆觸，秉持著知識份子的良知，揭發殖民政權的不公不義，向統治者的權威挑戰，因而突顯出特殊的時代背景，具有高度的歷史意義與文學價值。

## 第二節 反壓迫的主題意識

楊達的小說一向以反壓迫、反殖民的精神而著稱。早期的楊達由於在東京留學期間，接受馬克斯主義的洗禮，返臺後無論社會運動或文學創作，都有堅實的思想架構爲基礎，因此作品中具有極濃烈的社會意識，這是他和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家最大的差別。

〈送報俠〉分別以日本本土的資本家對勞工的欺榨，與殖民政府加諸於臺灣農民的掠奪爲兩



條主線，展開全篇的故事，歸結以勞動群眾罷工行動的勝利為契機，暗示臺灣被壓迫者光明的未來。從結局中主角帶著在日本獲得的經驗，以無比的信心踏上歸途，我們彷彿看到了楊達投入農民組合時，瘦削而堅毅的身影。〈送報伙〉能超越狹隘的鄉土觀念和民族意識，為謀求被壓迫群眾的解放，提倡超乎種族的階級團結。楊達隨之而來的幾篇創作，大體不脫這種階級意識的窠臼，卻鮮有能超出〈送報伙〉的成就者。

〈難產〉也是第一人稱的小說，主角以一個作家的身分，一方面描述自己創作「收穫」的過程，一方面又以自己生活的困頓為重心，在現實與虛構之間，交織成一首感人的悲歌。但是通篇黯淡愁苦的氣氛直逼而來，望不見一絲絲光亮的遠景，讀者不免要陷入陰鬱的情緒之中。這篇小說後來由於作者的健康問題而無法完成（註二八）。楊達另有一篇未發表的遺稿「收穫」（收穫）即是舖陳〈難產〉中「收穫」的故事而來。在結尾，楊達原擬刪去的一段文字中暗示：篇旨在於說明對抗資本家必須勞工們團結一致，才有可能獲致成功，絕不容許任何人置身事外。同時，勞農階級也必須站在同一個陣線上，互相扶持。否則職業的轉換，只是在不同的領域內，遭受不同形式的壓迫罷了！另外，〈頑童伐鬼記〉以一群小孩智取工廠老闆，終於奪回失去的樂園，象徵階級鬥爭的最後勝利。

到了〈死〉這篇小說時，勞工問題已經完全摒除在外，全文重心集中於農民問題。主角寬意由於眼見兩名佃農，因為欠繳佃租被地主活活逼死，決心往東京求學，期望學成榮歸故鄉，來拯救陷於水深火熱中的貧農。在楊達的創作底稿上，受盡凌辱的農民不僅「通謀臺灣農民組合」，

計畫與地主抗爭；主角寬意更經由朋友的介紹，認識了農組的王鐵。王鐵對他要前往東京的想法提出建言，說道：

你這樣的做法恐不得達到你所想的目的。救窮農斷然不是你一個人做得到的。講些失禮話，你到東京，若顧你一身顧得到就可以講是慶事。你不可想東京有黃金可掃。若是想去東京研究富人與窮人的對抗爭鬥，來應用於這庄，那是極有意義的事。窮人的救濟是要使窮人們本身的自覺，使他們理解團結的力量，引導他們與富者鬥爭纔有效果可見的。（註二

九）

對於寬意誤以為鬥爭就是類似噍吧哞事件的武裝蠢起，王鐵也解釋說：鬥爭與之不同，而是「有臨機應變的手段及方式」，試圖解開寬意的疑慮，喚起他的決心（註三〇）。這些文字在謄寫的修改稿上完全刪除。可想而知，必然是因為其中鮮明的反抗意識，而無法出現在大眾面前。然而它們卻是作者在農民組合裡最深刻的體驗，可以說是楊達社會運動舞台的再開拓。

一九三六年，楊達創作〈田園小景——寫自素描冊〉（田園小景——スケッチ・ブックより），由於後半部被查禁，而無法全文刊出（註三一）。次年，楊達在東京近郊鶴見溫泉以之為骨幹，擴充成爲〈模範村〉。這部小說幽默、諷刺的風格，深刻引人，是楊達最後一篇充滿階級意識的創作。由於當年日本本土展開對於左翼文學的大彈壓，這篇文章因而遭到退稿的命運。直到

光復後，才得到發表的機會。但是全篇強烈的民族意識已非本來面目。

小說中原本畏縮懦弱的陳文治，從留學東京的阮新民處獲贈一箱書籍。包括有《新聞的讀法》、《農村更生策》、《農民組合的理論與實際》……等。都是政治、經濟、社會之類的書。陳文治一本本地翻著。

忽然，出現一疊日本農民組合的機關報，叫《土地與自由》。「這是什麼？」陳文治一張張翻時，心裡想著。當翻到「××農民對於收回土地的鬥爭」時，他的眼光被吸引住。仔細地閱讀之後，非常感動。就用臺灣話向大家說明一遍。

「××是什麼地方啊？」添進向他詢問。

「日本吧！」陳文治回答後，又繼續讀了下去——

「這是真的事嗎？」又有一個人問他。

陳文治也沒有辦法很有自信地回答他。

「報紙上寫有，這件事應該就是真的吧！」

他只是含糊其詞地回答著，把先前的再讀了一遍，又說給大家聽。

從來沒有讀過報紙的他們，拼命想從這些舊新聞中了解世間的種種。（註三二）

從日本農民的經驗中，陳文治得到啓發，終於使自己的階級意識醒覺，成爲一個滿懷理想的知識

青年。這是楊達最後一篇提倡階級鬥爭的小說。(註三三)

從〈送報伙〉到〈模範村〉，作者鼓勵的都不是暴力血腥。和平理性、不做無謂的犧牲，才是合乎他的理念。然而文章都是以主角投入階級運動的方式結尾，流於教條八股，容易使讀者感到不耐。

中日戰爭全面展開之後，由於客觀情勢的改變，楊達作品中不再出現階級鬥爭的思想。戰爭期中，日本政府驅策知名的作家為其侵略戰爭做宣傳，楊達也不能倖免。創作了多種篇幅短小、以戰爭為主題的小說。〈鴉片戰爭畫冊〉（阿片戰爭の繪本）以鴉片戰爭中，英國欺凌中國的歷史為主題，歸結以「消除這個殘暴的世界」（註三四）；〈騎馬戰〉以學童騎馬打仗的遊戲，說明鞏固後方基地的重要；〈小領袖〉（チビ群長）談的是美軍空襲時，臺灣同胞在患難中相扶持的情形；而〈老鷹與油條〉（鳶と油揚）、〈瞧！拉巴爾的天空〉（ラバウルの空を見よ）兩篇中軍人的志向，也不過是保衛臺灣而已（註三五）！換句話說，是自衛而非侵略，與日本踏上他國領土的行動不能等而視之。至於遺稿〈滿州豬〉（滿洲豚）中，偶遇趕豬的滿州少年擋道，即欲大開殺戒的日本兵那種跋扈囂張的氣焰，才是作者真正要揭發的內幕。

〈增產的背後——老丑角的故事〉對於他當時的創作心態語含玄機。楊達寫自己參觀礦坑，巧遇以前的傭工老張時，其人提起：

「這裡，也有人在看您召集人的小說呢。前些日子我在坑內的休息處歇歇手，偶然聽到

有人提到您的名字，小心聽聽，這才聽出是在談您的新作品，我就老實不客氣地聽下去了。」

「怎麼樣？」

「後來的地方不太有趣。好像是捏造的。」

「小說嘛，本來就是捏造的，但是被看穿是捏造的，那就不行啦。」（註三六）

「後來的地方不太有趣，好像是捏造的。」為全文結尾稱誦日本精神的說法（註三七），埋下伏筆。連帶對其他作品的創作背景，做了一番巧妙的辯解（註三八）。因此像〈泥娃娃〉中父子兩人對於強者不應欺侮弱小的討論，或是〈鵝媽媽出嫁〉中對於「共存共榮」的隱含諷刺，都是公然和日本政府唱反調。其中有些迎合國策的姿態，不過是為作品塗上偽裝的迷彩（註三九）。讀者不必因為作者偶而一、兩句違心之論，而大作翻案文章。

此外，由〈無醫村〉中醫學資源的缺乏，〈甘藷的饗宴〉（お薩の嚮宴）和〈犬猴鄰居〉兩篇，直言批判戰時民生用品配給制實施的不能公平合理，可以看出，楊逵仍然秉持著他人道主義者的立場，對於社會民生的關懷如昔。在戰時非常體制下，還能勇於揭發社會的黑暗面，楊逵隱藏的反抗意識值得尊敬。

光復後，楊逵又以〈壓不扁的玫瑰花〉中，水泥塊間抽出的小花苞，象徵在日本軍閥鐵蹄下臺灣民衆的心，即使飽受摧殘，猶能堅強地挺立於逆境之中，依然閃耀著鮮明的反抗精神。

當然，「反抗」並不是楊逵最重要的主題，而是在反抗之後，對於重建臺灣社會的殷切期盼

。從小說人物的安排來看，知識份子主導著情節的發展。在經歷一番社會現實的歷練之後，這些知識份子終於覺醒，而產生行動的決心，肩負群眾的苦難向前邁進，帶領群眾爭取權益（註四〇），最後指向一個沒有傾軋的新樂園。這不但是楊逵在創作時極力描繪的光明遠景，也是他努力畢生追求的目標。

### 第三節 濃厚的寫實主義色彩

楊逵的小說中，有五篇「報導文學」的創作，即〈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增產的背後——老丑角的故事〉、〈小鬼的升學考試〉臺灣風景（一）（チビの入學試験・台灣風景——その一）（註四一）、〈行商人〉（註四二），以及未發表的遺稿〈公學校——臺灣風景（一）〉（註四三）。標明「臺灣風景」的兩篇創作，目的在向日本本土介紹臺灣地區教育制度的不健全。〈公學校〉原稿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字樣，以及註明普羅文學的思想背景，大概是它沒機會發表的原因。〈行商人〉是楊逵創作中，唯一以警察為主角的第一人稱的作品，內容敘述失去田產的農村子弟，只好移居城鎮以流動攤販為生。

除了以上這些篇章之外，其他作品也都具有和「報導文學」一般寫實的特質。對於小說集《鵝媽媽出嫁》（註四四）中故事取材的方向，楊逵說：

每一篇都是日據時代到處經常可以聽見看見的事，除了〈種地瓜〉和〈模範村〉以外，其餘大多是我親自經歷過的。（註四五）

〈送報伙〉被報紙分銷所老闆騙取保證金，〈鵝媽媽出嫁〉中強索「回扣」的事件，也是他自己的生活體驗。楊達並且深入解析這兩篇的創作背景：

因為當時各級公務人員多貪污腐敗，經常要素「紅包」，我想到用鵝來代替，算是一種創新。至於〈送報伙〉中的一段提到父親被逼死，母親懸樑，也是虛構的，但是當時糖廠的強迫收買土地，致許多人被逼死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註四六）

類似糖廠強購土地，致使百姓無以為生的情節，經常出現在楊達的小說裡。除了〈送報伙〉之外，〈難產〉與〈收穫〉中的農奴，付出勞力卻領不到半點酬勞；〈剝柴团仔〉的農家子弟迫於無奈，輟學上山撿拾柴薪為生；〈水牛〉中為籌措田租，將親生女兒賣與地主為婢的悲慘故事。乃至於〈貧農〉（水のみ百姓）（註四七）、〈死〉……等，都是圍繞著土地問題打轉。故事中的農民都具有中國農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樂天知命的傳統典型。樸實、忠厚的外表下，內心深藏的，不過是守住自己田園這個小小的心願（註四八）。〈不笑的小孩〉（笑はない小僧）中，愁眉深鎖的孩子，在獲知有地主願意出租一塊田地予家人耕種時，終於展開了燦爛的笑靨。原來

能夠擁有一小片耕作的土地，即使是租借而來，也是農家最大的滿足與幸福。對於農人來說，腳踏實地、勤於耕稼，才是現實的要務。〈插秧競賽〉（田植競爭）中兩個膚淺的知識份子，向著專心增產的農夫們，以無比敬佩的口氣高聲稱讚「皇民諸君」，不過是無關痛癢的虛詞罷了！這兩位仁兄既然將泥土視同穢物，避之唯恐不及，又如何能體會農民在現實生活中的悲愁或歡樂呢？

農家的生活如此，工人呢？或者像〈蕃仔雞〉的明達呈現半失業狀態，或者像〈收穫〉中毫無理由地被解雇，原來安定的生活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變故，也是朝不保夕。在蕭條的景氣之中，臺灣人除了資本家與地主的剝削之外，更要承受來自殖民帝國的壓榨。戰爭時期，男女老幼人人勒緊褲帶，在掙扎於窮困之時，卻連一點點微薄的資產也要外移，以供取日本到亞洲各地做更多的掠奪，來滿足貪得無厭的日本軍閥。加上配給制度實施的不公平，百姓的生活疲弊至極！〈犬猴鄰居〉、〈甘藷的饗宴〉，和〈一個山地青年之死〉（ポイモ之死）暴露的，就是少數敗類罔顧民生，置百姓處於飢餓狀態的內幕。至於〈種地瓜〉中父親被徵調到南洋當軍屬，反映的也是志願軍背面，殖民地兒女的辛酸血淚。

從〈鵝媽媽出嫁〉的被迫獻出貞操，和〈蕃仔雞〉、〈初當新聞記者〉（新聞記者一年生）、〈毒〉（註四九）、〈萌芽〉，與〈水牛〉中眾多婦女受辱的情節來看。與其說這是封建制度中傳統婦女的悲哀，毋寧說是階級壓迫中，弱勢團體與殖民地種族的象徵。在身心被蹂躪、人格尊嚴遭到踐踏之餘，惡夢似乎永無休止的一天。〈蕃仔雞〉裡飽受日本老闖凌辱的臺灣籍女性，選擇懸樑做為解脫的途徑。相對於勇敢反抗的知識份子，一般民衆就是以自殺做唯一的出路。但無



論導致死亡的原因是什麼？從〈送報伙〉、〈靈籤〉、〈死〉、〈無醫村〉，到〈剝柴囤仔〉、〈一個山地青年之死〉……所有故事中的死亡，都只是更深一層地暴露這個人間煉獄的殘酷無情，置他們的親人於更窮苦、更難堪的境地。當類似的場面出現時，〈剝柴囤仔〉還控訴農村醫療設施的不足。〈無醫村〉也進一步慨歎醫德的淪喪。以救助病人為天職的醫師對著屍首，尚且可以簽發死亡證明書，而〈新神符〉（新しい神符）裡因拖欠保險金，導致已繳的費用被悉數沒收的老人來說，預備的棺材本也泡了湯。將來身後的淒涼與無奈，就算能救人治病的醫生也束手無策了！臺灣人的境遇真是生死兩難嗎？

楊逵曾經說過，他寫〈泥娃娃〉和〈鵝媽媽出嫁〉，是針對日本軍閥的假慈悲，「剝掉牠的羊皮，表現牠這隻狼的真面目。」（註五〇）其實他所有的小說創作，都揭露了臺灣社會在殖民帝國經濟與文化雙重侵略下醜陋的現實，並且予以深刻的批判。留下來的，就不只是「日本的『製糖會社』在統治臺灣期間仰賴公權力進行掠奪土地的記錄」（註五一）而已。社會各個層面的黑暗，就像一張無形的巨網，窒人的鬱悶緊逼而來，教人找不到任何縫隙可以瞥見藍天。這是血跡斑斑的史實，也是每一個殖民地兒女悲苦的宿命。

楊逵將其生活經歷形諸筆下，篇篇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日本女作家坂口禱子就認為：在〈歸農之日〉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運動挫敗時，帶著妻小四處流浪的楊逵；〈種地瓜〉則是遺留在家的母子努力求生的寫照。既沒有搖旗吶喊，也沒有裝模作樣的悲壯（註五二）。因為紮根於鄉土現實，篇篇都是寫實之作，透過生活中特定的某些事件，在瞬間掌握社會的脈動，縱令文筆平淡

無奇，卻像歷史般真實自然，動人心肺。這是楊達小說創作之所以能震撼人心的主要原因。

#### 第四節 敘事風格與技巧分析

楊達小說的最大特色，就是常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廖偉竣（宋澤萊）認為這是受到俄、法兩國小說的影響，楊達也同意這種說法（註五三）。而楊達不僅常以第一人稱的角度，描述自己生活中各種經歷，讓妻兒在他筆下一一登場，連「阿建」、「素絹」的名號都未曾更改，可以說是「註冊商標」，其他人的作品絕對無法與之雷同。另外，他還喜歡從醫生的角度敘述故事（註五四），一方面，可能是受到二哥楊趁（註五五）與好友賴和皆從醫的影響，對醫生有較特殊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以連醫生都束手無策，來突顯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至於在文學的運用與情節的安排上，楊達的小說，也有其獨特的風格。

##### 一、人物的塑造

楊達喜歡以環環相扣的具象事物，一步步將故事推演開來。因此小說中的人物，在心理轉折變化的描寫上，就極為缺乏。而且人物塑造呈現一致性——知識份子就是勇敢、果斷、有行動力；農民則是樸實、無知——沒有個別的差異性，成爲扁平人物，降低小說的生命力與感動性（註

五六），而爲人所詬病，這是相當可惜的一點。葉石濤就說：

楊逵過分注重小說中人物的歷史性、社會性因素之結果，往往使得小說中人物流爲類型化，有時捕捉不到人性繁複的快樂和醜惡的層面。（註五七）

然而楊逵筆下的日本人，也有溫情善良的一面。比方〈送報伙〉裡的日本勞工朋友、〈一個山地青年之死〉中的日本警官。顯見他能就事論事，塑造人物並不以民族仇恨爲考量，對於人性抱持樂觀的信念，這是值得推崇的一點。

## 二、對比的手法

安排兩個極端對比的人物或是現象，來襯托美善與醜惡兩種不同的特質，這是楊逵的拿手好戲。

例如〈模範村〉中，阮固爺與阮新民父子二人，一個充滿封建社會破敗腐朽的氣味，另一個則是思想先進的知識青年，是社會未來的希望。一個「固爺」、一個「新民」，在尖銳的對立中自然呈現不同的評價。（註五八）

又如〈無醫村〉裡描寫醫師出診，隨著病人家屬趕路——

我們這樣子走進一條胡同，再拐幾個彎，終於走進一間半傾的草屋。這完全是另外一種世界啦。前面是這麼漂亮的高樓大廈，後面竟有這麼骯髒的部落，這是我從來所未察覺到的。燈籠的微光所照出來的屋內，完全和小說上的洞窟一樣，黑沈沈、陰氣森森，地上鋪四五張木板，那上面躺著一個人。我趕緊按了他的手，脈搏已經很沈，臉色也已經變了。（註五九）

美麗的表象之後，隱藏的是骯髒悲慘的因子。〈水牛〉、〈新神符〉、〈剝柴囤仔〉也都有類似的描述：在山明水秀的風光裡，上演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原來的世外桃源竟是阿鼻地獄。

再比方〈送報伙〉中，以家鄉父老的一盤散沙，無法對抗糖業公司，對照東京的送報伙們團結一致，戰勝派報所的老闆，暗示臺灣未來的命運（註六〇），使得情節的刻畫更爲生動。

### 三、象徵的運用

透過種種意象曲折地表現作品更深一層的內涵，一方面是爲了藝術表達上的含蓄，另一方面則可以避開社會環境的重重制約（註六一），這是象徵手法的好處。

除了以泥娃娃象徵日本軍閥外，楊達的小說中，最有名的非〈春光關不住〉莫屬。篇中以水

泥塊底下的玫瑰花苞，象徵在日本殖民體制下臺灣人民的心。發現這朵花的林建文將它送給了姊姊，在她寄來的信上這麼寫著：

你寄來的那株玫瑰花，種在黃花缸上，長得很茂盛。枝頭長出了許多花苞，開滿著血紅的花。我再也不寂寞了。我正在想著，過年除夕的團圓飯，該比往年加上幾樣菜哩！（註六）

二）

以「黃花缸」與「黃花崗」諧音，因為有了七十二烈士的革命英靈為伴，林建文的姊姊再也不寂寞了！對尋常玫瑰花的感情，已經昇華到對於革命先烈的崇敬。（註六三）

之所以用玫瑰做為象徵的原因，楊達解釋道：

因為一般人普遍對玫瑰存有好感，玫瑰代表和平、代表愛，可是玫瑰本身卻也多刺，只要好好地施肥、灌溉，玫瑰會開得很漂亮，可是如果你要任意摧殘它，它也會用自身的刺來保護自己。（註六四）

可想而知，玫瑰的和平與愛，才是楊達的本意。

由於手法的隱晦與含蓄，同一個象徵也可以做許多層的解釋。戴國輝就認為：這朵玫瑰除了

抗日精神的表現外，還寓以庶民的真心與思想不會永遠被壓制住的意思。楊達對此也深表贊同（註六五）。其實，對於作品領會的程度因人而異，只要不是虛妄之論，讀者倒不妨令自己的想像馳騁。

#### 四、幽默諷刺的筆觸

楊達似乎與生俱來，就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樂觀性格，使他能在最嚴苛顛躓的環境裡苦中作樂，作品也因而帶有獨特的魅力。譬如〈泥娃娃〉中一位剛改姓富崗的校友來訪，竟是爲了向主角借錢，準備跟在日本軍隊後面發戰爭財。爲達目的，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作者以嫌惡的口吻寫道：

他就這樣一會兒跟我，一會兒跟妻喝著，把剩下的獨自幹掉，千遍、萬遍地點頭哈腰，說了一大籬筐奉承巴結的話，走了。看見他走遠了，妻以厭惡的臉色說：

「這也算是個人啊！」

「當然是人哩。這才是這年頭裡升官發財一類的大人物。」

說著，忘了孩子們已經睡熟，竟呵呵大笑起來。（註六六）

在辛辣的嘲諷裡，富崗厚顏無恥的嘴臉躍然紙上。

而運用最成功的莫過於〈模範村〉。爲了應付過於嚴厲的規定，爭取模範村的榮譽，村民們忙碌了起來。

每天，他們都忙著填水窪，把水溝塗上水門汀，路傍和庭院的草得一根根拔掉。甚至連房屋附近的鳳梨、香蕉，也都因爲有礙觀瞻而被砍掉。鄉下人用來做燃料的甘蔗葉子和稻草，也得重新疊整齊，農具以及零碎的家具，全不許放在院子裡。一切要收到人家看不見的地方。沒有辦法的，只好收到房子裡去了。……

就外面來看，都是夠整潔的了，可是，一踏入屋子裡面，卻因農具雜物一股腦兒搬了進來，沒有地方安置，變得零亂不堪了。許多農家，甚至睡覺的地方以及吃飯的地方也被這些雜亂東西佔據了。只好坐在糞桶上面吃飯，睡在犁把下面的也不乏其人。……

而老年人最痛心的，卻是一向供在廳堂的桌上，朝夕焚香叩拜的媽祖和觀音的佛像，也被當局強迫搬家，換爲日本式的神牌，和寫著「君之代」（日本國歌）的掛幅。

結果，媽祖和觀音的佛像要搬到哪裡去呢？只好委屈地藏藏在骯髒的破家具堆裡。但是，不拜菩薩他們是無法安心過日子的，因而常常把佛像從骯髒的監牢裡解放出來，悄悄的流著淚，提心吊膽的焚香禮拜。在這嚴肅的禮拜中，偶而聽見皮鞋聲音一響，便又慌忙地一手抓著佛像的脖子，一手捏熄線香，匆忙把它藏到床下草堆裡去，可憐的觀音媽祖竟毫不叫屈。

(註六七)

這段文字節引自《楊達集》。作者的挖苦與嘲弄活潑生動，張良澤的譯筆更是有畫龍點睛之妙。除此之外，楊達的小說中還有中日文並用的現象。例如在臺灣話文的創作上，出現「綴方」、「自轉車」、「切手」(註六八)之類的日文詞彙；日文作品中，偶而也使用臺灣方言(註六九)。用最口語的對白，符合故事中人物的身分，充分顯示臺灣特殊的歷史性格與地方特色。

當然，楊達的小說也有不少缺陷。舉例來說，〈剝柴囡仔〉的節奏緩慢，張力不足；〈萌芽〉流水帳式的寫法，人物的性格難以突顯(註七〇)，和另外一篇同樣用書信串連的小說〈長腳蚊〉(やぶか)，都因為缺乏衝突性，無法營造高潮的氣氛，大大降低引起共鳴的能力。

註釋：

一 〈死〉曾經連載於《臺灣新民報》，昭和十年四月二日至五月二日。依楊達創作底稿來看，本篇原名為〈貧農的變死〉，是長篇小說《立志》的第一章。其他五章標題依序是：「立志」、「苦鬥」、「慈善家的假面具」、「迷夢」，以及「曙光」。依第一章情節的發展來看，楊達有意將自己在農民組合的鬥爭經驗融入其中，可惜並未完成。

〈紅鼻子〉是日文作品，曾經全文發表。刊行時間與報紙已無從查考。筆者身邊留有一份楊達剪報資料的影印稿。剪報之前標明本篇是〈侵略者〉的第一部分，其他四部分依次是：「犧牲」、「侵略」



、「若人」、「新生」。

〈剝柴困仔〉似未曾發表。與〈死〉一樣是臺灣話文的創作。原稿最後註明，「這篇是一篇長篇的一節」。其他章節的標題則未曾寫明。

二 塚本照和作、向陽譯〈楊遠作品「新聞配達夫」(送報俠)的版本之謎〉，見《臺灣文藝》期九四，民國七四年五月，頁一六六—一八〇。

三 張恆豪著〈存其真貌——談「送報俠」譯本及延伸的問題〉，見《臺灣文藝》期一〇二，民國七五年九月，頁一三九—一四九。

四 見註二所引資料，頁一七八—一七九。

五 即「臺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⑦」之《楊遠集》，楊遠作、張恆豪編，臺北、前衛出版社，民國八十年二月初版第一刷。

六 引自《楊遠集》，頁九五。

七 《楊遠集》，頁九八。

八 以上關於中文版的引文，俱見於《楊遠集》，頁一一〇。日文版則根據發表於昭和十七年四月，第二六八號之《臺灣時報》。

九 《楊遠集》，頁一一四。

十 《臺灣時報》二六八號，頁一一九。

二 《臺灣時報》第二七四號，昭和十七年十月。

三 這些情節分別見於《楊遠集》，頁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五、一二六、一二七、一二八、一二九。

一三 在《楊遠集》，頁一二七中，增入下列這段話：

「這是大東亞戰爭的第二年，很多很多的年輕人都被日本軍閥徵去當兵、當勞務工、當醫務人員。『企業整備』整破了許多人的飯碗，必需品配給叫人束緊腰帶、衣著襤褸。除了那些依權仗勢的正在大發戰爭財之外，大家都有苦叫不出。你敢叫苦，就有『流言惑衆』甚至『間諜』之嫌。日本特務正利用其手下佈下天羅地網，因而被捕的到處都有。

砲聲、轟炸聲震天價響——在這樣的時候，他賣命寫完了這部〈共榮經濟的理念〉，還希望人類能覓到良心，恢復原始人的樸實與純真，實在是再天真也沒有的了。做一個朋友，他固然值得敬仰，但為人爲己，時代已不再容納如此書呆了。」

一四 《楊遠集》，頁一四七。

一五 〈萌芽〉原發表於《臺灣藝術》第三卷第十一號，昭和十七年十一月。本段文字引自楊遠印刷中被查扣的《萌芽》一書。

一六 《楊遠集》，頁一五三。

一七 《楊遠集》，頁一五五。

一八 吳阿文著〈論楊遠「萌芽」中的幾個問題〉，就曾經針對收信人政治犯的身分，提出以上的疑問。見《楊遠的人與作品》，頁二七。

一九 《楊遠集》，頁一五〇中：「臺灣的文藝界，最近墮落了，有許多真實地擊著日本侵略主義的提燈在露頭角。有心肝的縱然是有心肝的，他們藏手匿腳的已近靜止的事實。假如某氏在現在也出版一本被禁止的書，碰到那個保安課長時，就會說『你是有色份子，不行』的話。」這些文字不曾出現於日文

版中。

二〇 刊載於《一陽週報》第七至第九號，民國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七日。

二一 《楊遠集》，頁二一五。

二二 《一陽週報》第九號，頁二二。

二三 《楊遠集》，頁二五九。

二四 《楊遠集》，頁二六〇。

二五 《楊遠集》，頁二九三—二九四。增加的部分是：

陳文治把手上一本書翻著翻著繼續說：

「他說，本想在城裡準備當律師，為窮苦同胞爭取一點權益的。但是，砲聲在蘆溝橋響了。他說，做律師是無濟於事的……」

「蘆溝橋？蘆溝橋在什麼地方？」

「在北平附近。日本人早已佔領了整個東北，這次可能決心要把整個中國都吞下肚裡去……」

陳文治講著講著，把手裡書放下，又拿起一本書翻讀。這些年輕人既沒有讀過書，也沒有看過報紙，很多事情自然是聽不入耳的。不過，臺灣人是中國人，日本人曾經把臺灣佔領了，叫臺胞過著牛馬都不如的生活……這是大家由日常生活得來的很切實的經驗，不會不知道的。臺灣雖然被日本管了，不過，我們還有祖國存在，這是在隔海那邊……這也大家約略知道一點的。今天聽到日本想把整個中國都要吞下肚裡去，免不了要發生深切的感觸。

大家希望能夠做自己的主人，不要讓人家管，不願當人家的奴隸，這也是不教自通的道理。因此，對

於新民送的這一箱書，青年們便覺得好像一把鎖匙，它似乎可以帶他們去知道一切事物的真相似的，非常關切起來了。

二六 《楊遠集》，頁二九四。

二七 引自王麗華著《關於楊遠回憶錄筆記》，見《楊遠的文學生涯》一書，頁二八一。

二八 楊遠自述原先計劃要寫三部《難產》，分別是《新社會的難產》、《新藝術的難產》、與《新人類的難產》。但只寫到第二部為止。以後的內容集中在《收穫》完成之後，雖然得不到發表的機會，因為在勞工之間流傳而稍慰作者之心。這些計畫由於作者本身的健康問題而無法達成。見《難產》後的說明。《臺灣文藝》第二卷第四號，昭和十年四月，頁八九—九〇。

二九 因《臺灣新民報》殘缺不全，本段文字係參考修改過的稿子。經比對後發現，這份的文字與《臺灣新民報》極少出入，非楊遠的字跡。可能是由他人之手修改、繕寫後的定稿。稿紙上印有「臺灣文學社」的字樣，應是指「臺灣文藝作家協會」的機關誌《臺灣文學》。執筆者不知是否為「臺灣文藝作家協會」的王詩琅。可確定的一點是，由筆跡看來，絕非經常幫楊遠改稿的積和。

三〇 以上引用楊遠手寫的創作原稿，與前述稿件不同。

三一 原文發表於《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五號，昭和十一年六月。只刊前半段，後半段被查禁。

三二 譯自楊遠《模範村》日文底稿。

三三 楊遠另有一篇未發表的遺稿：《不景氣的醫學士》，談的也是階級鬥爭、罷工的問題，寫作時間應在《模範村》之前。

三四 見《興南新聞》，昭和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三五 〈瞧！拉巴爾的天空〉中談及「保衛臺灣的關鍵在於天空的領域」。見《臺灣新報》青年版，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又如《老鷹與油條》中，空軍的志願是獵取「破壞我們鄉土的飛機」。見《臺灣新報》青年版，昭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三六 引自鍾肇政被收錄於《楊遠集》中之譯文，頁一六七。唯「開頭的地方不太有趣」，原文「開頭」兩字是「最後の所」，此處予以更正。見《臺灣文藝》第一卷第四號，昭和十九年八月。

三七 《楊遠集》，頁二〇五云：「……總之，那種跟隨美的東西，寧願讓自己躍入危險境地，這種純粹的心情，該是美麗的日本精神之萌芽吧。」

三八 參考王曉波編《被顛倒的臺灣歷史》，頁二六—二八。

三九 葉石濤認為：在生活與強權之下，作者有時也不得不違背心願，對統治者的政策美言幾句。這是血淚斑斑的事實，並不是奴顏婢膝地認同征服者。參考其著《「抗議文學」乎？「皇民文學」乎？》，收於《臺灣文學的悲情》，頁一〇九—一一二，及頁一二五—一二七關於「皇民文學」的說法。

四〇 林載爵著《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遠與鍾理和之比較》，見《中外文學》卷二期七，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頁一〇—一一。

四一 〈小鬼的升學考試〉臺灣風景(一)發表於《土曜日》第三十二號，河原功編楊遠氏「著作目錄」，誤以為「くらぶ」雜誌，至於出版時間則無法確知。

四二 日文作品，以林泗文之名發表於《日本學藝新聞》，發表時間不能確定。本篇與〈小鬼的升學考試〉，楊遠遺物中都有剪報資料保存了下來。

四三 原作為日文，篇末作者自註寫作時間為一九二七，然以篇首提及一九三〇年發生的霧社事件看來，可

能爲一九三七之筆誤。

四 由臺北、前衛出版社，於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版。

四 引用基聰〈碩果僅存的抗日作家——楊遠〉中，楊遠的談話。《楊遠的人與作品》，頁一八二。

四 同前引資料，頁一八三。

四 以陳水性之名發表於《臺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五號，昭和十二年六月。

四 關於楊遠小說中的農民角色，參考葉石濤著〈從「送報俠」、「牛車」到「植有木瓜的街鎮」〉，見

《大學雜誌》期九十，民國六四年十月，頁六三。

四 〈初當新聞記者〉與〈毒〉都是未發表的日文遺稿。

五 楊遠《鵝媽媽出嫁》之「後記」，引自《中外文學》卷二期八，民國六三年元月，頁四九。

五 引自塚本照和作、林景淵譯〈「送報俠」書中的日本和日本人〉。

五 見坂口禊子著〈楊遠與葉陶〉，《楊遠的文學生涯》，頁二二三—二二四。

五 見廖偉竣著〈不朽的老兵〉，《楊遠的人與作品》，頁一八七—一八八。

五 楊遠以醫生的第一人稱創作小說的有〈無醫村〉、〈毒〉、〈新神符〉、〈不景氣的醫學士〉四篇。

五 楊趁與楊遠間有極親密的感情，曾經於楊遠少年時期提供他文學讀物，又賣掉自己心愛的小提琴當做

楊遠赴日的旅費。爲學醫而入贅妻家，因婚姻破碎而自殺。事見〈楊遠回憶錄〉，收於《楊遠的文學

生涯》，頁一四七—一四八。

五 參考呂昱著〈永昭人間的文學魂——獻給楊遠先生〉，見《文訊》月刊，期十七，民國七四年四月，

頁二六四。

- 五 引自葉石濤著〈論張文環的「在地上爬的人」〉，見其著《臺灣鄉土作家論集》，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年二月再版，頁一一〇。
- 六 參考古繼堂著《臺灣小說發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八年七月初版，頁九一。
- 七 引自李炳崑〈無醫村〉之譯文，《楊遠集》，頁九〇。
- 八 王氏琴著〈送報俠——女性這樣看〉，《楊遠的人與作品》，頁一四。
- 九 見公仲、汪義生著《臺灣新文學史初編》，江西人民出版社發行，一九八九年八月，第一版第一刷，頁二五—二六。
- 十 引自《楊遠集》，頁三〇四。
- 十一 以上係參考《臺灣小說發展史》，頁九〇。
- 十二 引自陳春美著〈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訪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遠〉，見《前進廣場》期十五，頁七。
- 十三 見〈臺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遠關於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文季》卷二期五，頁四二。
- 十四 引用楊遠本人之譯文，《楊遠集》，頁一〇五。
- 十五 節引自《楊遠集》，頁二八六—二八八。這段文字與〈模範村〉原稿意義相同，唯文字較為精簡。大概是譯自另一份由楊遠自行修改後的定稿（筆者手邊資料殘缺不全）。譯文中有一段「因為日本人不肯讓它們拋頭露面的」為底稿所無，在此刪去。
- 十六 「綴方」即「作文」之意，「自轉車」為「腳踏車」。以上兩個詞語皆出現於〈剝柴囤仔〉之中。又

「切手」即「郵票」，出現於〈死〉中。

究如〈水牛〉中的「去造道」，在其旁標明假名讀法，爲「キーツオロ」，見《臺灣新文學》，昭和十一年新年號，頁一六。又〈泥娃娃〉的「パパアヒヤパー」表示「爸爸、阿兄、罵」，見《臺灣時報》第三六八號，頁一一五。

七〇 吳阿文著〈論楊遠「萌芽」中的幾個問題〉，就對〈萌芽〉這種以書信串連成爲故事的寫法多所批評。《楊遠的人與作品》，頁二五。



## 第六章 楊逵的戲劇作品

明治維新以後，受到西歐戲劇的影響，日本在傳統的戲劇之外，發展出以穿著現代人的服飾，及口語為臺詞的新劇（註一）。一九二三年，日本人將之傳入臺灣，為臺灣新劇之濫觴（註二）。從此，劇團如雨後春筍四處林立。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後，也曾經提倡改革臺灣戲劇，開拓文化運動的新境界。後來，各地文協會員排演以宣傳諷刺為中心的「文化戲」，抨擊社會制度，激發民族意識。由於以臺語講白的業餘演劇是一種嶄新的嘗試，頗能引起民衆的好奇心而蔚為風氣（註三）。對於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有相當大的幫助。

七七事變之後，日本當局禁絕排演帶有中國色彩的戲曲。為求深入民間工作，消除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復起用日本人經營的臺語話劇團「南進座」與「高砂劇團」，並將之改組成「皇民奉公會指定演劇挺身隊」。一九四二年元月，又設置「臺灣演劇協會」，做為皇民奉公會的外圍團體，負責管理演藝的相關事務，以及演劇挺身隊的營運。全面動員臺灣的人力、物力，宣傳軍國主義的思想，遂行其奴化教育。（註四）

一九四四年，楊逵與朋友組織的「臺中藝能奉公會」，上演《怒吼吧！中國》。以「皇民劇」的方式，反刺日本當局一劍。當臺上痛斥英美列強的侵略中國時，臺下則暗咒日本的軍國主義

，高聲叫好。這個空前的勝利，給予楊逵極大的信心，並且充分體認到演劇訴諸人心的直接與迅速。在臺灣的戲劇史上，無疑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

## 第一節 作品介紹

東京留學時期，楊逵曾經參加佐佐木孝丸家的「前衛演劇研究會」，並從著名的劇作家千田是也處，接受演劇的基本訓練。劇團演出時，擔任舞臺佈景和後臺的工作之外，也跑跑龍套，演些無關緊要的小角色（註五）。因而熟知劇本的扮演，和舞臺前後的事務，奠定戲曲創作的基礎。

日據時期楊逵發表的戲劇，只有〈豬哥仔伯〉（知哥仔伯）、〈父與子〉，與〈撲滅天狗熱〉三篇創作，以及改編自俄國的《怒吼吧！中國》（吼える！支那）。而綠島時期，共完成了十三種中文劇作，包括舞臺劇、街頭劇，和電影分場劇本等，為其戲劇創作生涯的巔峰。以下引用焦桐編排的「楊逵劇作表」（註六），做為說明。

楊逵劇作表

劇名	類別	寫作年代	發表	出版	備註

赤炭拓荒	漁家樂	國姓爺	駁犁歌舞	怒吼吧！中國（日文）	撲滅天狗熱（日文）	父與子（日文）	豬哥仔伯
電影分場劇本	街頭劇	街頭劇	街頭劇	四幕話劇	二幕話劇	三幕話劇	獨幕喜劇
年 一九五五	年 一九五五	年 一九五四	年 一九五四				
					一九四三年一月《臺灣公論》月刊	一九四二年刊於《臺灣藝術》雜誌一月號 三月號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月刊於《臺灣新文學》一卷八期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台北、盛興出版部			
	底稿無存	五月，為總統就職紀念而作，底稿無存。本劇焦桐製表時遺漏，筆者補入	底稿無存	特洛查可夫原作，一九四四年年底在台中中座、台北榮座和彰化公演			原為日文，後由林曙光譯為中文

差不多先生 (日文)	豬八戒做和尚	牛犁分家	豐年	真是好辦法	睜眼的瞎子	光復進行曲	樂天派	勝利進行曲
獨幕喜劇	四幕喜劇	四幕歌舞劇	獨幕喜劇	獨幕喜劇	獨幕喜劇	街頭劇	相聲	街頭劇
年 一九五九	年 一九五八	年 一九五八	年 一九五六	年 一九五六	年 一九五六	年 一九五六	年 一九五六	年 一九五五
		一九八一年六月東吳 大學校刊七五期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 六、二十七日刊於《 民衆日報》十八版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 日刊於《自立晚報》 〔本土副刊〕
島監獄演出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綠 島監獄演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 綠島監獄演出，後來 高雄大榮高工曾在高 雄、台中野台演出					本劇焦桐製表時遺漏 ，筆者補入	爲「九三」軍人節而 作

婆心

獨幕喜劇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刊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焦桐製表時，曾經參照一份楊達手寫的劇作登記表（註七），表上列出一九五六年以前，由楊達創作的戲劇名稱及寫作時間。然焦桐編排上述表格時，遺漏一九五四年五月，為總統就職紀念而作的〈國姓爺〉一齣，以及作於一九五六年的〈樂天派〉。此處予以補入。而〈豬八戒做和尚〉下「備註」欄云：「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綠島監獄演出」；河原功編楊達「簡略年譜」，一九六〇年一則，卻載明該劇被禁演。兩種說法相異（註八），不知孰是孰非，暫且存疑。

除了上述各篇之外，楊達尚有一篇〈都是一樣的啣！〉（御同様なんてすよ）。原稿寫於標明「首陽農園」的稿紙上，可以確定是首陽農園時期的作品。河原功編楊達氏「著作目錄」並未收錄在內，大概是未曾發表的遺稿。內容大要如下：

市會議員呂沒卓因應酬頻繁，而招致妻子楊其女的不滿。滿腹委屈的其女經常歇斯底里地指責先生，埋怨自己的生活連農婦都不如，並表示羨慕沒卓的親戚呂啓文夫妻之意。呂啓文是某文藝雜誌的編輯，為此，呂沒卓答覆說：自己願意遠離身邊的酒肉朋友，繼續從前在臺灣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但因外界傳聞自己懼內，希望太太能給他一點時間，慢慢改變。

一天，呂沒卓的兩個酒肉朋友又來了，其女負氣躲入房間。適巧啓文來訪，神情有異。當呂沒卓問及近來文章寫得如何時，他也只是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不久就起身告辭了！沒卓的朋友

走後，啓文的妻子彩雲登門尋找丈夫，並表示家中缺錢，啓文原先是來借貸買米的，兩個小孩仍在學校等她送飯吃！呂沒卓頓時明白啓文來訪的目的，連忙吩咐太太將早晨的剩飯交給彩雲，做成飯糰，送到學校去給孩子們。

彩雲離開以後，呂沒卓感慨地對太太說：像她這樣，因時局緊張，成天就知道囤積糧食，只要聽說哪裡還有得賣，立刻差遣佣人趕往採買，忙得茶飯不思。而她羨慕的啓文爲了借錢，從早到晚奔波勞累，恐怕連飯也忘了吃，都是一樣的！太太聞言，反唇相譏，表示沒卓和朋友一起談些荒唐的事，也會忘了吃飯，情形還不都是一樣！沒卓急忙辯解：以後不會再有這種事發生了！自己即將著手進行臺灣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其女反而回答：「都是一樣的！我想你要寫的書，也不會有寫成的一天！」

## 第二節 寫實與理想主義並見

就戲劇的內容來看，楊遠的日文作品重在社會寫實，中文作品則以臺灣抵禦外侮的史實爲中心，與小說前、後期的風格分別吻合，在時間的橫斷面上呈現一致性。

日文劇作中，〈豬哥仔伯〉和〈父與子〉兩篇主題近似。都是描寫遭到遺棄的一對母子（女），在貧病交迫的邊緣掙扎的故事。〈豬哥仔伯〉的花子在生活壓力之下，不得已走向墮落之路，首次陪酒的拓殖會社社長竟是自己的親生父親。從強烈的貧富對比，揭發人性醜陋的一面，流

露出傷感的情懷。〈父與子〉的不纏遭陳不治玩弄後，不幸染上梅毒，並在孕期內傳給兒子私生。一日，不纏母子來到陳家，原只是爲了要些錢治病，豈料陳不治非但避不見面，還派下人將他們攆走。不纏死後，私生滿懷激憤，縱火燒毀陳家。全劇最後在陳家豪華的新宅落成，大宴賓客的熱鬧中落幕。作者安排了幾位記者批判陳不治的冷酷無情，對於天理的隱晦不彰，似乎也有著幾許的無奈。

〈撲滅天狗熱〉以天狗熱（惡性瘧疾）影射專放高利貸的李天狗，表面上是順應國策，消除當時猖獗於農村的流行病，其實談的是打倒吸血鬼李天狗，這個人也是皇民化運動的擁護者。日本學者尾崎秀樹特別推崇楊達在這齣戲中表現的反抗精神。他說：

〈撲滅天狗熱〉這齣戲的內容，實際上是貫穿著一種嚴肅的臺灣人民階級的眼光。在臺灣作家紛紛爲「皇民化」問題苦惱的反面上，也存在過像楊達這樣的作家。他的批判不但是指著農村的高利貸，也朝向日本的統治。以撰寫「島民劇」之手，反砍統治政權。這就是楊達深受屈折後的抵抗。（註九）

以一個反對者的立場，折服統治者陣營內的學者，這是楊達文學的成功之處。

遺稿〈都是一樣的啞！〉一如前面三篇作品，在辛辣的諷刺裡，傾洩一腔悲天憫人的胸懷。戰時體制下物資匱乏，呂沒卓出賣自己知識份子的良心，耽於物慾的享樂之中；其妻在物質的追

尋之外，因精神生活的困乏而煩躁不安；呂啓文堅守文藝工作的崗位，卻面臨了沈重的生活壓力。表面上，三個人的沒有吃飯是一樣的，然而呂啓文的「沒飯吃」，與呂沒卓夫婦汲汲營營於物質享受而忘了吃飯，代表的實質意義絕不相同。從呂啓文簞瓢簞空的窘境中，我們彷彿也看到楊逵在文藝路途上踽踽獨行的背影。

五〇年代，反共抗俄劇主宰整個臺灣的劇團，形成一股政治宣傳的文藝風尚（註十）。被禁錮於綠島中的楊逵，自然無法置身於這股強勢的浪潮之外。〈赤坎拓荒〉以電影劇本的方式，表現臺灣先民們反抗荷蘭人的歷史；〈勝利進行曲〉敘述國軍英勇抗日的故事，兼及臺灣青年被日本人強徵為軍伕，在祖國作戰，面對同胞時矛盾的心情。由其處處照顧同胞的行為中，體現臺灣人民對於祖國的孺慕之情；〈光復進行曲〉則是以鄭成功驅逐荷蘭人的過往，影射臺灣從日本的桎梏中解放的史實。相對於當時流行的反共抗俄劇，楊逵的劇作也不能免俗地，在最後來個大轉折，安排「惡人伏誅、好人得勝」的結局，引來「八股」之譏。但是深入考察之後，可以發現楊逵在劇情背後隱藏的言外之意（註一一）。因此對於時下許多知識份子的迷失與沈淪，他不禁要感慨萬千。（註一二）

例如〈牛犁分家〉，同樣是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史實為主題，全篇卻以日本人的欺壓與內鬩兩段情節，使得牛與犁的分家，象徵臺灣和大陸在隔絕五十年後，彼此間的誤會與猜忌。因外患而導致牛、犁的分道揚鑣，尚且可以用人代牛拖起犁來耕田，倘若同胞兄弟之間不能和合，那麼任何器物也不能取而代之。這是楊逵繫獄十二年內心最深刻的感懷。對於國家民族的未來，他



是以無比熱烈的心在殷切期盼著，充分展現社會改革運動家理想主義的色彩。

再提到前述的〈赤崁拓荒〉一齣。本劇由對岸的大陸難民前仆後繼渡海來臺，呈現臺海兩岸之對比。對白中也屢屢呈現反共文藝一貫的意識型態。比方王克旺所說：「每次我們這樣團圓吃飯的時候，我就會想起那邊（按：指海那邊的大陸）患難同胞的慘狀。」（註一三）爲了逃避土皇帝而漂流過來的林開發置身尋常的臺灣農家不時讚歎：「世間怎麼會有這樣好的地方？……這麼好！好像在做夢的！」（註一四）「我不敢相信有這樣的地方！」（註一五）「真怪！我不敢信這是實在的……」（註一六）將一個人口稀少、男耕獵女織布、清靜自由的「小康」社會視爲人間天堂，作者是藉著劇中人物來呈現自己對於世外桃源的夢想。當荷蘭軍艦來犯時，當地居民與渡海來臺的難民之間協力合作，表現同舟共濟的精神，和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正是楊逵對於這塊島嶼上所有住民的迫切期望。只有內部的和諧，才能對抗外界突如其來的橫逆，也才能享有安和樂利的明天。

與前面兩篇相較，〈豬八戒做和尚〉更進一步勾勒出作者心目中理想社會的藍圖。當三藏與悟空、八戒一行人來到桃花源時，舞臺上燈光盡滅，在孔子紀念歌的伴奏下，舞臺上打出幻燈片，用來詮釋禮運大同篇的主旨。

(1)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運動大會）

(2)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群眾大會選舉長老）

- (3) 故人不獨親其親（養老院許多孩子們為老人服務）
- (4) 不獨子其子（養育院寡婦照顧許多孩子）
- (5) 使老有所終（老人清閒遊玩、散步、讀書）
- (6) 壯有所用（壯人做水壩、耕地）
- (7) 幼有所長（幼年學校教育情形）
- (8)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療養院廢疾者互相照顧，快樂生活的情形）
- (9) 男有分，女有歸（集體結婚典禮）
- (10)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稻穀、果實、東西等，捐獻大會）
- (11) 力惡其不出於其身也，不必為己（修道築路植樹獻工）
- (12)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法院閉門無事做，法官們有的種花、種樹、讀書）
- (13) 故門而不閉，是謂大同（門戶開放，群集在外面歌舞）（註一七）

在批判貪污腐敗的官僚體系，與盜賊橫行的社會之後，楊逵提出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國度（註一八）。這個社會的規劃，可以說是楊逵一生社會主義理念的實踐。原本頑劣不堪的悟空與八戒深受感化之外，欲往西方取經的三藏至此，也不禁要讚歎它的偉大，頓悟當地長老所言：「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覺菩提，猶如求兔角。」（註一九）因為真正的大同世界，正是建構在現實的

基礎上，有心之士何必遠求！

所以，楊達的劇作絕非浮面的政治宣傳。中文作品在順應潮流的姿態之外，還寄寓作者畢生的理想主義。如何就臺灣現有的基礎上，籌畫更爲美好的前景，摒除狹隘的地域主義，捐棄以往的成見，誠心誠意地攜手合作，才是楊達戲劇作品帶給我們最大的啓示！

### 第三節 民歌民舞的運用

楊達的中文戲劇中，有五齣街頭劇，即〈駛犁歌舞〉、〈國姓爺〉、〈漁家樂〉、〈勝利進行曲〉和〈光復進行曲〉。事實上，除了〈赤崁拓荒〉是電影分場劇本之外，所有的作品都可以作爲街頭演出之用。從楊達的相關論述看來，在戲劇的各種形式當中，他確實特別鍾愛街頭劇。其中緣故，就是

因爲它是在觀衆圍擁著的廣場上表演，而且演員由觀衆中間出入，很容易把演員與觀衆打成一片，最容易把劇情傳達到觀衆的心底，把劇的效果發揮出來。（註二〇）

而且，街頭劇的體制短小，

可以在短短時間裡給觀衆一個藝術的享受，而把他們的感情統一成一個堅強的堡壘。

聽說，抗日戰爭中街頭劇在大陸上盛極一時，對於抗戰工作貢獻很大，這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因為抗暴民族運動必須結合民衆的力量——在這一點，它可當爲有力武器，是毫無疑問的。（註二一）

由於演出形式簡單，效果易於掌握，可以用來教育人民、團結群衆，成爲反侵略的有力武器，楊達認爲應該把它發揚光大。（註二二）

關於街頭劇的本質，他說：街頭劇是「以新時代的精神，把民歌、民舞、民間故事熔在一爐的民間綜合藝術。」（註二三）楊達來自民間，和低下階層民衆間，一直有著極爲廣泛的接觸，本身就具有非常濃厚的草根氣息。除了曾經著手收集記錄諺語、童謠之外，凡是民間文藝，他都有份特殊的感情。在〈春天歌頌〉一文中，他就專門論述民間藝術的重要性：

爲什麼，民間藝術——民歌民舞能夠這樣根深蒂固的被保存著，而且被民衆所喜愛呢？簡單一句話可以說，就是因爲它已經成爲民衆生活的一部分；它與吃飯、工作、戰鬥生活是分不開的了。

大家都可以回憶到的，在我們童年時，不是每遇有空就要找爺爺婆婆給我們講些什麼故事，或者請他們唸些民謠給我們聽嗎？我們不是經常聽到在田裡工作的農夫、山上砍柴的樵

夫、上船捕魚的漁夫、甚至上陣作戰的兵士們在哼些什麼民歌嗎？

民衆以他們的智慧共同創造它，也由它得到共同的安慰與鼓勵，因此，它與民衆的生活感情之間沒有空隙，它的內容與形式是民衆生活感情最自然的表露。（註二四）

因此，楊達特別喜歡在街頭演出時，以載歌載舞的方式呈現歡樂的氣氛，就「因為它是民衆生活感情很率直的表现，為發展『街頭劇』，這些民歌民舞都是很寶貴的基礎。」（註二五）在歌舞電影〈赤坎拓荒〉中，他設計了多幕歌舞的場面，也是基於它們具有很強烈的社會性，為大眾所耳熟能詳，可以直接而迅速地感染到全場的氣氛。民謠如此，通俗歌曲亦然。因此以其本來風貌出現，或者保留原來的旋律，改填適宜劇情發展的歌詞，在塑造情境方面，就不失為一種簡易而有效的方法。在楊達的中文劇本裡面，附有詞、譜的歌曲有：

一、〈赤坎拓荒〉：

有〈駛犁歌序曲〉、〈駛犁歌本曲〉、〈四季紅〉、〈豐年舞〉、〈捕魚歌〉五首。

二、〈勝利進行曲〉：

有〈透早就出門〉、〈做牛拖犁〉、〈奴隸的歌聲〉、〈思想起〉、〈看國旗風翻〉五

首。

三、〈光復進行曲〉：

有〈收工〉、〈情歌〉、〈駛犁歌本曲〉、〈春天花〉（即〈四季紅〉）、〈殺漢奸〉五首。

四、〈豐年〉：

有〈百家春〉，及兩首〈豐年舞〉。

其他作品雖不曾附有歌譜，也經常使用〈思想起〉一曲，歌詞則為楊達自己的創作。十三種中文劇本，只有〈睜眼的瞎子〉、〈婆心〉，以及〈樂天派〉之中不曾穿插歌唱。而歌唱的方式或者獨唱、合唱，或者輪唱、對唱，甚至大量運用吟唱的方式代替口白，有很強烈的音樂性。

除了營造歡樂的氣氛外，這些民謠也有用來表現悲哀的，例如〈牛犁分家〉第二幕一開始：

耕南：（一面工作一面唱）透早就出門，天色還未亮，艱苦無人問，行到田中央，行到田中央，為著顧三頓、顧三頓，不驚田水冷霜霜。

秀蘭：（一面下種一面唱）炎天赤日頭，做到過中午，揮著鈍鋤頭，汗滴汗水流，汗滴汗水流，為著趕工作，趕工作，不驚中午佬爾熱。

耕南：做到日落山，不看見田畔，大家還不散，滿身的重汗，為著保生活，保生活，不驚勞苦暝日拖。

耕南：（合唱）無論風和雨，或是火燒埔，大小都認路，做到滿身土，做到滿身土，曝

到變人脯，只驚債主討錢虎。(註二六)

原稿中不曾註明詞譜，然由其歌詞即知是〈透早就出門〉(農村曲)，用輪唱及合唱的方式，表現農民的辛勞與農村生活的刻苦。

在伴奏的樂器方面，以〈勝利進行曲〉為例，〈透早就出門〉與〈思想起〉都標明了「伴奏胡琴」(註二七)。楊達決定採用胡琴，自然是因為胡琴為中國的傳統樂器，聲音又是如此地淒美動人，最適合表現哀愁的歌曲。可見在樂器的選擇方面，也能夠兼顧氣氛的營造。

由於戲劇是一種三度空間的表演藝術，因此鑑賞戲劇，就不僅僅是對於文字藝術的批評。如何營造演出時的情境，經由演員生動自然地將作者的意志傳達給觀眾，是表演效果成敗的關鍵。楊達善於利用音樂來帶動觀眾的情緒，在這一方面，確實有其獨到之處。

#### 第四節 文學特色

做為文學形式的一種，戲劇中衝突轉折的場面，是最基本的一個元素。如何塑造人物的性格，設計各種情境，來傳達自己的思想情感給觀眾，並且得到大眾的認同，這是對劇作家文學技巧的一種試煉。從楊達的文學來看，教育性和社會意識一直是他最大的著眼點，因此意識型態的灌輸，似乎比較藝術手法的表現來得重要。但這並不是說楊達的劇作毫無文字技巧可言，而是他的

作品間有著極為近似的佈局，出場的人物類型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整體風格統一。

## 一、人物的類型

楊達小說中居於主導地位的，幾乎清一色是知識份子，但是劇作中的人物則以農民為主。大概因為小說是以文字為工具，對象限定在知識階級；而劇作要深入一般民衆，農民佔人口的大多數，自然成爲主要的角色（註二八）。這些人民勤勞樸實，安份守己。當侵略者來襲時，爲了保護家園，紛紛起義抗暴，置生死於度外，具有高貴的民族氣節。〈赤坎拓荒〉的王克旺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楊達筆下所有角色中刻畫最多的一位，不僅是村落中對抗荷蘭人入侵者的領導人，閒暇時也親自教育自己的女兒，可見楊達對於知識份子一直是寄予厚望的。

而〈豬八戒做和尚〉中的「軍師」一角，又是另外一種典型。他懦弱怕事，當豬哥精情勢危急時，爲避免受到牽累，撕下自己寫的告示，偷了銀元就跑。豬歌精得勢後，卻又像哈巴狗一般搖尾乞憐而來。豬哥精不禁破口大罵：「你讀的是什麼書？都讀在背上，還要講道德，說仁義！就是像你這樣的讀書人最不可靠！」（註二九）最後念在彼此是同胞兄弟的情分上，改派他泡茶掃地，專管接客送禮之事。這類見風轉舵、趨炎附勢的「知識份子」，不論在日據時期或戰後初期都十分地活躍，楊達深惡痛絕之至，免不了要口誅筆伐一番。（註三〇）

此外，楊達小說中婦女受辱的情節，在戲劇中也經常出現。〈豬哥仔伯〉、〈勝利進行曲〉



中，都有女子險遭凌辱的描寫：〈睜眼的瞎子〉中，採蓮遭父親逼婚；〈真是好辦法〉中，知哥嫂被秀才父親賣與小知哥爲妻。但是和小說裡的人物相異的一點是：楊達戲劇中的女人絕非弱者。〈豬哥仔伯〉中，花子的母親縱然貧病交迫，當拋棄她的丈夫託人拿錢包來時，她毅然決然地將之扔到窗外，志節令人感動。〈睜眼的瞎子〉裡，採蓮逃婚出走。原來在男性沙文主義之下，女人也勇於爲自己的將來負責。而〈婆心〉中的王太太挑起所有的糾紛，全劇也在她痛改前非之後謝幕。因此婦女在這些戲劇中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類人物，已經完全脫離小說中陪襯的地位，進而主導整個故事的進行。

## 二、角色的塑造

楊達慣於用相對的兩個階級，來塑造不同的人物類型。例如侵略者對反抗者，富商對窮人。並由此營造戲劇中的衝突點，激起高潮。人物的性格或者故事的主旨，也往往在姓名之中顯現出來。

在與主題的呼應方面，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牛犁分家〉。「大牛」和「鐵犁」兩兄弟，象徵「牛」與「犁」。牛犁原是耕作時不可或缺的，兩者必得相輔相成。一旦分家，則難以耕種，因此大牛、鐵犁兩兄弟的父親名爲「耕南」。「耕南」者，「耕難」也。

以姓名諧音影射角色個性，是戲劇中經常使用的手法。〈豬哥仔伯〉在日文版中原名〈知哥

仔伯》，以「知哥」諧音「豬哥」，表示其人為好色的登徒子。〈睜眼的瞎子〉裡逼女兒出嫁的「林醉生」，整天醉生夢死，生活沒有任何目標，是個見錢眼開的勢利鬼。〈父與子〉的不纏被陳不治拋棄後自力更生，並未和陳家糾纏不清；「陳不治」則是泯滅良知，無藥可治。而「私生」的名字也符合其私生子的身分。又如〈真是好辦法〉的「小知哥」、「天福」，名字的含義淺顯易懂，當這些人物一出場時，觀眾心裡自然已有了一番正確的評價。

### 三、情節的安排

楊逵的中文劇作並沒有特定的對象，因此亦未安排很複雜的情節，佈局也都很簡單。故事最後都指向被侮辱者的勝利，暴虐的統治者則趨向敗亡。觀眾不必具備複雜的思維，就可以輕鬆地領會全劇的意境。〈赤坎拓荒〉雖然沒有在結局時明白交待臺灣同胞對抗荷蘭人的抗爭獲得勝利，但是以全體合唱「把紅毛蕃趕走！」（註三一）暗示成功在望。尤其楊逵在後記中說明：

本篇〈赤坎拓荒〉為〈三戰赤坎城〉第一部。第二部〈重起烽火〉寫勃懷一起義前後的  
故事，第三部〈侵略者敗〉寫鄭成功攻臺把荷蘭人趕走的故事。（註三二）

因此作者確實有意設計凱旋的場面，可惜第二、三部終究未能寫完，竟成爲永遠的缺憾！

至於日文作品雖然不會在結局時安排團圓、喜劇的情境，然而經由劇中人物對於主要角色的批判，也證明了「公道自在人心」。〈豬哥仔伯〉和〈父與子〉都是運用同樣的手法，展現作者的價值觀。只是〈豬哥仔伯〉前半部，對於飲酒作樂的場面做不必要的渲染，最後由侍者報告豬哥仔伯和妻女相會的場面，使全劇高潮草草收場，是一敗筆！（註三三）

#### 四、文字風格

因為戲劇演出的對象是一般的民衆，臺詞自然以質樸無華爲尙。楊逵的臺語劇作對白簡單明瞭，除了日常用語之外，能夠視機加入適切的諺語、童謠，有濃厚的民間氣息，兼顧精鍊與生活化兩種特性，值得稱道。而〈真是好辦法〉、〈豐年〉的對話刻意押韻，前者俏皮、詼諧，後者則有相聲、抬槓的意味，兩齣形式接近，適宜改成歌仔戲做野臺演出（註三四）。顯見楊逵在喜劇方面的文字運用，已達出神入化的境地。

綜觀楊逵的全部劇作，〈牛犁分家〉以歷史劇涵蘊深刻的意義，平實動人；獨幕劇〈真是好辦法〉則以凝鍊的故事取勝，高潮迭起，引人入勝，戲劇張力足，應該算是在文學技巧的表現方面最成功的兩篇作品。

註釋：

一 劉崇稜著《日本文學概論》，頁三五。

二 耐霜云「臺灣的純新劇（話劇）運動，本係啓端於日人。民國十二年，鐵道飯店演藝場，曾公演過〈光之門〉」。張維賢參加「臺灣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時，則回憶說：「臺灣新劇真正的開端，應該歸功於日本人，他們最初的劇團是蠟人座，是由神田主持的，他們大概是演〈狗〉或是〈熊〉，這是大正十二年的事。」都是以一九二三年為臺灣新劇開始的年代。以上分別見《臺北文物》卷三期二，民國四三年八月，頁八五及頁一一。

三 《臺灣民族運動史》，頁三一七。

四 詳見呂訴上著《七七抗戰後的臺灣劇運》，發表於《臺北文物》卷三期二，頁八六—九〇。

五 見〈楊遠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遠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文季》卷一期四，頁一六。

六 引自焦桐著《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臺北、臺原出版社，民國七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一刷，頁七四—七六。

七 同前引書，頁九二。筆者手邊亦有一份楊遠手寫的劇作登記表。

八 鍾肇政首先提出該疑點，見其著《勞動者之歌——讀楊遠戲劇集》，收於楊遠著《睜眼的瞎子》，臺北、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九年三月初版，頁一一。

九 引自尾崎秀樹著《決戰下の臺灣文學》，見其著《日殖民地文學の研究》，頁一九三。

十 詳見彭瑞金著《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頁九八—九九。

二 鍾肇政也抱持這種看法，至於「言外之意」何在，鍾肇政並未說明，想必是有更深一層的政治考慮。

見《睜眼的瞎子》，頁一七。

二三 楊遠〈圍丁日記〉云：「我曾寫了〈三戰赤崁城〉，用電影劇本的方式表現了我們祖先反抗荷蘭侵略者的歷史，以及話劇〈牛犁分家〉以表現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史實，又想起了現在許多蒼白的知識人卻螞蟻都不如地過著迷失沈淪的生活……真是人不如螞蟻……」見《歷不扁的玫瑰》，頁一〇五。

一三 引自《睜眼的瞎子》，頁四〇—四一。

一四 《睜眼的瞎子》，頁四一。

一五 《睜眼的瞎子》，頁五一。

一六 《睜眼的瞎子》，頁五三。

一七 引自楊遠著《樂天派》，臺北，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九年三月初版，頁一二三—一二四。

一八 參考焦桐著《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頁一〇四。

一九 《樂天派》，頁一二二。

二〇 引自楊遠著〈談街頭劇〉，發表於《自立晚報》，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九日。

二一 同註二〇。

二二 同註二〇。另外，楊遠〈談街頭劇〉的初稿題為〈反侵略的有力武器——街頭劇〉，也可以充分說明它在楊遠心目中的地位。

二三 引自楊遠手稿〈春天歌頌〉。

二四 同註二三。

二五 同註二〇。

- 二六 引自《樂天派》，頁二九。
- 二七 分別見於《睜眼的瞎子》之頁一〇七，與頁一一四。
- 二八 同註八所引資料，《睜眼的瞎子》，頁一七—一八。
- 二九 引自《樂天派》，頁一〇〇。
- 三〇 焦桐稱這類人物為買辦型的知識份子。見其著《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頁九〇。
- 三一 《睜眼的瞎子》，頁一〇二。
- 三二 引自《睜眼的瞎子》，頁一〇三。
- 三三 參考焦桐《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頁七七。唯焦桐將侍者報告豬哥仔伯與妻女相會的場面，誤為「由酒客出場報告」。
- 三四 參考《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頁八二。

## 結論

西元一九二〇年以降，是中國新文化建設的關鍵年代——在大陸，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逐漸形成波瀾壯闊的局面；在臺灣，新文學運動正蓄勢待發，呈現出盎然的生機。隔絕已久的臺海兩岸竟不謀而合，從此時開始發展出以反帝、反封建為主題，具有前意識的左翼文學。一九三五年，楊逵因為〈送報伙〉而奠定在日本和臺灣文壇的基礎。同時，也由於胡風的介紹而揚名於大陸，成為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的個中翹楚。不僅接續賴和以來建立的抗議文學傳統，也開啓臺灣現代鄉土文學之端緒。但是他的小說能以世界性的角度凝視臺灣人民的苦難，尋求解脫之道，卻是眼光獨具。

留學東京，是楊逵一生的轉捩點。他在這裡結識許多日本重要的普羅文學家，也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薰陶，揭開一生文藝創作與社會運動之序幕。返臺後，活躍於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實際領導農民對抗殘酷的殖民統治。直到社會運動在日本當局的大力彈壓下趨於沈寂，他才重新提筆，以文學作品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向所有腐敗的、不公不義的現象宣戰。皇民化運動時期，楊逵創辦首陽農園，過著隱居的生活。終於因各方的邀稿而復出，創作了數篇表面上符合日本國策的文章。近年來，這些作品的出土，在文學界引起不小的震撼，楊逵「抗議作家」的名號連帶地

受到質疑。

其實，如果我們以一、兩句迎合統治者姿態的話大作文章，忽略創作背後的真正意圖，這不是對作者的不敬，對於作品本身來說也是不公平的。尤其在臺灣人的命運並不能由自己操縱的時刻，我們卻要以現今自由地區的一切標準，衡諸前人的環境與作為，這樣的批評是否過當呢？由楊逵的作品中我們發現，表面上配合「國策」，骨子裡卻是對於社會黑暗面的挖苦與諷刺。強烈的批判色彩下，隱藏的是反抗的意識。除了知識份子的角色之外，楊逵還深具草莽英雄的氣息，廣大工農群眾的生活才是他最關心的主題。無論他扮演的是社會運動家的角色，或是文藝工作者的角色，他都能夠落實到社會民生，為追求低階層民衆的解放而永不懈怠。同時，為了這個理想的實現，他往往急於傳達社會主義的理念，反而忽略了在文學藝術方面的表現，也因此使得他不能躋身第一流文學家之林。但是他能夠掌握社會的脈動，記錄時代的軌跡，使得他的小說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而為後代所推崇。這樣的精神歷久彌新，值得讚揚。

光復以後，楊逵因為呼籲和平而繫獄十二載。幽居綠島期間，他以源源不絕的創作力再造文學生涯的巔峰。這一期的作品，以散文與戲劇成就最高。前者多談家居瑣事，清新質樸；後者則多藉史實寄寓畢生的理想主義，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有無限的期待。風格截然不同於以往，另有一番新的氣象。

如果考察楊逵的文學活動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可以發現，似乎他在社會改革方面投注了較多的心力。例如他的作品有極為濃厚的社會意識，經常是他社會主義思想的發抒。又例如他正



式踏上漫漫的文學旅途，也是在社會運動遭受重挫之後。倘若當年社會運動還有開展的可能，他是不是會專心致力於文藝創作，不無可疑之處！而楊達創作力最旺盛的第二個時期，恰好是在綠島監獄內，應該也可以為這個觀點做再一次的驗證。

民國七十四年三月，走過一生的困乏與顛躓，楊達離開了這個他一生熱愛的土地，日據時期的新文學開拓者也隨著他的去世而凋零殆盡。楊達歷盡滄桑而悲劇性的一生，正如我們腳下所踩的這一塊土地，正受到現代中國人的漠視與歪曲。透過楊達挫折與成長的歷程，臺灣島的全體住民應該記取過去的教訓，摸索出一條屬於未來康莊的大道，建立自由民主的新樂園。這不只是楊達努力畢生的希望，也是我們身為臺灣人應有的責任！



# 附錄

本研究正文部分，有關楊達生平及其作品，係擇要敘述。茲將河原功編楊達年譜及著作目錄附之於後，俾便查考。共分三項：

附錄一：「楊達生平寫作年表」。引自前衛版《楊達集》。原文增加之紀歲部分採虛歲算法，此處參考楊達回憶錄敘述方式，以實歲易之。

附錄二：「河原功編：楊達氏『著作目錄』」。以《臺灣文藝》期九四、九五（民國七四年五、七月）及《文季》卷二期五（民國七四年六月），兩種版本參照而成。

附錄三：「續補河原功編：楊達氏『著作目錄』」。將該目錄遺漏部分，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因楊達本身兼具社會運動家與文藝工作者兩種角色，本文盡量收錄楊達發表過之一切文字，不以文學為限。

河原功為楊達相關研究之開創者，疏漏舛誤之處在所難免。附錄一、二部分，凡有修訂或增補之處，皆加按語予以說明。

## 《附錄一》

### 楊逵生平寫作年表／河原功編·楊鏡汀譯

一九〇五年 出生 十月十八日，生於臺灣舊臺南州大目降街（一九二二年改稱新化街），父楊鼻、母蘇足的三子，本名楊貴。

一九一〇年 五歲 八月，日本併吞韓國，改稱朝鮮。

一九一一年 六歲 十月，中國發生辛亥革命。

一九二二年 七歲 一月，中華民國成立。

一九一三年 八歲 十一月，羅福星事件發生。

一九一四年 九歲 姊一人、妹二人、弟一人，在數年內相繼死亡，家庭爲此極端窮困。因體弱多病，延遲進入公學校，被同學取笑，綽號叫「阿片仙」。（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一九一五年 十歲 進入大目降公學校（一九二一年改稱新化公學校。）

噍吧哖事件發生，長兄被征調當軍夫。臺南至噍吧哖的砲車隆隆，經過家門，從門縫窺伺其景，而感觸良深。

八月，余清芳、江定、羅俊等，起事於臺南西來庵，被檢舉一九五七人，死刑八六六人（部分減刑爲無期徒刑），是漢系臺灣人最大規模的武裝抗日。

一九一七年 十二歲 父執之女梁盒（十二歲）過門爲童養媳。

一九一九年 十四歲 目睹受父親照顧的行商楊傳，在大街上被日本警察毆打致死，而驚恐萬分。

（三月，朝鮮發生三一運動。五月，中國發生五四運動。十月，臺灣首任文官總督田建次郎蒞任。）

一九二〇年 十五歲 次兄楊趁考取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因無法籌足學費，接受父執輩之勸，入贅大營陳家。

（三月，留日臺灣學生組織「新民會」。七月，《臺灣青年》——《臺灣民報》之前身——創刊。）

一九二一年 十六歲 新化公學校畢業，投考中學失敗，進入新化糖業試驗所當臨時工，工資每日三毛八分。被所裡日本人揶揄爲「楊貴妃」而厭惡本名。

（七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十月，臺灣文化協會創立。）

一九二二年 十七歲 考入新設立之臺南州立第二中學校（現今臺南一中）。

（六月，日本共產黨創立。）

一九二三年 十八歲 九月，閱讀大杉榮被殺的新聞而感觸甚深。

（四月，《臺灣民報》週刊創刊。）

一九二四年十九歲 不願與董養媳送做堆，又為擴展思想領域，自動退學臺南州立二中，東渡日本。

（一月，國共第一次合作。）

一九二五年二十歲 經過檢定考試，考入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能科夜間部，日間當送報伙、泥水工、其他雜工等，賺取學費與生活費，常在飢寒交迫中掙扎。

（六月，二林蔗農組合組成。十一月，鳳山農民組合成立。同年，在臺灣發生有組織的農民運動。）

一九二六年廿一歲 組織文化研究會，參加勞工運動、政治運動。參加佐佐木孝丸家舉行的戲劇研究會。

投稿各報刊雜誌，〈自由勞動者的手記〉刊載於東京記者聯盟機關雜誌《號外》，初嘗領稿費的滋味。

（六月，臺灣農民組合設立。）

（按：河原功記載有誤。〈自由勞動者的手記〉發表時間應在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七年廿二歲 三月二十八日，參加臺灣青年會新設立的社會科學研究部。

參加朝鮮人的演講會，第一次被捕。響應臺灣農民組合的召喚而束裝回臺。在臺北文化協會認識連溫卿，參加民衆演講會。

在臺中農民組合認識趙港，而組織研究會。

屢接簡吉電報，造訪簡吉於鳳山農民組合，在此認識葉陶（後之楊夫人），隨即參加各地之巡迴演講會。

十月中，成爲臺灣文化協會會員。起草臺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大會宣言（十二月五日），因之第二次被捕。在臺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大會，當選十八位中央委員之一，由中央委員互選，當選爲常務委員。（五名）

（一月，文化協會臨時總會，連溫卿等左派獲勝。二月，「臺灣工友聯盟」成立。七月，「臺灣民衆黨」成立。十月，臺灣文化協會第一次全島大會。）

一九二八年 廿三歲 二月三日，臺灣農民組合組織特別活動隊，擔任該隊政治、組織、教育等重要工作。

擔任竹林爭議事件負責人，輾轉竹山、斗六、小梅、竹崎等地組織農民。第三次在竹山；第四次在小梅；第五次在朴子；第六次在麻豆；第七次在新化；第八次在中壢，連續六次被捕。受聘臺灣文化協會機關報——《臺灣大眾時報》（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創刊，同年七月九日第十號停刊）記者，在創刊號發表〈當前的國際情勢〉一文。

爲竹林爭議的方針，與簡吉意見不合，在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召開之中央委員會，被該會幹部剝奪中央委員會、農民組合等一切職務。

被推選為臺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在彰化、鹿港組讀書會。

（四月，「臺灣共產黨」組成。臺灣帝國大學開校。）

一九二九年 廿四歲 預定在上年十月三十一日召開之文化協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遭到裁撤處分，而改在是年一月十日於文化協會總部辦事處召開中央委員會，被推選為議長。

二月與葉陶共同列席臺南總工會會員大會，發表演講。預定在次日（二月十二日）返回新化與葉陶結婚，不料，在十二日凌晨，於文化協會臺南支會雙雙被捕，帶上手銬腳鐐，從警察署送往臺南監獄，再轉臺中監獄。此次大規模檢舉，全島被捕四萬人以上。出獄一個月後，（四月）在新化舉行結婚典禮。暫住新化後，轉往高雄定居。

一九三〇年 廿五歲 在高雄經營衣服加工生意失敗。

長女秀俄出生。

入贅陳家之次兄楊趁，在臺南縣新市開業行醫，因不堪虐待而自殺，心靈受到重大創傷。

（三月，《臺灣民報》改為《臺灣新民報》。八月「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十月，霧社事件發生，日人被殺一三四名。同年，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總工會等運動瀕臨崩潰。）

一九三二年 廿六歲 在高雄內惟（即壽山山麓）撿柴出售維生。



(二月，臺灣民衆黨解散。六月，滿州事件發生。同年六月、十一月，左傾份子遭到大肆檢舉，臺灣共產黨受到徹底的打擊。)

一九三二年 廿七歲 小說〈送報伕〉經賴和之手，刊載於《臺灣新民報》。只刊出前半部，後半部被查禁。

因羨慕《水滸傳》的李逵，首次以楊逵爲筆名。

長子資崩出生。此時身上僅剩四分錢。

(一月，《臺灣新民報》獲准發行日刊。同月，上海事件發生。三月，「滿州國」成立。)

一九三四年 廿九歲 爲生活奔波，曾經當家庭教師、清道夫、磚廠工人，整日搬運泥土，輾轉求職。

〈送報伕〉全文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當年第一名從缺)，刊載於十月號，乃是臺灣人作家首次進軍日本文壇，惟該書在臺灣卻被禁售。經何集璧介紹而認識張深切，擔任臺灣文藝聯盟機關誌《臺灣文藝》編輯委員，負責日文版編輯，月薪十五圓。

(五月，全島性文學團體「臺灣文藝聯盟」成立。十一月，臺灣文藝聯盟機關誌《臺灣文藝》創刊。)

一九三五年三十歲 擔任楊肇嘉的祕書，撰寫楊肇嘉回憶錄。月薪二十圓。妻葉陶在霧峰吳家當家庭教師，月薪二十圓。

不滿張星建干預《臺灣文藝》編輯，要求履行編輯委員會的決議，未被採納，遂引起派系問題，爭論一時。

十一月，創立「臺灣新文學社」。離開《臺灣文藝》編輯，創設《臺灣新文學》，十二月出刊。

（八月，舉行臺灣文藝聯盟「第二次臺灣文藝大會」。）

一九三六年卅一歲 〈田園小景〉刊載於《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五期，後半部被查禁。

〈送報仗〉由胡風譯為中文，廣受大陸讀者歡迎。

楊逵、葉陶雙雙臥病，《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八期起，由臺北王詩琅負責編輯。

《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十期「中文創作特輯」被查禁。

（八月，《臺灣文藝》第三卷發行至第七、八號，不得已停刊，臺灣文藝聯盟亦被強制解散。十二月，發生西安事變，自此，中國政局向抗日統一戰線展開。）

一九三七年卅二歲 《臺灣新文學》自第二卷第四期起，再由臺中楊逵負責編輯。適逢日本政府下令廢止漢文版，經營越感困難，自第二卷第五期起不再出刊。

六月赴東京，九月回臺，在東京接觸《日本學藝新聞》、《星座》、《文藝首都》等負責人，建議開闢臺灣新文學欄，雖被採行，惟因七七事變而未能實現。在東京本鄉旅邸被捕。經《大勢新聞》主筆保釋出獄，為避開警方查緝，隱匿在東京近郊之鶴見溫泉，將《田園小景》改題為《模範村》，經由《文藝首都》保高氏介紹，交與「改造社」之《文藝》編輯部，十月二十日，遭逢文化界大整肅而退稿。

返臺後，積勞成疾，咯血數月，為了米店二十圓借款而被告到法院，幸而酷愛文藝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彥濟助一百圓，償清債款，又將餘款三十圓租用二百坪土地，開闢首陽農園（以首陽山故事命名）。友人林懷古夜半來訪，翌晨，見農園無鋤頭可用，助其二十圓買鋤頭、種苗，兩三天後，新鋤頭被偷。

（四月，臺灣全面禁止漢文版。六月，《臺灣新文學》停刊，全十四冊，被查禁一冊，另出刊《新文學月報》二期。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中日進入全面戰爭。八月，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被解散。九月，國共第二次合作。同年皇民化運動積極展開。）

一九三八年 卅三歲 日本警官入田春彥因被指控思想左傾，而驅逐離臺，在出租公寓自殺，遺書託付楊達料理後事。

一九三九年 卅四歲 母病歿。

(九月，二次大戰爆發。)

一九四〇年卅五歲 父病歿。

第十次被捕。

已恢復健康，花園經營也稍上軌道。更換園地，面積擴大至一千坪左右。同年，改姓名運動、寺廟整理積極展開。

一九四一年卅六歲 (二月，《臺灣新民報》被迫改題為《興南新聞》。四月，「皇民奉公會」成立。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

一九四二年卅七歲 四月，臺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一九四三年卅八歲 七月，臺灣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一九四四年卅九歲 小說集《萌芽》印刷中被查扣。

八月受總督府情報課之聘，視察石底煤礦，撰寫〈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發表於臺灣文學奉公會的《臺灣文藝》。

與臺灣新聞社之田中保男、同盟通信社之山下，共同演出《怒吼吧！中國》

(特洛查可夫原作)，在臺中、彰化、臺北等地上演，甚獲好評。十二月，

《怒吼吧！中國》日文劇本在臺北盛興出版社上梓。

(九月，臺灣實施徵兵制度。)

一九四五年 四十歲 組織焦土會，企劃以閩南語演出《怒吼吧！中國》，在排練中，由於日本投降而停演。

首陽農園改稱一陽農園，發行《一陽週報》。

組織「新生活促進隊」為髒亂的臺中市清理垃圾，改革社會。

（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九月一日，國民政府公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任命陳儀為首任行政長官。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時，陳儀率領長官公署官員及國軍抵臺，長官公署正式成立。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臺灣區受降典禮。（按：河原功之原文有誤，記載九月二十五日陳儀來臺，長官公署成立，並在臺北公會堂舉行臺灣區受降典禮。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兩項係譯者改寫。）

一九四六年 四一歲 進入臺灣評論社。

三月，小說集《鵝媽媽出嫁》在臺北三省堂上梓。並擔任《和平日報》之「新文學」版編輯。

七月，中日對照本《送報伏》在臺北臺灣評論社上梓。（中文係胡風翻譯）  
一九四七年 四二歲 二二八事件後被捕（四月），夫妻同赴監牢，八月釋放。

臺北東華書局發行中日對照本「中國文藝叢書」，十月，楊達著（胡風譯）

《送報伏》刊於第六輯。

(二月二十八日，因私煙查緝員之暴行引起公憤，臺灣民衆對陳儀之失政而發生暴動。三月三日，臺灣人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三月八日，陳儀拒絕處理委員會所提之三十二條要求。三月九日，陳儀獲得來自大陸國軍支援，開始鎮壓暴動份子。三月十七日，施行於臺北市之戒嚴令，擴及全省各地。四月二十二日，行政院決議撤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五月十六日，臺灣省政府成立。魏道明就任首任臺灣省政府主席。)

一九四八年 四三歲 主編《力行報》之「新文藝」欄，八月創刊《臺灣文藝叢刊》雜誌。

一九四九年 四四歲 起草《和平宣言》草案，登載於上海《大公報》，因而觸怒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四月六日被捕。

(四月一日，國共和談開始，二十一日和談決裂。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二月四日，中央政府開始撤退到臺灣。)

一九五〇年 四五歲 經宣判處十二年徒刑。

(五月二十三日，「二二八事件」審理終結。六月十八日，原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離臺後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以叛亂罪在臺北新店執行槍決。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

一九五一年 四六歲 被送往綠島監獄。

一九五二年 四七歲 詩《八月十五那一天》發表在綠島《新生活壁報》。

(四月二十八日，中日簽署和約。)

一九五三年 四八歲 〈光復話當年〉發表在《新生活壁報》。

(六月十三日，中日通商協定締約。)

一九五四年 四九歲 〈家書〉、〈半罐水叮嚀響〉發表在《新生活壁報》。

(十二月二日，中美安全防禦條約締約。)

一九五五年 五十歲 〈永遠不老的人〉發表在《新生活壁報》。

一九五六年 五一歲 〈春天就要到了〉、〈我的小先生〉、〈百合〉、〈青年〉、〈談青年〉等

發表在《新生活壁報》：〈園丁日記〉、〈太太帶來了好消息〉發表在《新生活月刊》。

一九五七年 五二歲 〈智慧之門將要開了〉、〈春光關不住〉、〈自強不息〉發表在《新生活月刊》。

一九五八年 五三歲 七月，〈大牛和鐵犁〉發表在《東方少年》。

(按：因政府欲派其至日本從事特務工作，於一月底被借提至臺灣。五月時，由於中日大勢改變，又被押返綠島。)

一九五九年 五四歲 劇本〈牛犁分家〉在綠島演出。

一九六〇年 五五歲 撰〈豬八戒做和尚〉，被禁演。

一九六一年 五六歲 十二年刑期屆滿，四月六日回臺灣。在高雄購買果園，因土地糾紛而放棄。接受楊肇嘉之託，代撰楊肇嘉回憶錄。

五月，葉陶當選模範母親。

一九六二年 五七歲 由於史實採摘與解釋意見相左，而辭去回憶錄之撰述。

〈春光關不住〉發表在《新生報》；〈園丁日記〉、〈智慧之門〉發表在《聯合報》；〈才八十五歲的女人〉發表在《新生活壁報》。

在臺中市郊區購買荒地，經營「東海花園」，借貸五千元，在荒蕪的土地上蓋一間小屋居住。

一九六五年 六十歲 〈春光關不住〉、〈園丁日記〉收錄在鍾肇政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集》，臺北文壇社出版。

一九六九年 六四歲 妻葉陶因心臟病、腎臟病併發，八月一日患尿毒症去世。

一九七一年 六六歲 坂口禱子撰〈楊達與葉陶〉，戰後首次將其消息公開介紹給日本文壇。刊載於《亞細亞》第六卷第十期。

（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表決：中共進入聯合國，中華民國退出。）

一九七二年 六七歲 東海花園稍上軌道。

日本雜誌《中國》第一〇二期（五月號）重刊〈送報伏〉。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與美發表共同聲明，和平五原則。九月二十九日，日本承認中共，中日斷交。)

一九七三年 六八歲

〈模範村〉重刊於《文季》第二期(十一月號)。

一九七四年 六九歲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與美互設聯絡辦事處。)

〈鵝媽媽出嫁〉在《中外文學》(一月號)；〈送報伕〉在《幼獅文藝》(九月)重新發表，此後，臺灣文藝界對楊逵評價逐步升高。

(四月十二日，中共與日簽署航空協定。四月二十一日，臺日航線停飛。十二月二十六日，原被日本軍征調之臺灣山胞軍人在印尼莫洛泰島森林裡被發

現。)

一九七五年 七十歲

五月，代表作〈送報伕〉等八篇著作集《鵝媽媽出嫁》(張良澤編)在臺南

大行出版社上梓。

(四月五日，蔣介石去世。七月十日，中日重簽民航協定。八月十日，日航分公司「日本亞航」與「中華航空」公司簽約，日臺航線再開。)

一九七六年 七十一歲

國中《國文》教科書第六册收錄〈壓不扁的玫瑰花〉(〈春光關不住〉改題)。

自日據時代起，臺灣文學家作品編入國文教科書的第一人。

五月，著作選集《鵝媽媽出嫁》由臺北香草山出版公司出版。

十月，著作選集《羊頭集》，由臺北輝煌出版社付梓。楊素絹編《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達其人其事與著作之諸家評論集）亦見出版。

（一月九日，周恩來死亡。七月六日，朱德死亡。九月九日，毛澤東死亡。）

一九七七年 七二歲 一月，東海花園火災，幸及時撲滅。八月，發表〈自主自立救中國〉於《中華雜誌》一六九期。

十月，於臺北青年公園義賣花，主辦單位爲其祝壽。

十二月，發表〈老園丁的話〉於《新文藝》六十四期。

（四月，爆發鄉土文學論戰，至翌年六月才平息。十一月十九日，發生中壢事件。）

一九七八年 七三歲 九月，林梵著《楊達畫像》，由筆架山出版社上梓。

（十二月十六日，中美斷交。）

一九七九年 七四歲 七月，《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鍾肇政、葉石濤主編），由遠景出版社上梓，收有楊達的〈送報伙〉、〈泥娃娃〉、〈頑童伐鬼記〉、〈無醫村〉四作。

（十二月，發生美麗島事件。）

一九八一年 七六歲 三月九日凌晨，因痰阻塞症送醫急救。三月十二日，移居外埔次子楊建家養病。

（按：此則悉由筆者所補。）

一九八二年 七七歲 八月二十八日，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赴美，回途重訪東京，十二月十三日返臺。

十二月十八日於耕莘文教院講〈美國見聞〉，晚間出席「益壯會」洗塵晚宴。

（按：元旦假期內移居大溪長子資崩家靜養。）

一九八三年 七八歲 一月，獲第六屆吳三連文學獎。

五月七日，應輔仁大學草原文學社之邀演講〈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

九月，移居臺北縣鶯歌鎮，由孫女楊翠照顧起居。

十月，增額立委選舉，為楊祖珺助選。

十一月，獲第一屆臺美基金會人文科學獎。

（按：本則敘述有誤。依《自立晚報》報導，第六屆吳三連文學獎於十一月

七日揭曉，楊遠獲小說類獎。）

一九八四年 七九歲 二月十二日，參加賴和先生平反會致詞，發表〈我的心聲〉一文。（地點在

耕莘文教院）

六月十七日，在臺大校友會館舉辦「保衛先烈林少貓抗日英名」演講會中演

講〈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經驗〉。

一九八五年 八十歲 三月十二日，上午五時四十分在臺中去世。

(按：二月重返臺中，由么女楊碧照顧生活起居。  
(註：河原功寫至一九七六年，以後係譯者增補。)

## 《附錄二》

河原功編：楊遠氏「著作目錄」／楊鏡汀譯

### 凡例

- 一、本章盡量收錄楊貴氏曾經發表在報章雜誌作品集之著作（小說、評論、隨筆）。
- 二、楊貴氏有代表性的筆名「楊達」之外，尚有林泗文、虛泰平、賴健兒、伊東亮、陳水性、公羊、SP、狂人等筆名，也有用本名發表的作品，凡已判定是其大作，均予收錄，筆名照刊。
- 三、年號亦依據原作照刊，因此西曆、民國昭和稍嫌混亂。
- 四、出版地（發行地）僅註明臺灣以外地區。
- 五、戰前幾乎以日文撰著，其中用中文撰述者，均予註明；戰後以中文為主，如有日文或中日對照本，亦予以註明。
- 六、地點不清、時間不明者，則留空白。

### （一）戰前

楊貴：〈自由勞動者的生活〉（《號外》第 號，大正十五年 月，東京）

(按：河原功記載有誤，本文發表於昭和二年。)

楊貴：〈當前的國際情勢〉(《臺灣大眾時報》創刊號 一九二八年五月 東京 中文)

楊達：〈送報伏〉(《臺灣新民報》昭和七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 只刊前半部，後半部被查

禁。)

楊達：〈送報伏〉(《文學評論》第一卷第八號 昭和九年十月 東京)

楊達：〈靈籤〉(李獻章編《革新》 大溪革新會發行 昭和九年十月)

賴健兒：〈「送報伏」關於楊達(原文照錄)的作品〉(《臺灣新聞》 昭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楊達：〈對文協座談會的期待〉(「」 昭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賴健兒：〈靈籤與迷信。「革新」誌上的楊達與賴慶氏〉(「」 昭和九年十一月 日)

楊達：〈街頭素描〉(《文學評論》第一卷第十號 昭和九年十二月 東京)

楊達：〈臺灣文壇，一九三四年的回顧〉(《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一號 昭和九年十二月)

楊達：〈難產〉(《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一號—第四號 昭和九年十二月至十年四月 未完)

健兒：〈爲了時代的前進〉(《行動》第三卷第四號 昭和十年二月 東京)

楊達：〈藝術是大衆的〉(《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二號 昭和十年二月)

健兒：〈行動主義的擁護〉(《行動》第三卷第三號 昭和十年三月 東京)

楊達：〈行動主義的檢討〉(《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三號 昭和十年三月)

楊達：〈請聽讀者之聲〉(《新潮》第三二卷第四號 昭和十年四月 東京)

楊達：〈文學批評的基準〉（《臺灣文藝》第二卷第四號 昭和十年四月）

楊達：〈死〉（《臺灣新民報》 昭和十年四月三日至五月二日 中文）

（按：〈死〉之連載始於四月二日。）

楊達：〈斥高尚的藝術觀〉（《文學評論》第二卷第五號 昭和十年五月 東京）

楊達：〈大快人心〉（《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楊貴：〈楊肇嘉論〉（《臺灣新民報》 昭和十年五月 日）

楊達：〈歪理〉（《新潮》第三二卷第六號 昭和十年六月 東京）

楊達：〈臺灣地震災區勘察慰問記〉（《社會評論》第一卷第四號 昭和十年六月 東京）

楊達：〈臺灣大震災記、感想二三〉（《臺灣文藝》第二卷第六號 昭和十年六月）

楊達：〈提燈無益——文聯團體的組織問題〉（《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六月十九日）

SP：〈楊達撒謊還是張深切撒謊？〉（《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楊達：〈關於SP〉（《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楊達：〈團體與個人——具體的二三提案〉（《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楊達：〈將被遺忘的災區——臺灣災區劫後情況〉（《進步》第二卷第七號 昭和十年七月 東

京）

楊達：〈斥高尚的藝術觀〉（《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七月二十日）

楊達：〈前進作家與共同戰線，期待於「文學案內」〉（《時局新聞》 昭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

東京)

楊達：〈新文學管見〉（《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八月四日）

林泗文：〈迎接文聯總會，提倡進步的作家與大同團結〉（《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按：依日本原意，應譯為〈迎接文聯總會，提倡進步作家的大同團結〉。）

楊達：〈孩子們〉（《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七月 日）

楊達：〈心願〉（《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八月十三日）

楊達：〈關於群眾——張猛三氏的無知〉（《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九月四日—七日）

楊達：〈中國的傑出影片倡導「人道」〉（《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九月五日）

楊達：〈臺灣的文學運動〉（《文學案內》第一卷第四號 昭和十年十月 東京）

楊達：〈新劇運動與舊劇的改革——錦上花觀賞有感——〉（《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十月二日至 日）

楊達：〈臺灣文壇的近況〉（《文學評論》第二卷第十二號 昭和十年十一月 東京）

楊達：〈臺灣文學運動的現況〉（《文學案內》第一卷第五號 昭和十年十一月 東京）

楊達：〈臺灣新文學社創立宣言〉（《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十一月九日）

楊達：〈請投寄可代表臺灣的作品〉（《臺灣新聞》 昭和十年十一月十二？十三？日）

林泗文：〈我的書齋〉（《臺灣新文學》創刊號 昭和十年十二月）



楊達：〈水牛〉（《臺灣新文學》 昭和十年十二月）

楊達著、胡風譯：〈送報伙〉（《世界知識》第二卷第一期 民國二十四年 月 上海）

楊達譯、賴和著：〈豐收〉（《文學案內》第二卷第一號 昭和十一年一月 東京）

楊達：〈大眾傳播與同人雜誌〉（《臺灣新聞》 昭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楊達：〈給文評獎審查委員〉（《文學評論》第三卷第三號 昭和十一年三月 東京）

楊達：〈計畫發表「全島作家競作專集」之前〉（《臺灣新聞》 昭和十一年三月六日）

楊達著、胡風譯：〈送報伙〉（世界知識社編《弱小民族小說選》 上海 生活書局發行 民國

二十五年五月 中文）

楊達：〈蕃仔雞〉（《文學案內》第二卷第六號 昭和十一年六月 東京）

楊達：〈明日臺灣文壇的中堅人物——新興期的作家及其作品、次期的作家們——〉（《文學案

內》第二卷第六號 昭和十一年六月 東京）

楊達：〈田園小景——寫自素描冊——〉（《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五號 昭和十一年六月只刊

前半段，後半部被查禁）

狂人：〈知哥仔伯〉（《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八號 昭和十一年九月）

楊達：〈討伐魔鬼〉（《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九號 昭和十一年十一月）

（按：本篇即〈頑童伐鬼記〉。）

楊達：〈胡風譯〉〈送報伙〉（朝鮮臺灣短篇小說集《山靈》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 民

國二十五年 月)

- 楊達：〈關於報導文學〉（《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 昭和十二年二月五日）
- 楊達：〈關於臺灣風味的藝術〉（《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 昭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 楊達：〈首陽園雜記〉（《臺灣新聞》 昭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四月二日）
- 楊達：〈何謂報導文學〉（《臺灣新民報》 昭和 年四月二十五日）
- 楊達：〈報導文學問答〉（《臺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五號 昭和十二年六月）
- 陳水性：〈貧農〉（《臺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五號 昭和十二年六月）
- 楊達：〈惡性補習的緩和和方法〉（《人民文庫》第二卷第十號 昭和十二年九月 東京）
- 楊達：〈「第三代」與其他〉（《文藝首都》第五卷第九號 昭和十二年九月 東京）
- 楊達：〈臺灣舊新聞集〉（《 》 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至 日 東京）
- 楊達：〈入田君二三事〉（《臺灣新聞》 昭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 楊達：〈三國歷史故事〉（臺北、盛興出版部第一卷 昭和十六年 月 第二卷 年 月 第三卷：十八年十月 第四卷 十九年十一月）
- 楊達：〈父與子〉（《臺灣藝術》第三卷第一號—第三號 昭和十七年一月—三月）
- 楊達：〈無醫村〉（《臺灣文學》第二卷第一號 昭和十七年二月）
- 楊達：〈泥娃娃〉（《臺灣時報》第二六八號 昭和十七年四月）
- 楊達：〈民衆的娛樂〉（《民俗臺灣》第二卷第五號 昭和十七年五月）

楊逵：〈臺灣文學問答〉（《臺灣文學》第二卷第五號 昭和十七年七月）

（按：記載有誤。本文發表於《臺灣文學》第二卷第三號，即總號第五號。）

楊逵：〈土地公〉（《民俗臺灣》第二卷第十號 昭和十七年十月）

楊逵：〈鵝媽媽出嫁〉（《臺灣時報》第二七四號 昭和十七年十月）

楊逵：〈寫在大東亞文學者會議〉（《臺灣時報》第二七五號 昭和十七年十一月）

楊逵：〈萌芽〉（《臺灣藝術》第三卷第十一號 昭和十七年十一月）

楊逵：〈作家與熱情〉（《興南新聞》 昭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楊逵：〈紳士們〉（《臺灣藝術》第三卷第十二號—第四卷第四號 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年

四月 未完）

楊逵：〈天狗討伐〉（《臺灣公論》第八卷第一號 昭和十八年一月）

（按：本篇即〈撲滅天狗熱〉。）

楊逵：〈納鞋底〉（《民俗臺灣》第三卷第二號 昭和十八年二月）

楊逵：〈追懷賴和先生〉（《臺灣文學》第三卷第二號 昭和十八年四月）

楊逵：〈鴉片戰爭畫冊〉（《興南新聞》 昭和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楊逵：〈臺灣出版界雜感〉（《臺灣時報》第二八三號 昭和十八年七月）

伊東亮：〈餽現實主義的擁護〉（《臺灣文學》第三卷第三號 昭和十八年七月）

楊逵：〈一隻螞蟻的工作「懷念的處女作」〉（《興南新聞》 昭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楊逵：〈泥娃娃〉（大木書房編輯《臺灣小說集1》 臺北 大木書房 昭和十八年十一月）

楊逵：〈絲線〉（《臺灣藝術》第四卷第十二號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

楊逵：〈較量〉（《興南新聞》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楊逵：〈會報的意義與任務〉（《臺灣文藝家協會會報》第六號 昭和十八年？十九年）

伊東亮：〈今日臺灣文學不貧乏〉（《興南新聞》 昭和十九年？十八年）

楊逵：〈再婚者的手記〉（《民俗臺灣》第四卷第二號 昭和十九年二月）

楊逵：〈思想與生活〉（《臺灣新報》青年版 昭和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楊逵：〈增產熱潮下——悠閒的老頭——〉（《臺灣文藝》第一卷第四號 昭和十九年八月）

（按：本篇即〈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

楊逵：〈勞動禮贊〉（《臺灣文藝》第一卷第四號 昭和十九年八月）

楊逵：〈自戒、自戒〉（《臺灣新報》青年版 昭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楊逵：〈老鷹與油條〉（《臺灣新報》青年版 昭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楊逵：〈瞧！拉巴爾的天空〉（《臺灣新報》青年版 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楊逵：〈騎馬戰〉（《臺灣新報》青年版 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楊逵：〈小領袖〉（《臺灣文藝》第一卷第六號 昭和十九年十二月）

楊逵：〈萌芽〉（昭和十九年印刷中被查扣而禁售）

△〈萌芽〉、〈沈默的店小二〉、〈無醫村〉、〈鵝媽媽出嫁〉、〈猴狗鄰居〉等均包括在內。

（按：〈沈默的店小二〉依文意應譯為〈不笑的小孩〉。）

楊達編：《怒吼吧！中國》（臺北 盛興出版社 昭和十九年十二月 臺灣文庫1）

楊達：〈阿薩的饗宴〉（《興南新聞》青年版 昭和十九年 月 日）

（按：日文原名「お薩の饗宴」。「お薩」即「甘藷」之意，中文應譯為〈甘藷的饗宴〉。）

楊達：〈增產熱潮下——悠閒的老頭——〉（臺灣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臺灣小說集（坤卷）

》 臺北 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昭和二十年一月）

楊達：〈愛心〉（《臺灣美術》第四、第五號合刊 昭和二十年三月）

楊達：〈民心〉（《臺灣公論》第十卷第四號 昭和二十年四月）

## （二）戰後

楊達：〈猴狗鄰居〉（《一陽週報》第七號—第八號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三日

日文）

（按：本篇分上、中、下三段，刊於《一陽週報》第七號至第九號，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十七日。）

楊達：《鵝媽媽出嫁》（臺北、三省堂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 日文）

△包含〈鵝媽媽出嫁〉〈採甘藷〉〈無醫村〉〈歸農之日〉等篇。

（按：〈採甘藷〉應為〈種地瓜〉。）

- 楊達：〈文學再建的前提〉（《和平日報》 民國三五年五月 日 日文）
- 楊達：〈臺灣新文學停頓的檢討〉（《和平日報》 民國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日文）
- 楊達：〈胡風譯〉《送報伙》（臺北、臺灣評論社 民國三五年七月 中日文對照）
- 楊達：〈請聽人民之聲〉（《臺灣評論》第一卷第二期 民國三五年八月 日文）
- 楊達：〈爲此一年哭〉（《新知識》 1 民國三五年八月）
- 楊達：〈紀念魯迅〉（《和平日報》 民國三五年十月十九日）
- 楊達譯：魯迅《阿Q正傳》（臺北、東華書局 民國三六年一月 中日文對照）
- 楊達：〈阿Q畫圓圈〉（《文化交流》第一輯 民國三六年一月）
- 楊達：〈幼春不死！賴和猶存！〉（《文化交流》第一輯 民國三六年一月）
- 楊達譯：郁達夫《微雪的早晨》（臺北、東華書局 民國 年 月 中日文對照）
- （按：本書發行於民國三七年八月一日。）
- 楊達：〈胡風譯〉《送報伙》（臺北、東華書局 民國三六年十月 中日文對照）
- 楊達譯：矛盾《大鼻子的故事》（臺北、東華書局 民國三六年十一月 中日文對照）
- 楊達：〈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新生報》 民國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 楊達：〈臺灣民謠〉（《力行報》 民國三八年八月二日）
- 楊達：〈八月十五那一天〉（《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一年十月）
- 楊達：〈過去臺灣文學運動的回顧〉（《新生報》 民國 年 月 日）

（按：本文〈過去臺灣文學運動的回顧〉，爲《新生報》副刊〈橋〉第二次茶會總報告的發言記錄。發表於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七日，〈橋〉百期擴大號。）

楊逵：〈作者應到人民中間去觀察，本省與外省作者應當加強連繫與合作〉（《新生報》民國  
年 月 日）

（按：本文爲《新生報》副刊「橋」第一次茶會報告總記錄。發表於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七日。「橋」百期擴大號。）

楊逵：〈台灣文學之道與文藝工作者合作問題〉（《新生報》民國 年 月 日）

（按：本文發表於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九日。）

楊逵：〈給各報副刊編者及文藝工作者的一封信〉（《新生報》民國 年 月 日）

（按：本文發表於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楊逵：〈尋找臺灣文學之路〉（《力行報》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楊逵：〈人民的作家〉（《力行報》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楊逵：〈黃虎旗〉（《臺灣文藝叢刊》第一輯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

楊逵：〈民謠〉（《力行報》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三日）

楊逵：〈卻糞掃〉（《臺灣文學叢刊》第二輯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

楊逵：〈上任〉（《臺灣文學叢刊》第二輯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

楊逵：〈生活〉（《臺灣文學叢刊》第二輯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

- 楊逵：〈「實在的故事」問答〉（《力行報》 民國三七年九月）
- 楊逵：〈李炳崑譯〉〈無醫村〉（《新生活》 民國三七年十月二十日）
- 楊逵：〈論文學與生活〉（《力行報》 民國三七年十二月六日）
- 楊逵：〈模範村〉（《臺灣文學叢刊》第三輯 民國三七年十二月）
- 楊逵：〈萌芽〉（《新生報》 民國三八年一月十三日）〈萌芽小事〉之中譯）
- 楊逵：〈光復話當年〉（《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二年十月）
- 楊逵：〈家書〉（《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三年十月十五日）
- 楊逵：〈半罐水叮嚀響〉（《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二年 月）
- 楊逵：〈永遠不老的人〉（《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四年一月）
- 楊逵：〈百合〉（《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五年一月）
- 楊逵：〈春天就要到了〉（《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五年二月）
- 楊逵：〈青年〉（《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五年二月）
- 楊逵：〈太太帶來了好消息〉（《新生月刊》 民國四五年四月）
- 楊逵：〈談青年〉（《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五年四月）
- 楊逵：〈園丁日記〉（《新生月刊》 民國四五年十一月）
- 楊逵：〈我的老先生〉（《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五年 月）
- 楊逵：〈好話兩句多〉（《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五年 月）



楊逵：〈智慧之門將要開了〉（《新生月刊》 民國四六年五月）

楊逵：〈春光關不住〉（《新生月刊》 民國四六年六月）

楊逵：〈自強不息〉（《新生月刊》 民國四六年十二月）

楊逵：〈新春談命運〉（《新生月刊》 民國四七年一月）

公羊：〈大牛和鐵犁〉（《東方少年》第五卷第七號 民國四七年七月）

楊逵：〈園丁日記〉（《聯合報》 民國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楊逵：〈春光關不住〉（《新生報》 民國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楊逵：〈智慧之門〉（《聯合報》 民國五一年四月十四日）

楊逵：〈才八十五歲的女人〉（《新生活壁報》 民國五一年 月）

楊逵：〈春光關不住〉（鍾肇政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1》臺北、文壇社 民國五四年十月）

楊逵：〈園丁日記〉（鍾肇政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1》臺北、文壇社 民國五四年十月）

楊逵：〈諺語四則〉（《臺灣風物》第十七卷第一期 民國五六年二月）

楊逵：〈墾園記〉（《新生報》 民國五八年三月十二日）

楊逵：〈羊頭集〉（《文藝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民國五九年一月）

楊逵：〈春光關不住〉（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小說1》臺北

、巨人出版社 民國六一年一月）

楊逵：〈送報佚〉（《中國》第一〇二號 昭和四七年五月 東京 日文）

楊達：〈模範村〉（《文季》第二期 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

楊達：〈鵝媽媽出嫁〉（《中外文學》第二卷第八期 民國六十三年一月）〈鵝鳥の嫁入〉之中文翻譯

譯）

楊達：〈冰山底下〉（《臺灣文藝》第四三期 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楊達：〈送報伏〉（《幼獅文藝》第四〇卷第三期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

楊達作、張良澤編：〈鵝媽媽出嫁〉（臺北、大行出版社 民國六十四年五月）

△〈冰山底下話七十年〉（《冰山底下》）〈種地瓜〉（《薯作リ》）〈無醫村〉〈萌芽〉〈送報伏

▽〈模範村〉〈春光關不住〉等均包含在內。

楊達：〈壓不扁的玫瑰花〉（國立編譯館編「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第六冊）」 臺北、國立編

譯館 民國六十五年一月 係〈春光關不住〉改題。）

楊達：〈鵝媽媽出嫁〉（臺北、香草山出版公司 民國六十五年五月）

△大行出版社出版《鵝媽媽出嫁》之再錄。

楊達：〈園丁日記〉（《聯合報》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 日）

楊達：〈刻不容緩的「臺灣抗日史」〉（《遠東人雜誌》第三四期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

楊達：〈首陽園雜記〉（《夏潮》第一卷第七期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泥娃娃〉之中譯）

楊達：〈羊頭集〉（臺北、輝煌出版社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

△〈三個臭皮匠〉〈首陽園雜記〉〈園丁日記〉〈泥娃娃〉（《泥人形》）〈智慧之門將要開了〉

〈新春談命運〉 〈光復話當年〉 〈家書〉 〈永遠不老的人〉 〈太太帶來了好消息〉 〈自強不息〉  
〈我的小先生〉 〈談青年〉 〈才八十五歲的女人〉 〈大牛和鐵犁〉 〈瞎子打架〉 〈墾園記〉  
〈捕鼠記〉 〈羊頭集〉 〈談諺語〉 〈諺語與時代〉 〈諺語四則〉 〈半罐水叮咣響〉 〈好話兩句  
多〉 〈我有一塊磚〉 〈水牛〉 〈一個日據時期文學工作者的感想〉 〈臺灣新文學的二位开拓者  
〉 〈刻不容緩的「臺灣抗日史」〉等均收錄在內。

楊達：〈三個臭皮匠〉（《中國時報》 民國六五年十月十二日）

楊達：〈談諺語〉 〈諺語與時代〉 〈諺語四則〉（《臺灣新生報》 民國六五年十月十五日）

楊達：〈我有一塊磚〉（《中央日報》 民國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楊達：〈自強不息〉（《中央日報》 民國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楊達：〈我的小先生〉（《臺灣日報》 民國六五年十一月七日）

楊達：〈楊達詩抄——八月十五那一天〉 〈我們不是麻雀·一粒好種子·漁人〉（《笠》第七六期  
民國六五年十二月）

楊達：〈自主自立救中國——為七七紀念而作〉（《中華雜誌》第一六九期 民國六六年八月）

楊達：〈老園丁的話〉（《新文藝》第二六一期 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

楊達：〈春光關不住〉（《愛書人》第四四期 民國六六年七月十一日 中英文對照）

此外未經確認者有：

楊達：〈紅鼻子〉

林泗文：〈行商人〉（《日本學藝新聞》）

盧泰平：〈新神符〉

（按：「盧」為「虛」字之誤。經查河原功日文版無誤，疑為譯者之疏忽。）

楊達：〈小鬼的升學考試〉臺灣風景（一）（《俱樂部》第三二號）

（按：發表時使用「楊達」筆名，而非「楊遠」。發表刊物應為《土曜日》。）

楊達：〈爲了水滸傳〉（《臺灣新聞》）

## 《附錄三》

### 續補河原功編：楊達氏「著作目錄」

楊達：〈江博士講演評——關於白話文與文言文〉（《臺灣新民報》 昭和九年十一月）

（註：本篇日文原名〈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ついて〉。）

楊達：〈「首陽」解除記〉（《臺灣文藝》第一卷第二號 昭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註：本篇日文原名〈「首陽」解消の記〉。）

楊達：〈紀念 總理誕辰〉（《一陽週報》第九號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未署名）：〈大捷之後〉（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日寫成 以油印發送？《和平日報》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日？）

（臺中）

楊達：〈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自由日報》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九日 臺中）

一讀者：〈二・二七慘案真相——臺灣省民的哀訴〉（《自由日報》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九月？

臺中）

楊達譯、鄭振譯作《黃公俊的最後》（臺北、東華書局 民國三十七年？月）

楊達：〈漫畫三題〉（不如豬，勤，營養學）（《臺灣文學叢刊》第三輯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

楊達：〈談寫作〉（《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六年一月）

楊達：〈什麼是好文章〉（《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六年一月）

楊達：〈文章的味道〉（《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六年二月）

楊達：〈明年還要好〉（《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六年二月）

楊達：〈評金公子娶親〉（《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六年三月）

楊達：〈人生·工作·學習〉（《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六年三月）

楊達：〈文章的真實性〉（《新生活壁報》 民國四六年四月）

楊達：〈「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書面意見〉（《大學雜誌》七十九期 民國

六三年十一月）

楊達：〈一個日據時期文學工作者的感想〉（《中華雜誌》一五七期 民國六五年八月）

楊達：〈首陽園雜記〉（《夏潮》第一卷第七期 民國六五十月）

楊達：〈泥偶〉（即〈泥娃娃〉，為〈泥人形〉之中譯）（《夏潮》第一卷第七期 民國六五年

十月）

楊達：〈我要再出發〉（《夏潮》第一卷第七期 民國六五年十月）

楊達：〈我有一塊磚〉（《中央日報》 民國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楊達：〈沒關係啦！反正我們不依賴人家，從此，自立自強，不是更好嗎？〉（《聯合報》 民

國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楊逵：〈憶賴和先生〉（即〈追懷賴和先生〉之中譯）（《日據下臺灣新文學：賴和先生全集》

明潭出版社 民國六八年三月十五月初版）

楊逵：〈一路跑上去！〉（《聯合報》 民國六八年五月四日）

楊逵：〈送報伙〉、〈泥娃娃〉、〈頑童伐鬼記〉、〈無醫村〉（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

臺灣文學全集》 臺北、遠景出版社 民國六八年七月初版）

楊逵：〈鵝媽媽出嫁〉（臺北、民衆日報出版社 民國六八年十月初版）

楊逵：〈羊頭集〉（臺北、民衆日報出版社 民國六八年十月初版）

（註：輝煌出版社出版《羊頭集》之再錄。）

楊逵：〈文學可以把敵人化爲朋友〉（《聯合報》 民國六九年一月一日）

楊逵口述、楊素絹筆記〈光復前後〉（《聯合報》 民國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楊逵：〈無題〉（《聯合報》副刊〈不滅的旋風，未盡的奔流——聯副作家悼念姜貴〉筆談 民

國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楊逵：〈光復前後〉（《文學史話·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評論卷二》臺北、聯合報社 民國七

十年初版）

楊逵：〈把那些被埋沒的挖出來〉（附於「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復刻本」⑥《臺灣新文學》之前

臺北、東方文化書局 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

楊逵：〈牛犁分家〉（東吳大學校刊第七五期 民國七十年六月）

楊達口述：〈悼念老友徐復觀先生〉（《中華雜誌》二二六期 民國七一年五月）

楊達：〈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聯合報》 民國七一年六月十日）

楊達：〈即興〉（《自立晚報》 民國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楊達：〈即興〉（《一九八二年臺灣詩選》 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二年二月初版）

楊達：〈臺灣新文學的精神所在：談我的一些經驗和看法〉（《文季》第一卷第一期 民國七二年四月）

楊達：〈沈思·振作·微笑〉（《自立晚報》 民國七二年四月三十日）

楊達：〈沈思·振作·微笑〉（方梓專訪《人生金言：一百位當代名人心影錄》 臺北、自立晚報

社 民國七二年九月初版）

楊達：〈懷念東海花園——那段把詩寫在大地上的日子〉（《中國時報》 民國七二年十一月八日）

楊達：〈送報伙〉（施淑等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析》(2) 臺北、長安出版社 民國七三年二月十五月初版）

楊達：〈希望有更多的平反〉（《中華雜誌》二四八期 民國七三年三月）

楊達：〈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經驗〉（《中華雜誌》二五二期 民國七三年七月）

楊達：〈壓不扁的玫瑰〉（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四年三月初版）

（註：收錄楊達散文札記作品，與《羊頭集》內容大致相同。）



- 楊逵：〈沈思·振作·微笑〉（《自立晚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十三日）
- 楊逵：〈老牛破車〉（《聯合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十三日）
- 楊逵譯、諾貝爾作：〈記紐約百萬人反核反戰示威遊行〉（《聯合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十三日）
- 楊逵口述、王世勛筆記：〈我的回憶〉（《中國時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十三日—十五日）
- 楊逵：《鵝媽媽出嫁》（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 （註：收錄〈送報伙〉、〈模範村〉、〈無醫村〉、〈泥娃娃〉、〈萌芽〉、〈鵝媽媽出嫁〉、〈種地瓜〉、〈才八十五歲的女人〉、〈春光關不住〉九篇小說。）
- 楊逵：〈風浪是人生日常事——寄給初臨人間的長孫〉（《中國時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 楊逵口述、楊翠筆錄：〈我的心聲〉（《自立晚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 楊逵口述、王曉波整理：〈最後演說〉（王曉波著〈記楊逵先生的最後演說〉《自立晚報》 民國七四年四月十一日）
- 楊逵著、鍾肇政譯：〈增產之背後〉（《臺灣文藝》九四期 民國七四年五月）
- 楊逵：〈我的三十年〉（《聯合文學》第一卷第八期 民國七四年六月）
- 楊逵：〈臺灣文學對抗日運動的影響——十一年前一項文藝座談會上的書面意見〉（《文季》第二卷第五期 民國七四年六月）
- 楊逵：〈綠島家書〉（《自立晚報》 民國七五年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四日）

楊達：〈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經驗〉（王曉波編《被顛倒的臺灣歷史》 臺北、帕米爾書店 民國七五年十一月初版）

楊達：〈希望有更多的平反〉（王曉波編《被顛倒的臺灣歷史》 臺北、帕米爾書店 民國七五年十一月初版）

楊達口述、王曉波整理：〈最後演說〉（王曉波著《被顛倒的臺灣歷史》 臺北、帕米爾書店 民國七五年十一月初版）

楊達：〈送報伏〉（林雙不編《臺灣小說半世紀》 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六年三月十日）

楊達：《綠島家書》（臺中、晨星出版社 民國七六年三月二十日）

（註：收錄楊達於綠島監獄時家書遺稿，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二日起，至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止。曾於《自立晚報》連載。）

楊達：〈送報伏〉、〈鵝媽媽出嫁〉、〈無醫村〉、〈首陽園雜記〉、〈水牛〉、〈我的太太葉

陶〉、〈楊達回憶錄〉、〈二二八事件前後〉（收錄於陳芳明編《楊達的文學生涯》 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七年九月十五日臺灣版第一刷）

楊達：〈寫作研究①談寫作〉（《中國時報》 民國七八年四月七日）

楊達：〈談街頭劇〉（《自立晚報》 民國七八年四月十九日）

楊達：〈爲此一年哭〉（《自立晚報》 民國七八年四月十九日）

楊達：〈光復進行曲〉（《民衆日報》 民國七八年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楊逵：〈婆心〉（《中國時報》 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楊逵：《睜眼的瞎子》（臺北、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初版）

（註：收錄〈豬哥仔伯〉、〈赤坎拓荒〉、〈勝利進行曲〉、〈光復進行曲〉、〈睜眼的瞎子〉、〈真是好辦法〉六篇劇本。）

楊逵：《樂天派》（臺北、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初版）

（註：收錄〈豐年〉、〈牛犁分家〉、〈豬八戒做和尚〉、〈婆心〉、〈樂天派〉五篇劇本。）

楊逵：《楊逵集》（張恆豪主編「臺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⑦」《楊逵集》 臺北

、前衛出版社 民國八十年二月一日）

（註：收錄〈送報伕〉、〈水牛〉、〈頑童伐鬼記〉、〈無醫村〉、〈泥娃娃〉、〈鵝媽媽出嫁〉、〈萌芽〉、〈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犬猴鄰居〉、〈歸農之日〉、〈種地瓜〉、〈模範村〉、〈春光關不住〉、〈才八十五歲的女人〉等小說作品。）

楊逵：〈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陳芳明編《臺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事件專輯》 二二八

和平日促進會發行 民國八十年三月初版）

# 重要參考資料

## 一、書籍類

〔楊逵之著作〕

羊頭集 楊逵著 臺北、輝煌出版社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初版

鵝媽媽出嫁 楊逵著 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四年三月初版

壓不扁的玫瑰 楊逵著 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四年三月初版 七五年四月二版

綠島家書 楊逵著 臺中、晨星出版社 民國七六年三月初版

睜眼的瞎子 楊逵著 臺北、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七九年三月初版

樂天派 楊逵著 臺北、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七九年三月初版

楊逵集（臺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⑦） 楊逵著、張恆豪主編 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八十年二月初版第一刷

〔評論楊逵及其作品之專著〕

楊達的人與作品 楊素絹編 臺北、民衆日報出版社 民國六八年十月初版

楊達的文學生涯 陳芳明編 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七年九月初版 七八年二月臺灣版第二刷

〔傳記類〕

楊達畫像 林梵著 臺北、筆架山出版社 民國六七年九月初版

臺灣近代名人誌 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 自立報社 民國七六年十二月初版

無花果 吳濁流著 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七年八月初版

辛酸六十年 鍾逸人著 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 民國七七年六月初版

臺中的風雷 古瑞雲（周明）著 臺北、人間出版社 民國七九年九月初版

〔歷史類〕

日本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二 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昭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臺灣民族運動史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 臺北、自立晚報社 民國六年九月初版 七六年一月四

版

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臺灣 王詩琅編著 臺北、衆文圖書公司 民國六九年十二月初版

臺灣地方史 陳碧笙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民國七一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 臺北、帕米爾書店 民國七四年七月初版

七六年五月再版

臺灣的殖民地傷痕 王曉波編 臺北、帕米爾書店 民國七四年八月第一版第一刷

日本史 林明德著 臺北、三民書局 民國七五年十月初版

被顛倒的臺灣歷史 王曉波著 臺北、帕米爾書店 民國七五年十一月初版

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 王詩琅譯 臺北、稻鄉出版社 民國七七年五月初版

臺灣史研究會論文集(第一集) 臺北、臺灣史研究會出版、主編 民國七七年六月初版

臺灣政治運動史 連溫卿著 張炎憲、翁佳音編校 臺北、稻鄉出版社 民國七七年十月初版

臺灣史與臺灣人 王曉波著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七七年十二月初版

臺灣總督府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 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 民國七八年五月初版

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 盧修一著 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九年五

月前衛版第一刷

〔工具書〕

臺灣歷史年表 楊碧川編 臺北、自立晚報社 民國七七年六月初版

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一九四五—一九六五) 薛化元主編 臺北、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發行 民國七九年十一月初版

〔文學史、文學評論類〕

旧殖民地文學の研究 日本、尾崎秀樹著 東京、勁草書房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第一刷

文獻資料選集(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5) 李南衡主編 臺北、明潭出版社 民國六八年三

月初版

- 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 陳少廷編撰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民國七十年第三次印行
- 文學史話 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主編 臺北、聯合報社 民國七十年
- 臺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復刻本 臺北、東方出版社 民國七十年三月出版
- 日本文學概論 劉崇稜著 臺北、水牛出版社 民國七一年八月再版
- 沒有土地，哪有文學 葉石濤著 臺北、遠景出版社 民國七四年六月初版
- 女朋友 葉石濤著 臺中、晨星出版社 民國七五年九月初版
- 臺灣文學史綱 葉石濤著 高雄、文學界雜誌社 民國七六年二月初版
- 臺灣香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選——第三屆全國臺灣與海外華文文學學術討論會學術組選編 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民國七七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臺灣新文學史初編 公仲、汪義生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民國七八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臺灣小說發展史 古繼堂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七八年七月初版
- 先人之血，土地之花 臺灣文學研究會主編 臺北、前衛出版社 民國七八年八月臺灣版第一刷
- 臺灣文學的悲情 葉石濤著 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 民國七九年一月第一版第一刷
- 走向臺灣文學 葉石濤著 臺北、自立報系 民國七九年三月第一版第一刷
- 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 焦桐著 臺北、臺原出版社 民國七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一刷
- 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 彭瑞金著 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民國八十年三月第一版第一刷

## 二、期刊論文類

〔楊逵著作——見附錄二、三〕

〔評論楊逵及其作品之論著〕

形象化——德永直著 《臺灣文藝》第二卷第二號 昭和十年二月

作家歸隱山林、心血灌輸花園——楊逵希望別人投資合作 胡錦媛著 自立晚報 民國六三年九月

月二十七日

臺灣的昨日——品讀《鵝媽媽出嫁》 陳嘉宗著 臺灣日報 民國六三年十月十三日

徬徨·覺醒·希望 柳映隄著 《幼獅文藝》卷四十五（二五〇期） 民國六三年十月

我要再出發——楊逵訪問記 夏潮編輯部撰 《夏潮》卷一期七 民國六五年十月

除非種子死了——探討楊逵小說的精神 何思萍著 同右

從〈無醫村〉看日據時代的臺灣醫學 于飛著 同右

評〈春光關不住〉 余思之著 《出版家》期五二 民國六五年十一月

讀楊逵的小說 隱青著 同右

論楊逵先生及其作品 胡秋原著 《中華雜誌》卷一四期一六〇 民國六五年十一月

從文學作品看日據時代的民族心理——楊逵、吳濁流作品之探討 白素英著 《史苑》期三三



民國六九年五月

永不熄滅的燭火——光復前臺灣文學中的民族意識與抗日精神 楊達等／李泳泉等記錄 民國六

十九年七月七、八日

痛失《臺灣新文學雜誌》的楊達 黃武忠著 臺灣日報 民國七十年一月九日

拿鋤頭在地上寫作——訪永遠不老的楊達先生 劉靜娟著《中央月刊》卷一四期七 民國七一年

五月

老園丁出國門——歡送小說家楊達赴美 李雲林著 自立晚報 民國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楊達的七十七年歲月——一九八二年楊達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記錄 戴國輝、內村剛介訪問，陳

中原譯 《文季》卷一期四 民國七二年十一月

壓不扁的玫瑰花——獨孤隼 自立晚報 民國七二年十一月八日

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訪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達 陳春美著 《前進廣場》期

一五 民國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不屈的文學魂——論楊達兼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藝 張良澤著 《前進廣場》期一五 民國七二

年十一月十九日

楊達談二二八——心願未了，老兵不死 楊祖珺著 《前進時代》期七 民國七三年三月

最後的見證 戴國輝著 中國時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十三日

對人生充滿虔誠與熱愛——楊達走了，留下歷史評價 王震邦著 民生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十三

日

園丁去老存微笑——楊達先生的文學精神 江凡著 自立晚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十三日

風雲欲捲人才盡——楊達的文學運動與社會運動 羊子喬著 自立晚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十四日

一個未了的心願——關於楊達先生的〈送報佚〉 著先著 中國時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永遠相陪伴 楊翠著 同右

活出二種生命的典範 蔣勳著 同右

楊達先生！您是來道別了嗎？ 陳永興著 同右

楊達精神不朽 陳若曦著 中國時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瓦窰寮裡的楊達 鍾天啓著 自立晚報 民國七四年三月二十九、三十日

楊達瑣憶 葉石濤著 自立晚報 同右

最後的·永遠的期願——臺灣抗日作家楊達的最後兩天 王世勛著 自立晚報 同右

做得好，才重要！——對「楊達全集」出版的一些建言 張恆豪著 自立晚報 民國七四年四月

一日

不朽的老兵：楊達印象 丘秀芷等 《文訊月刊》期一七 民國七四年四月

懷念楊達兄 龍瑛宗著 同右

永昭人間的文學魂——獻給楊達先生 呂昱著 同右

歷史的寂寞——楊達先生永垂不朽 陳映真著 《中華雜誌》期二六一 民國七四年四月

老兵精神不死——追憶楊達 林清文著 《文學界》期一四 民國七四年四月

放膽文章拼命酒——論楊達作品中的反殖民精神 宋冬陽著 《臺灣文藝》期九四 民國七四年

五月

楊達作品〈新聞配達夫〉的版本之謎 塚本照和著、向陽譯 《臺灣文藝》期九四 民國七四年

五月

楊達先生和他的帽子 許達然著 同右

遠行的玫瑰——有人問起這朵花的來歷 陳芳明著 同右

楊達回憶錄的感想——編者後記 張恆豪著 同右

楊達的文學活動 河原功作、楊鏡汀譯 《臺灣文藝》期九四、九五 民國七四年五、七月

楊達綠島十二年 胡子丹著 《傳記文學》卷四六期五 民國七四年五月

楊達的文學活動 河原功作、楊鏡汀譯 《文季》卷二期五 民國七四年六月

臺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達關於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 戴國輝、若林

正文訪問 同右

從東海花園到臺北街路——紀念楊達先生 許達然著 同右

懷念兩位平凡的巨人 何欣著 同右

海外紀念楊達座談會 王寶珠筆記 同右

日據時代的楊達——他的日本經驗與影響 葉石濤著 《聯合文學》卷一期八 民國七四年六月

泥土的回歸——懷念先父楊逵先生 楊建著 同右

心襟上的白花——父親與我，兼記母親葉陶女士 楊素絹著 同右

安息吧！親愛的父親 蕭素梅著 同右

楊逵——我的父親 楊資崩著 聯合報 民國七五年八月七日

超越民族情結重回文學本位——楊逵何時卸下「首陽農園」 張恆豪著 《文星》期九九 民國

七五年九月

存其真貌——談〈送報伏〉譯本及其延伸問題 張恆豪著 《臺灣文藝》期一〇二 民國七五年

九月

楊逵吹皺《文星》一池靜水 曾心儀著 民衆日報 民國七五年十月八日

楊逵有沒有接受特務工作？ 張恆豪著 《南方》期二 民國七五年十一月

把抵抗深藏在底層——論楊逵的〈「首陽」解除記〉和「皇民文學」 王曉波著 《文星》期一

○一 民國七五年十一月

陽光一樣的熱——讀楊逵先生《綠島家書》 向陽著 自立晚報 民國七六年三月十二日

又見祖父遺作 魏貽君著 中國時報 民國七八年四月七日

整理遺稿，重返東海花園 楊建著 同右

〈送報伏〉書中的日本和日本人 塚本照和作、林景淵譯

〔歷史、文學史、文學評論〕

臺北日人的新劇運動 王一剛著 《臺北文物》卷三期二 民國四三年八月

七七抗戰後的臺灣劇運 呂訴上著 同右

臺灣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 同右

談抗日時期的臺灣新文學 劉依萍 《文訊月刊》期七—八 民國七三年二月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光復初期的臺灣日文學 葉石濤著 《文學界》集九 民國七三年二月

年二月

先人之血，土地之花——日據時代臺灣左翼文學運動的發展背景 宋冬陽著 《臺灣文藝》期八

八 民國七三年五月

記一九四八年前後的一場臺灣文學論戰 彭瑞金著 《文學界》集十 民國七三年五月

試論戰後初期的臺灣智識份子及其文學活動（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葉芸芸著 《文季》卷

二期五 民國七四年六月

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評價問題 傅博著 《文星》期一〇四 民國七六年二月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文學結社及其精神 林瑞明著 《文訊月刊》期二九 民國七

六年四月

臺灣文學研究的三個階段 松永正義作、葉石濤譯 《文學界》期二八 民國七八年二月

日據時代的抗議文學 葉石濤著 《聯合文學》卷五期八 民國七八年六月

日據時代臺灣社會運動——分期和路線的探討 張炎憲著 《臺灣風物》卷四十四期二 民國七九

年六月

尋找已失落的悲喜劇——讀焦桐〈臺灣戰後初期的戲劇〉 《文訊》革新號期二一（期六十）

民國七九年十月

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上）——日本統治下在臺灣的社會運動 河原功作、葉石濤譯 《文學

臺灣》創刊號 民國八十年十二月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著 自立早報 民國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二十六日

### 三、學位論文類：

日本割據時代 臺灣新文學——一九二〇年以降の文學、主に楊逵の文學活動を中心に——吳翰

祺撰，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三年六月

臺灣殖民文學的社會背景研究——以吳濁流文學、楊逵文學為研究中心 張簡昭慧撰 文化大學

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七年六月